

奈良曼旗文史資料



第四期

93

奈良縣立歴史資料委員会

奈曼旗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奈曼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审定：张秉增 姜占一 阿民布和

责任编辑：杨晓春 希儒博

封面设计：王爱国

奈曼旗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奈曼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文印刷：奈曼旗印刷厂

封面印刷：哲盟委机关印刷厂

字数：110,000 开本：787×1092

印张：6 印数 1—1500

N X T Z Z 93—143 定价：4.50元

序

张志强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奈曼人。

所以，我和每个奈曼人一样，对这方生我养我的热土，有着无以名状的感情和执着的爱恋。

也正因如此，我又常常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对她的昨天了解得实在太少太少。以至无法反省她昨天的轨迹，不能感受到她昨天的沉重和屈辱，也不能为她昨天的悲壮和辉煌而自豪骄傲。这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我们今后的世世代代，不能不说是个深深的遗憾。

这个深深的遗憾，如果没有《奈曼旗文史资料》的编纂者的呕心沥血的辛勤劳作，也许是个永远的遗憾。从这个角度上说，编纂者是在做着一项伟大的工作，功不可没，功在千秋，正是因为有了《奈曼旗文史资料》，我们对奈曼的历史了解才有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沿着这条清晰的线索，我们对奈曼的历史全貌才有了些许感受，这不能不感谢《奈曼旗文史资料》的那些严谨认真的作者们，不能不感谢那些实事求是的编者。

只有真正了解这方热土，了解她的昨天和过去，才能真

正地热爱她，也才能去用心血更加努力地珍惜她，建设她、发展她。这就是当每期《奈曼旗文史资料》一到手，就如饥似渴、爱不释手的最主要原因。

只有让我们多了解一点奈曼的历史，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旗情。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我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

1993年12月

(本序作者为中共奈曼旗委宣传部长)

目 录

- 革命熔炉中的学习生活……………舍布扎布(1)
- 入朝参战琐忆……………张松林(11)
- 在和罗云彪同志相处的日子里……………衣凤英(18)
- 张念祖匪部被剿记……………王吉祥(26)
- 奈曼——乃蛮之辨析……………奕赫乃蛮·达日玛(30)
- 兄弟争位案……………希儒博(45)
- 我的僧侣生涯……………嘎力僧扎木苏 口述
宝力高 整理(61)
- 清代末期的道日钦扎兰……………王占山(66)
- 奈曼旗白音昌乡酒局子村
辽墓清理简况……………张宇(69)
- 奈曼旗出土辽代马具饰件……………张宇(78)
- “中庸道”在奈曼的活动……………梁凤云(83)
- 李凤芝戏班的由来……………于佐廷(94)
- 老台河简介……………刘葆林(97)
- 奈曼旗1962年特大洪水灾害记实……………马云和(100)
- 奈曼旗旱涝史记……………刘葆林(106)

蒙古新文化的杰出旗手——布和克

- 什克……………**额尔德木图**
宝音陶克陶 (1 1 9)
- 奈曼旗末代扎萨克——苏达那木达尔济……**希儒博** (1 5 4)
- 索惠民小传……………**胡永平** (1 6 8)
- 从教五十年的拉西旺都特……………**张 斌** (1 7 1)
- 奈曼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始末……………**颜成坤** (1 7 3)

革命熔炉中的学习生活

——参加辽吉省五地委干训班学习片断回忆

舍布扎布

194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我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正全力作秋季攻势的战略准备，辽沈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解放战争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巩固后方根据地，培养新生骨干力量，迎接土地改革运动，中共辽吉省五地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五地委管辖的库伦、奈曼（老解放区）、黑山、北镇、阜新（半解放区）七个旗县都选派了青年干部参加学习。我们奈曼旗一起参加这次干训班的有舍布扎布、侯栋、达瓦宁布、阿尔斯郎、萧银山、薛永岚、那木吉、裴玉、刘景俊、赵福、张喜云十一名同志。

当时，东北相当一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没有解放，敌我双方处于拉锯阶段，对敌斗争形势非常紧张。为避免敌人的袭击，五地委机关、专署和军分区司令部都分散设在新立屯附近的农村。五地委机关设在距新立屯八里的小河子村、干部训练班则设在东苍图屯一大地主的大院子里，距地委机关也有八里路。在那里，我们一百多名学员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

弹指一挥间，40多年已过去。往事如烟，但忆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学习的一些片断，至今仍烙印很深、历历在

目，经过思考，我决定把几个片断写出来，供青年同志一阅，以期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有所裨益。

集中学习受训

1948年7月份，干训班的紧张学习生活开始了。这次干训班的主要任务是对青年干部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认清革命形势，懂得革命道理，树立革命人生观，明确反封建、划阶级、搞土改的重大意义。课程设有社会发展简史、党史、以及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如何划分阶级等专题。社会发展简史、党史由五地委组织部长吴振铎讲授，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如何划分阶级等专题由五地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葛锡藩讲授，没有专职教员。

学校条件极差。教学场所是临时借用屯中小学校的教室，没有桌椅，没有讨论室，更没有大会议室。学员记笔记用大腿当桌子，讨论时大家围坐在一铺火炕上。干训班自始至终由吴部长主持领导。他亲自讲课，亲自辅导，既是领导，又是教员。讲课象教小学生一样，先把课程内容一段一段地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待学员抄完后，再逐条逐句地耐心讲解，下次在课堂上提出问答题，点名让学员站起来回答。由于当时学员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同志，年纪小、记忆力强，又都是第一次入学学习，对所学的内容感到新鲜，所以，求知心切，学习刻苦，课上听讲虚心，记录细心，回答问题，积极踊跃，对答如流；课下分组讨论，发言热烈，畅

所欲言，为探求真理，往往互相争执，毫不顾虑。对此，吴部长非常满意。

学习条件艰苦，我们能够克服，敌人的袭击、干扰，我们同样能够对付。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教室里听吴部长讲课，敌机突然出现在教室上空，并低空盘旋，我们迅速撤离教室，分散隐蔽在农民的苞米地里，大约过了20分钟，敌机飞走了，我们回到教室继续上课，教学活动照常进行。

吴部长待人态度和葛平易近人，经常深入讨论组，聆听学员讨论。开学不到20天，就对学员情况了如指掌，能准确地叫出一百多名学员的名字，甚至对每个学员的出身、历史、干什么工作等都记得清清楚楚。学员们对他无不敬慕和钦佩。吴部长那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形象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留有深深的烙印。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些认识，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实现的革命道理也有所理解。学员们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鼓起了革命勇气，增强了反封建、除恶霸的信心和决心。这对我们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革命教育，对我们以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 地 学 习

集中学习两个月，学员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干校决定分两个组到实地学习半个月。一个组由吴部长

亲自指导，地点在东苍头屯，另一组到距离干校较远的一个山村，由葛锡潘同志带队。实习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农村劳苦大众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状况，如何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除恶霸的斗争，这个任务在当时来说非常困难，也非常艰巨。因为实习地点是新解放区，群众接受我方教育不多，思想觉悟不高，加之敌机天天来扫射，干扰太大，群众怕变天的思想一时消除不了。发动工作刚要成熟，不知从哪飞来一架敌机，扔下一颗炸弹，就会把群众刚有的一点积极性打消。为了配合群众发动工作，上级派来文工团演剧。我们学员到周围村屯发动群众晚上来看剧，群众都不愿意来。即使勉强来了，也是提心吊胆，怕敌机扫射。这给我们的发动工作确实带来很大困难。记得在实习中，领导给我分配十三户发动工作任务。我奔走十几天，不辞辛苦，挨门挨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摸清底细，对13户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这十三户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几辈子给地主榜青扛活，受剥削，受压迫，苦大仇深。我把他们天天召集到一起开会，既讲革命大道理，又讲小道理；既讲长远利益，又讲眼前利益；既讲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罪行，又讲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翻身求解放，斗地主，反恶霸。但因群众思想顾虑没有消除，任凭你革命道理讲得再好，甚至噱讲出泡来，他们在会上仍是你瞅他，他看你，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后来吴部长召集学员，听取汇报，分析群众思想动态，研究对策。针对当时复杂情况，提出发动工作要抓住当前主要矛盾，进行突破的方法。东苍头屯有个大地主，40来

岁，蒙古族，伪满期间当过警佐，娶三个老婆。他镶着半口金牙，说汉语很流利，汉文程度很高，是个罪恶累累的人物。吴部长布置，围绕这个人进行发动工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重点突破，打开工作局面。并教育鼓励我们：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希望，看到有利条件，不要泄气，不要被困难吓倒。既要做好全面发动教育工作，更要重视个别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我们按照吴部长部署的对策，工作几天，效果果然很好，不仅宣传教育面扩大了，一些群众的思想顾虑消除了，而且还个别培养了一批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那个伪满警佐。我们抓住时机，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吴部长首先在会上讲话，交待政策，讲述革命道理。接着恶霸地主、伪满警佐坦白交待。然后积极分子揭发控诉。最后从伪满警佐家里挖出很多财宝，分给了贫下中农。群众分到了胜利果实，情绪激昂，人人喜气洋洋，个个眉开眼笑，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们趁热打铁，又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农会，选举干部，建立制度，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

通过实地学习，对我来说，教育极深。特别是领导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办法，遇事冷静，指挥有方，使我深得教益，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后来听说，同年11月份，东北一股国民党残兵败将流窜到新立屯地区，五地委部分机关暂时退却到我旗新镇一带。敌人到东苍头屯后，对贫下中农疯狂报复，打击革命势力。我军组织力量很快把敌人赶走，群众重新起来

革命镇压了反革命势力。经过几次挫折、考验和锻炼，东苍头屯的贫苦农民革命意志更坚强了，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的思想更牢固了。

光 荣 转 党

干校学员有100多名，其中党员40多名。五地委组织部每月都派人来学校，通过公开举行入党仪式，对培养成熟的党员或转正的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不论是入党还是转党，都认真履行手续，如个别培养、本人申请、介绍人介绍，党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我是1948年6月1日入党的，入学时是预备党员。在学习期间，经我本人申请，小组评议，支部全体党员举手表决，出席会议45名党员，有43票同意我转为正式党员。从入党到转正仅三个月时间。那天，由地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主持，隆重举行了入党和转党仪式，听了她的讲话，我万分激动。

我入党转正时举手向党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誓言时时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我是一个贫苦牧民的儿子，刚满十八周岁，就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人，使我从内心里感到荣幸，也从内心里感到党的光荣伟大，可敬可信，我对党的感情日益深厚。

在我转为正式党员的第二天晚上九时，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是穷人的孩子，光荣参加共产党，党的恩情永不忘，

我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不忘本，不变心；
把青春交给党安排，时刻听从党召唤，
党兴我兴，党衰我衰，我的生命紧紧和党联系在一起，
干工作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共度难关，
带领群众共同战斗，决心推翻三座大山，为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做贡献。

这短短几句话虽然不是豪言壮语，但却表示了当时我对党的心声。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它一直激励鞭策着我为党为国勤恳工作。

艰 苦 生 活

战争年代的干校生活，异常艰苦。学员们一日三餐，全是高粮米饭，三个月没有吃过一顿细粮。副食基本是清水煮菜，很少见油。由于定量供应，加上夏季天长，学员们吃不饱，经常饿着肚子。住宿条件也相当差。十几个学员挤住在地主大院内两间一明的火炕上。虽是火炉，但三个月没有烧过一次，非常潮湿。我们带的行李，是供给制时发的白被子和装被子用的褥套，很单薄。晚间睡觉被子当褥子、褥套，

当床单，每天都要晒被子，否则潮湿受不了。尽管这样，大家对待学习仍是那么认真，那么精神饱满，从不叫苦，从不埋怨，从不发牢骚。说起花钱更为困难。供给制所发的津贴，仅够买漱洗用品。我入学时，家里给带了二元五角零花钱，也没舍得花。结业回来，从新立屯到阜新花了几角钱的火车费，剩下两元到家后还给家里。在那个时候，人们头脑里想的是如何搞好学习，干好工作，至于赶时髦、铺张浪费之类，根本不去想它。

干校结业，正是秋收季节。由于敌机经常扫射，铁路交通经常受阻。为躲过敌机扫射，我们早晨从新立屯坐火车到阜新，一路走走停停，走20分钟，停半个小时，直到日落西山，才到达阜新，差不多用一天时间。我们奈曼的11名学员在阜新站下车后，到阜新北的一个农村宿营。第二天从阜新开始背着行李徒步奔奈曼。哪料刚起程不久，赵福同志得了病，不能走路。大家想背，路途远，背不起，只好在附近屯中找干部，派老乡用毛驴一站倒一站，一直送到大沁他拉。我们徒步行走五天，每天平均行程80华里，沿途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饭后按规定标准算账，给米票，付菜金。大家风尘仆仆，都很辛苦疲劳，但一路谈笑风生，和睦团结，互相照顾，亲如兄弟，遵守纪律，安守本分，表现出革命感情之深厚，革命热情之高昂。

到达奈曼后，旗委组织部长王克同志接见我们，问寒问暖，非常亲热，并把干校介绍的每个学员的学习情况，结业鉴定，亲自过目，又亲自写介绍信介绍我们回各区工作。后

米我们这些人在一九四八年秋冬查评土地工作中，都是积极骨干力量，负责一面工作，工作卓有成效。

严守纪律

干校条件虽然差，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的自觉性、组织纪律观念却极强。干校所在的地主大院，果树很多，都已结果，尽管学员每天吃不饱，饿肚子，但没有一个人摘果充饥，甚至果子成熟落地，连看都不看。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有这样几条原因：首先、与干校经常的纪律教育有关。凡是干校领导教育大家做的，都是认真领教，听到做到，绝不是三心二意，更不是要求凭你，干是凭我，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其次，绝大多数学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对党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跟党走，干革命是他们的强烈愿望，所以，党叫干啥就干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干校党内民主生活抓得紧。每星期都要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汇报思想、谈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民主生活会，不是走形式，而是真正解决问题，即使是微小的事情，也都提出来，引起注意。批评者毫无顾虑，敢于提出批评，被批评者敢于亮明思想，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正气得到弘扬，邪气得到抑制。坚持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不是简单的“洗礼”，而是起到了发扬党内民主，统一党内思想，增强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

的建设的积极作用。

几 句 结 语

光阴如梭，不知不觉40多年已经过去。当年我们奈曼在五地委一起入学的同志，现在都已年过花甲。这些人出身穷苦，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过去念不起书，文化程度很低，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大有提高，在我旗的一些岗位上，曾担当过重要职务。

40多年来，他们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做了杰出贡献。

入朝参战琐忆

张松林

没有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们，对战争的硝烟是陌生的，而从战争岁月里走过来的幸存者，却对出生入死的战争岁月难以忘怀。

一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已经发展到非常阶段，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疆城市安东，（现在丹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扼杀我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家卫国，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奉命抗美援朝，从湖北沙市乘车北上，开赴安东附近集合待命。

那时我在军部电台第三台工作，是见习报务员，在六名报务员中，我的年龄最小。我们三台的主要任务是联络50军所辖的148师、149师、150师，向三个师传达军首长的作战命令。由于当时有线电联络毫无保障，因而无线电成了通讯联络，指挥作战的主要手段。

我们三台随军部一到安东，就看到安东对面的朝鲜边疆城市新义州已成为战争废墟，美帝的B—29飞机轮番地对

朝鲜国土、鸭绿江大桥、安阳市进行狂轰乱炸，血腥屠杀中朝人民。目睹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我们满腔怒火，恨不得立即入朝参战，打击侵略者。

10月25日以后，我们50军的三个师先头入朝参战，不久，军部也移至朝鲜，50军编入志愿军序列，与志愿军友邻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向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李承晚伪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仅用50天时间，就把敌军从鸭绿江边打到汉城以南150公里的随原附近，解放了北朝鲜的全部国土，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张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我们三台随军部参加了这两次战役。因为电台随军部行动，对前线的战况我亲身经历的不多，但通过无线电传唤同样能了解到战役的残酷和壮烈。在战役中，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前进，便利用它的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实行封锁，特别是对鸭绿江大桥，临津江桥，大同江桥，昼夜不停地侦察扫射，狂轰乱炸，使我军的作战物资和给养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为打破敌机的封锁，保证作战物资供应，志愿军战士就用步枪打击低空美国飞机。我们50军150师的战士李贵就是用步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立了大功，成为志愿军战斗英雄。到了51年，祖国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朝鲜战场的上空有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我们每个志愿军战士当时的高兴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有一次，在我们驻地上空，被我空军击落了一架美国B—29轰炸机，敌机12名机组人员跳伞，被我们在空中击毙8名，俘虏4名。我军有了自己的空

军，敌机再也不敢那么嚣张了。

我们50军军部过汉江以后，驻在离汉江50公里的金江里，离前沿阵地很近。敌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疯狂地向我军反扑，炮弹打在军部附近，浓烟滚滚，震耳欲聋，我们的电台仍然架设在防空洞内坚持联络，及时传达军首长的作战命令，成为“永不消失的电波”。前线部队伤亡严重，司令部决定抽调一批勤杂人员参战，军首长的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我们电台的两名通讯员都被抽调上了火线，全部牺牲在战场上，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二

开城座落在南北朝鲜之间，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也是李承晚伪军的老巢。美军和李伪军弃城逃跑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蛊惑老百姓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藏起来，跑到山里躲避。我军到达时，开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除了空中不时出现美机盘旋外，城内很少见到老百姓，因为部队连续行军打仗，我们的衣服都已千疮百孔，破烂不堪，途经开城时，我在那里买了一件衬衫，把我那件不能遮体的破衬衫扔在了开城。

由于战线拉长，敌机封锁，祖国的粮食一时送不上来，志愿军有时只得忍饥挨饿行军打仗。不少战士因饥饿患了夜盲症。我白天在电台值班，夜间行军，疲劳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良，也得了夜盲症。夜间行军看不见路，我就摸着驮运行李的马尾巴走路，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跌倒了，爬起来，再继续行军。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抵达开城

时，迫不得已自己寻找老百姓藏起来的粮食。我们用枪刺扎地窖，找到稻谷后，用手捣成米做饭充饥。然后，再把朝鲜币放在藏粮食地方，表示付了稻谷钱，自觉维护志愿军的纪律。

在开城停留三天后，我军继续向南挺进。于50年12月30日在“三八线”附近的防空洞内渡过了入朝参战的第一个元旦。

三

1951年11月，朝鲜半岛已是冰天雪地，汉江已经半冰半水。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50军奉命撤退到汉江以北打阻击战。我们军部三台及时向148、149、150三个师拍出军首长的撤退命令后，随军部向汉江以北撤退。撤退前，军部驻扎在金江里，我们三台住在当地的一位朝鲜老乡家。这位老乡的儿子被李伪军抓去当兵，只有阿妈尼和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相依为命，可以说是个伪军家属。起初，由于受李伪军的反动宣传，这位阿妈尼对志愿军没有好感，经常躲避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她看到志愿军不仅纪律严明，不动朝鲜一草一木，而且关心帮助朝鲜群众，改变了态度，由不信任而变为亲近了。平常一有空儿，就操着生硬的汉语跟我们战士唠家常，问中国的情况，问我们每个人家里的情况。当她看到我们收拾行装要出发时，就打着手势，用一半汉语、一半朝鲜语问我们：“你们走了，还回来吗？美国兵要来了，我们可怎么办呀……”语刚出口，阿妈尼的两眼就涌出了热泪，我们急忙拉住阿妈尼的手，安慰她说：

“请阿妈尼放心，我们一定要打回来！”此情此景，使我们每个在场的人深受感动。阿妈尼对我们的这种惜别之情，说明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信任，也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救朝鲜人民于水火的正义之师！

初冬时节，冷风刺骨，夜间行军，更是寒冷难当。为了争时间，抢速度，我们把寒冷置之脑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汉江北岸进发。敌人企图阻止我军过汉江，用飞机不停地在汉江上空投掷照明弹，扫射轰炸，我军用猛烈的高射炮火向敌机射击，掩护部队过江，在东方拂晓时，顺利到达了汉江以北的指定地点。我们三台的全体同志，不顾一夜行军疲劳，立即架设电台，与三个师沟通联络，继续传递军首长的作战命令，开始了我们50军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

四

1952年春，我从军部三台调到150师电台工作，任报务主任。这时，150师完成了汉江50昼夜阻击战任务。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减员较多，换防以后，回国休整一个月，补充兵员，改装武器，由杂牌武器更换为苏式水连球步枪，然后返回朝鲜，开赴朝鲜西海岸，担任死守西海岸的任务。150师的三个步兵团（448团、449团、450团）沿海岸线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以备打击海上来犯之敌。当时，我们电台随师部住在离西海岸线不远的定州附近的德青里，联络对象除了军部，主要是三个步兵团。

150师防地对西海中间，有个小岛名叫艾岛，岛上盘据着李伪军一个团，经常刺探我军情报，还时而对我进行骚

扰。一天，师部接到上级命令，拔掉海上艾岛这颗“钉子”。7月16日，拔“钉子”战斗在师长赵国泰、参谋长杨宾的指挥下打响了，我们电台随师首长进入了西海岸指挥所373高地。夜间十点钟，我正在电台值班，赵师长下达了进攻命令。我通过无线电密码把命令迅速传达出去，448和449两个步兵团分乘15艘橡皮船和30支木船向海上小岛发起了进攻。这时海面上非常寂静。大约过了一小时，岛上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进攻船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响成一片。赵师长一面命令岸上炮兵用强大火力向艾岛猛烈射击，一面通过电台命令448、449团快速向艾岛挺进，占领艾岛，不准放跑一个敌人。经过大约四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攻占了艾岛，打死打伤李伪军500多名，俘虏1000余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赵师长来到我们电台，用亲切的目光看着我们，对我们说：“小鬼，你们累了吧？这次战斗，你们的通讯联络很出色，任务完成的很好！”我们电台的全体报务人员齐声回答：“师长辛苦了，谢谢师长对我们的表扬，我们一定好好工作，为国争光！”拔掉了艾岛这颗“钉子”，150师的西海岸防线更加坚不可摧了。

1952年7月，在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坐下来举行板门店和谈，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我们50军于1955年4月胜利返回祖国。

忆往昔峥嵘岁月，是何等的艰苦卓绝，看今天的和平生

活，是多么的幸福美满！我作为一名“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兵，把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一些亲身经历写下来，是希望人们珍惜当今的和平生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并以此来告慰那些同我并肩战斗过的，为了祖国的和平、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灵！

在和罗云彪同志相处的日子里

衣凤英

我叫衣凤英，今年65岁，现住辽宁省绥中县，原籍奈曼旗东明镇郭家店屯（现永胜村）。这次回来探亲，旗地方志办的老马同志来找我，他执意要我谈谈有关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同志的事。说实在的，我不愿提及那段往事，处于盛情难却，只好把我的一些事情讲出来，供同志们，特别是后人借鉴。

解放前，我的家很穷。1927年那年，我5岁，妹3岁时，由于饥寒交迫和过度劳累，不到40岁的母亲便过早地离开人世。母亲去世后，我的家就更加艰难了，迫于苦日子难熬，我7岁时，父亲就把我卖给了一个姓郑的人家做了童养媳。一个7岁的孩子能知道啥，只知道抱着5岁的妹妹哭，而不愿离开家。可有什么办法呢？社会的黑暗，父亲的封建，就只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到了那家可是另一个天地，7岁的孩子当大人使唤，忍受不了的事只能到僻静的地方去哭，眼睛哭红了，赶快用凉水洗洗，以免遭到打骂。

1943年，屯里闹鼠疫，在郑家首先就让我得上了，可当时我并没有害怕，觉得一死了事，再也不受折磨了。也许是这种精神的作用，我反而活过来了，而我那个男人则被鼠疫

夺去了生命。17岁的我，经过一番交涉，又回到了父亲和妹妹的身边，继续过着熬不到头的苦日子。这期间，媒人不断，说客盈门，父亲也被说动了心，要以八石高粱再卖给一个人家。7岁和17岁毕竟不同了，当时遭到了我的坚决反对，逼急了，就没好气地对父亲说：“如果你再卖我，只能卖死的，卖活的没门！”也许是父亲怕万一，就只好把这事撂下了。1946年，奈曼旗来了共产党，听人们背地议论说，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可以拿起武器跟共产党一起打土豪，打胡子。听了后，印象非常深刻，似乎觉得苦日子快要出头了。自从伪满洲国垮台之后，刘家茶馆一带就没得过安宁，弄得百姓心惊胆战，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后来这地方又成了共产党和土匪你来我往的拉锯地带，人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究竟走到那一步，老百姓还一时摸不清楚。在这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父亲和二哥决定给我找个“婆家”。怎么办？一个没有文化的姑娘，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时我想到了共产党，并听说驻入八仙筒的旗大队在招兵买马，但不知要不要女的，如果要，我就去。风声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和二哥的耳里，他们扬言说，“当八路就打死她。”因此，对我看管得很严，生怕我跑了。说来也巧，没几天，旗大队的苏排长带领二十多人到刘家茶馆执行任务，听说后，我决心去试一试。也许是封建制度、买卖婚姻的逼迫吧，背着父、兄，冒着风险，终于见到了苏排长，于是一口气地把我的遭遇和当时的处境说了出来。苏排长等人听了后都很同情，但也很为难，因为旗大队里没有女的，

再者，游击式的工作和战斗也不方便。可我这次走不了，回家后就没个好，鉴于这种情况，苏排长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找把剪子把辫子剪掉，象出笼的鸟一样，骑上马和苏排长等人一起到了八仙筒。

当时驻八仙筒的旗大队不足一百人，枪支马匹也不是人手都有。尽管力量薄弱，工作艰苦，但队员的觉悟很高，犹如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好象死并不是可怕的。大队的领导人有助大队长罗云彪、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及王克等人，官兵相处得很好。约一个月左右，我和所有的同志都混得很熟，凡是比我年龄大的都叫我小衣。尤其是几位领导对我非常关照，闲暇时，除了给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外，还给我讲了赵一曼的故事，这就更加增强了我干革命的信心，觉得只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女人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时，也不知怎么那么大的劲儿，骑马、打枪和夜行军，什么都不怕。一有时间还帮队员们缝缝补补，生活十分有趣。游击式的生活，走到哪里都是家，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难、谁家也没有宽敞的房子，好多时候都是和男同志挤到一个炕上住，相互如同兄弟姐妹。可能因为常此下去总不大方便，或是罗大队长有意，梁部长和苏排长找我，说，为了工作的需要，给你当一个红媒，这个人就是罗云彪同志。处在当时条件，经过反复考虑，我便同意了。其原因有二，首先，我很敬佩那些关内来的同志，他们抛家舍业，出生入死，很值得同情；其次也是我反对买卖婚姻一个最实际的行动。尽管老罗比我大十几岁，但我认为跟着他一起干革命会有前途。这样，我们就成了革命的伴侣。

现在，年青人结婚要买高级服装，高档家具，还要度蜜月。战争年代，那有这些排场，没有固定的房屋，自己也不能单独立灶，今天在这，明天又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和老罗与其说是夫妻，还不如说是革命同志，婚后仅四五个月他就牺牲了，计算起来，在一起住的时间总共也不到四十天。

老罗，江苏人，三十七八岁，中等壮实的身材，为人严肃果断，一派军人的风度。他对队员非常关心体贴，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首先安排好同志们的食宿，遇到紧急情况，他十分冷静，考虑的是队员的安全，整体的安全，个人总是置之度外，因此，深受队员的拥戴。他讲的话和闲谈时总离不开这样两句话，“我们现在的艰苦是为了将来的幸福”，“国民党和土匪说我们是‘穷党’，对了，我们就是为穷苦大众闹翻身，求解放的党”。他讲话很幽默，也很大众化，为此，大家都爱听。说实在的，我当时只知道豁出死来也跟着共产党走，至于走到什么地步，还是不够清楚的。老罗为了提高我的阶级觉悟和明白革命的前途，凡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忘开导我。他向我讲过苏联，讲过长征，讲过延安，还讲过抗日，这些事听来既感到很新鲜，也很受教育和鼓舞。记得有一次他问我：“小衣，你愿意到大城市里去吗？”我笑了笑，说：“大城市都让国民党占了，我怎么敢去呢？”听了我的回答，他既严肃坚决又颇具诙谐地说：“先让他们抖两天吧，秋后的蚂蚱，没几天的蹦头了……”接着他又果断地说：“到时候，我们是会进城的，那里的工作要比农村复杂得多，没有思想准备是不行的。”每当他谈

起革命前途时，总是给我留下美好的遐想，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1946年农历8月25日，也就是八仙筒突围战的前两天，老罗对我说：“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怕牺牲就干不了革命。”我对他突然说了这句话，感到有点不明白，接着他声音很低地说：“现在八仙筒附近到处都有土匪，看来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了。”“那我们先撤出去不行吗？”我贸然地问了一句。“撤，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能撤吗？撤了，老百姓要遭殃，共产党的威信也要降低，那损失远比牺牲几个人大多了。因此，我们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老罗的一番话，深深地鼓舞了我，下定决心，誓死保卫八仙筒。

农历八月二十七，老罗预料的激战终于发生了，天没亮，约有一千多敌人从四面八方把八仙筒包围了。东南响时，敌人开始了第一次进攻，老罗一边指挥着队员奋力抵抗，一边用冲锋枪猛烈的向靠近的敌人扫射，炮台底下留下了敌人十几具尸体。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警卫员于官兴跑到炮台向老罗报告敌情，当老罗回头听的一刹那，一颗子弹从枪眼里射进来，老罗中弹了。当我听到后，从东墙根跑上炮台时，老罗已经牺牲了，当时连一句话也未留下。在梁部长的示意下，我接过老罗的马牌檐子，继续投入了战斗。大家忍着悲痛，没有眼泪，没有哭声，以密集的子彈回击敌人，为老罗和其他几个牺牲的队员报仇。抵抗一直坚持到夜间十二点，此时炮台被打塌了，东墙也出了窟窿，只有冲出去才能和敌人交锋，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

力，被迫进行了突围（听说此战斗王克同志写了，我不再赘言）。突围，是经过周密研究后决定的，选择的突破口为西、北两面。在部分队员的掩护下，我和小张（只有15岁，家住在大段）从北面越过高墙，便一头钻进高粱地。天快要放亮时，才走进了一个蒙古族老乡家，说明情况后，我想用大烟土（并非吸食，是让队员们顶钱用）让老太太给换换衣服，但老人很害怕，并不时地催我们俩快走。为了不给群众造成麻烦，出门后便朝着小张家的方向往东北走，约十点左右，看看没有敌人追击，我们正准备在一个沙包上休息一下，突然从西面的树丛里出来一个拿镰刀的人，一看我们的穿着，便大喊“站住”，走到跟前后的第一句话，“把枪拿出来！”（幸亏从老乡家出来不远，便把马牌橇子埋在一棵大树底下，逃过他的不信，在逃身时，把我们带的烟土

他没有放我们走的意思，我就和他讲理，因为这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可这个家伙依然不吭声。这时候，那个老太太又回来了，一手端着炒米，一手拎着一瓦罐牛奶，来到跟前就示意让我们吃，这真是雪中送炭。我们在吃炒米的时候，他们俩继续争论。我们吃完了，可他们俩仍没分上下，这时老太太十分生气地给了那小子一个嘴巴，然后拎着罐子叨叨咕咕地走了。老太太走后，他让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经过交涉，他用身穿的破上衣换走了我俩的外衣。最后他恶狠狠地说：“这里不是八路军的天下，以后不许再当八路，滚蛋吧！”

我们出来沙坑不远便钻进了高粱地，可地边就是公路，一时不敢贸然行动。正在犹豫之际，发现不远处有两个人在码荞麦，当俩人接近我们时，我便认出其中一个是刘志仁，我的家曾和他家在一个营子住过，关系不错。于是我轻轻喊了一声“刘志仁大哥”，他抬起头来往高粱地这边瞅，我冲他摆摆手，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一见是我，他一切都明白了，并轻声说：“上午，我碰见了你爸爸，他说你在八仙筒被打死了，说了几句话后，他赶着车去乌兰章古了。”然后，他把弟弟支走，便把我俩领到一个柳条包上，安慰我一番后，他就走了。我在柳条包上一呆就是七天，这其中，刘志仁送过两次饭，饿急了就嚼柳条。最难熬的是夜间，蚊子咬，衣服薄，真是饥寒交迫。这时，小张的脸和脚全肿了，情况很险，而第五天上他把小张领走了，交给了小张的叔伯叔，我才放了心。我一个人又呆了两天。第七天一早，刘志仁又给我带来了饭，并且告诉我旗大队又回到了八仙筒，并且正筹备给罗云彪同志开追悼会，据说，这是八仙筒一个亲戚

同刘志仁说的。听到这消息，我喜出望外，恨不得一翅子飞到队伍里去。吃了点饭，我们俩正唠着，就听见鼓声了，觉得这消息可靠了，于是刘志仁在后，我在前顺小道朝八仙筒走去。当快到八仙筒时，一切气氛不差，我便加快了脚步。刚进东门不远，便遇上了梁部长和部分队员，老梁见我回来了，一下把我手抓住，说：“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七天，好比七年，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

相互介绍了几天的情况后，便着手筹备追悼会。追悼会按计划进行，一切都很顺利。

老罗牺牲了，我觉得他死的其所，一个共产党人用生命实践了其生前的诺言。一个江苏籍人长眠在奈曼大地上，最低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经过调查，那个劫持我们的人叫阿斯白乙，抓到八仙筒后枪毙了。还有一姓傅，外号叫二棒子骨的扒了老罗的衣服，抓到后给他吃了刺刀。

农历九月下旬，拿上梁部长给我的介绍信，肩负老罗的未竟事业同独立旅一起过了老哈河，取道鲁北到了洮南，从此，我便离开了家乡走向了新的革命征程。

马德山 整理

张念祖匪部被剿记

王吉祥

1945年8月14日，入侵奈曼的日本侵略者，闻知向其宣战的苏联红军和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已以势如破竹之势主宰了东北广大地区，苏联红军已进入了与奈曼隔河相望的开鲁县，便携眷和金帛珠宝仓皇而去。自此，奈曼人民结束了饱受日本侵略者十四年的残酷统治的亡国生涯。人民盼望已久的黎明终于来到了。

黎明不久，又有乌云遮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未到奈曼。奈曼治安由苏联红军安抚建起的临时人民自卫委员会维持，（也称维持会）奈曼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吉任会长。此组织建立后，倾向于国民党方面。在十月末，苏联红军刚刚撤走，便于11月1日派出代表赴北平向国民党汇报情况，并呈报《报告书》。同时，为了抗拒八路军，又先后派员分赴邻近旗县联络，以为应援。无独有偶，驻开鲁县的热北保安司令张念祖，也觉自己力单势薄。便于十一月中旬，也派人赴奈曼等地联络。来奈曼的说客与苏达那木达尔吉和保安部长洛不等等人交谈后，一拍即合。他们对外联合匪徒抗共，对内欺压百姓，敲诈民财。奈曼人民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46年1月13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向开鲁挺进，决定与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张念祖部决一死战。

张念祖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万状，当日夜里，带领一千余人弃城南逃，渡过辽河进入奈曼曼楚庙一带，成立了“热北七县联防指挥部”，张念祖自任指挥官，决定由奈曼继续向南而逃，到蒋管区投靠国民党部队。他一路招兵买马，网络匪徒扩充势力。十余天后，行至朝阳，见到了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经国民党热河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葛晏春禮閱宣布张念祖部由省方改编为“中央军”。

不久，这股冠以中央军名头的匪徒又卷土重来，欲在热北地区复建伪政权。二月末，张部进犯了奈曼，逼进奈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沁他拉附近，并妄图进驻大沁他拉街。而遭到奈曼旗临时自卫委员会哈斯通力嘎等进步人士的拒绝。哈斯通力嘎等听说新四军三师独立旅驻库伦办事处首长、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斯根等即将率部来奈曼开辟工作的消息，便派人去库伦报告情况。阿斯根和库伦旗委书记赵任远听了汇报后，赵任远当即写信，请求驻彰武的新四军老三师独立旅给予支援。阿斯根又率库伦、宾图等旗的自卫军，向奈曼进发，并写信通知哈斯通力嘎。

张念祖的欲望遭到拒绝后，便将哈斯通力嘎等进步人士抓去做为人质，严刑拷打，并在大沁他拉散布谣言，说什么哈斯通力嘎等已经答应张念祖进城了。强迫全街男女老幼排队迎接“中共军”。

张部进街后，还未等百姓们散去，就已兽性发作，原形毕露。在十字街口架起了机关枪，封锁四个城门。对老百姓一一查问，问是蒙古人，还是“蛮子”。若是蒙古人，就要受皮肉之苦，他们用皮鞭、枪把子狠命地抽打，拳脚相加。

口中还嚷道：“让你们自治！”哈斯通力嘎的家和一些蒙古同胞家被抄。哈斯通力嘎的妻子惨遭毒打，苦不堪言，后被邻居曲姓妇女带回家里藏起来，才躲过灾难。张念祖进驻大沁他拉后，取消奈曼旗临时自卫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伪绥东县政府，由在伪满时期曾担任过要职的侯勋烈任县长。全旗人民再度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正当全旗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煎熬之时，都盼望着拯人于水火的“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事如人意，那位由阿斯根派来的“绿衣天使”已乔装打扮进入街内。由于哈斯通力嘎尚在软禁，他费了几番周折，找到哈的夫人，将信交与她，让她转交。哈的夫人托人用二两大烟土买通了看守，把信转到哈的手中。哈见信中“我马上就到”的一行文字，心里非常高兴。事不宜迟，他为了及早脱身，便声称染病，需要去锡北的北老贵村治疗，得到出门证，带上了几人出了大沁他拉街。张念祖老奸巨滑，派人监视哈的行动。哈斯通力嘎甩掉尾巴后，于3月9日，在距大沁他拉街40华里的大沁庙遇到了阿斯根、赵任远所率蒙骑二师一部（库伦、宾图等旗自卫军）和独立旅二十七团蔡团长率领的两个营，他将奈曼的情况作了汇报。

此时，大沁他拉街内，由于哈的出走，而惊动了张念祖，他深感不安，便带领部分匪徒，居于大沁他拉街西的双合村。维持会也早已对张的行为怀恨在心，待机报复。他们听到哈迎接八路军的消息后，便将已被解散的驻大沁他拉街内的保安队员又组织起来，也去迎

接八路军的队伍。

他们也来到大沁庙，与阿蔡两军将兵合为一处，达一千余人。次日凌晨，兵分两路，发起进攻。左路军经刘家堡村向北猛攻，右路军经王宽营子（胜利村）挺进，直逼东门。弹指之间，两路军皆不费吹灰之力大破城门，直剿张匪司令部。仅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张部已溃不成军，丢盔弃甲。那个号称“中央司令”的“女将军”何林夫等一百余名匪徒被俘虏。住在双合村的张念祖，听见枪响后，带着随从从村西南沙坨子仓皇出逃。奈曼人民重新得到解放。

奈曼~乃蛮之辨析

奕赫乃蛮·达日玛

奈曼，是蒙语单词，现为地名，专指内蒙古奈曼旗。奈曼，又是一个历史名词。那么历史由来如何？含义何在？多数懂蒙语的直视为七八的八，略有历史知识的却多与满洲八旗相提并论，或者认为察哈尔之“八旗”等等，有种种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找不出其历史的根由和现实的依据是什么。

奈曼，是清朝以后的写法，只称一旗之地；清代以前多写为乃蛮，指一个部族之名，均有史籍可查。奈曼或乃蛮是个有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的专称名词。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各含何义？首先要考证这一名词的历史由来。考察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地名，对她的地域概念和居民成份要区别辨析。尤其对不动的地域范畴，即奈曼与游牧历史的北国部族—乃蛮相联系起来，更需要分别予以论证。现在的奈曼旗地域，历史上主要有鲜卑、契丹、蒙古三大民族部落先后居住，繁衍生息。现在是蒙古、汉、满等多民族友好杂居和睦相处。鲜卑、契丹以及女真人现在已经不以民族形式存在。但是他们的后代无疑是互相融化壮大了我们今天的各兄弟民族。从这里考察鲜卑人的遗迹比较难了。本旗白音昌（白音查干）乡有个

称作石碑的地名，并没有过石碑，可以断定是音译地名。这地方蒙语叫锡伯乌拉，“乌拉”义为山，可这“锡伯”一词，史学家们认为同于历史上的鲜卑，但这与“奈曼”一词毫无关系。契丹人辽代遗址这里到处可见。然而只能说明历史上的契丹人在这里曾居住过几个世纪，奈曼之义还是无从考证。好在“奈曼”为蒙语一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这里居住已四百多年的蒙古人的由来与其历史变迁。一则可以提高我们的自我认识，再则奈曼一词的真正含义就此可以辨别出来。

一、乃蛮~奈曼的历史由来

‘乃蛮’一词，最早见于《辽史》卷三十六天祚本纪。（天祚帝公元1101—1126年在位。）在这以前《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寿隆（昌）三年（1097年）纪，曾提到过“粘八葛”。《金史》记为“粘拔恩”，南宋《黑鞑史略》作“奈蛮”，《元史》有“乃蛮”、“乃满”、“乃马”诸译。用蒙语写成的《蒙古秘史》作“乃蛮”复数为“乃马惕”。明代史籍称察哈尔八部之一为“乃蛮”部。该部清初编为一旗，始称“奈曼”旗。以上各种写法均为蒙语“naiman”（这里注音用了汉语拼音字母，下同。）一词的历史各代不同汉字的音译转写，均指一个部族人及其领地。

古乃蛮部，兴升于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南支）上游八水河流域。据《多桑蒙古史》记，①唐奴山北谦河支流有八

条，呼和水连、额古纳木连、哈刺乌苏、撒宾筒、额气里、阿哈尔、朱尔其格和察干高勒，统称八水或八河，蒙语称作乃蛮木连。此地原属黠戛斯部，先后有乃蛮、秃麻惕、兀良哈人占居。所以史学家有的称作兀良哈的乃蛮高勒（八河），有的记为黠戛斯的乃蛮木连（八江）。《中国历代部族简明词典》收记，乃蛮部落人“因居住于黠戛斯的乃蛮木连流域，得名曰乃蛮部。”②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热爱故土，多以其故地称呼自己，并且变迁到何时何地都以此来称呼。这样乃蛮一词起先是河名，后指在那里兴起的部落名称，又随着这个部落人传遍于大漠南北，以及中亚各族人中。

古乃蛮部史迹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前。唐代乃蛮部属回纥汗国，世袭回纥官制，使用回纥文字。回纥西迁后，乃蛮部在漠北继承了回纥文化。据《元史》③和《史集》④记载，唐末（公元840年）黠戛斯人灭回纥汗国南下时乃蛮部随后向南推进，逐渐强盛起来，占据了也儿的石河至喀刺和林的广阔地区建立了部族汗国。黠戛斯人灭回纥汗廷时大部份回纥人被迫西迁和南下河西。而散留部份回纥人大量融入同一个文化的乃蛮部是很自然的。《元史》明确记入，⑤乃蛮汗廷掌印官塔塔统阿是畏吾儿人，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令他用本国文字写国语教太子、诸王等。乃蛮部里畏吾儿人当是回纥后裔，也当是乃蛮属民一支。“本国文字”，显然指回纥文字，也是乃蛮汗国通用文字。回纥人西迁以后到11世纪已经接受伊斯兰教，开始改用了阿拉伯文字，游牧生活也转向农耕方式。⑥13世纪初的乃蛮部里畏吾儿人和

西辽所属畏吾儿部人大不一样，有了很深的变化。所以，与其说塔塔统阿是畏吾儿人，不如说他是回纥裔乃蛮部人更确切些。并且有突厥、蒙古史学家认为“12世纪末13世纪初北方草原上堪称先进的乃蛮文化是漠北回纥文化的延续”。⑦

公元1204年，铁木真率部在鄂尔浑河东纳忽山崖大破乃蛮塔阳汗军，塔阳汗重伤身亡。蒙古军追至阿尔泰山，收服了南部乃蛮。蒙古军又追击塔阳之子屈出律，1206年在漠南黑水地方（一说是兀鲁塔山一带）消灭了塔阳汗弟不亦鲁克汗，1208年在也儿的石河地区又消灭了乃蛮和蔑儿乞惕人残部，北部乃蛮也被征服。乃蛮末主屈出律率少数部人逃到西辽，又收集了散布在伊犁河域的叶密立、海押立和别什巴里境内的原乃蛮汗国人民组成自己的军队趁机夺取了西辽统治权。⑧可见当时在那里的乃蛮部人也是较为强盛的。乃蛮汗国在西辽延续一段时间，直到1218年，在哲别所率蒙古军的打击下乃蛮人彻底失败，末主屈出律被捕杀。至此“蒙古人完全灭亡了乃蛮君主的强国。”⑨史称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一个庞大的乃蛮部族先后一部份并与蒙古各部，一部份融入于中亚各部突厥人中，逐渐遍布于整个蒙元帝国各地和蒙古汗廷内外。成吉思汗起用了塔阳掌印官塔塔统阿，汗廷中使用了文牍，并令他用回纥文字写国语，教太子、诸王及贵族青年识字。这里讲的国语当然是蒙古语。⑩这样现行蒙文的前身回纥蒙文也进入了在整个蒙古民族中发展的阶段。乃蛮部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壮大，尤其文化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元朝以后，据史料信息，至少有两支乃蛮人记入有关蒙古族史籍。一是察哈尔土绵之乃蛮部；另一个是永谢布——喀喇沁部所属一鄂托克乃蛮。

先说喀喇沁部所属乃蛮。据史籍记载，成吉思汗分给了额勒只带三千军队，“大多数是乃蛮、兀良哈惕和塔塔儿人。”其“兀鲁思（领地）和禹儿惕（部府）在东方，位于……长城边境，靠女真地区。”^⑪又据奥登著“兀良罕部变迁史”（蒙文）：“在成吉思汗时代，兀良哈人的者勒蔑后人分属成吉思汗外甥额勒只带，向东渐渐移至朵颜温都尔山麓麓之湖河岸边。”^⑫明初设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或兀良罕。明清时一直属者勒蔑后裔领地。者勒蔑是兀良哈人，身居要职为成吉思汗功臣，又是他布囊（驸马）。所以其后人将他布囊氏属部称为兀良罕。所属乃蛮和塔塔儿人也就匿名于兀良罕部里，史籍中不见了。16世纪中叶察哈尔土绵随汗廷东迁兀良罕地方后，右翼哈刺慎土绵，即喀喇沁部和部份土默特部也接踵东渐。兀良哈势力大为分散，分属了喀喇沁和东移土默特部，^⑬也有部份与察哈尔部相互渗透融合清代设卓索图盟，分编五旗，即：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和土默特左（今阜新）右（今北票、朝阳）两旗，还统称喀喇沁五旗。卓索图盟位于今辽宁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赤峰市南部份地区。原喀喇沁三旗和蒙古贞旗（土默特左翼旗）扎萨克（执政）贵族叫他布囊，义为驸马，并以此官爵为姓，今汉字姓记作“吴”。庶民兀良哈氏人，汉字姓译“乌”。“吴”和“乌”同为兀良哈的词头“兀”字谐音，并且他们均称者勒蔑后人，即兀良哈后人无疑。当初同

属额勒只带的乃蛮人后裔在这里还应是不少的。如今宁城县（原喀喇沁中旗）蒙民中有乃马惕氏人，他们汉字姓为“白”^⑭。

蒙古族史学家留金锁认为，北元时的永谢布土绵主要有永谢布、阿速惕、喀喇沁三部组成。蒙文史籍还称作“七鄂托克喀喇沁庞大的永谢布”。16世纪上半叶据地在宣府（今宣化）和张家口以北。土默特的俺达汗西征时永谢布和阿速惕人随军西迁。余部喀喇沁，16世纪中叶，东徙融合于朵颜兀良哈人中。16世纪末期史籍中所载“喀喇沁土绵”实际上已代替了永谢布土绵。但在“史籍中也能看到永谢布部成员布里雅惕、巴尔忽之外还有失宝兀沁、他本、乃蛮等鄂托克。”^⑮这里所记失宝兀沁和乃蛮两个鄂托克证实了永谢布——喀喇沁部含有兀良哈人和乃蛮人，并且沿袭到今天。奈曼旗蒙民中有姓兀良罕失宝失兀惕（失宝兀沁的复数格）和额勒只根失宝失兀惕、即额勒只带的失宝兀沁的，他们也说是者勒蔑后人。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失宝兀沁属原兀良哈人。原先分别称作永谢布——喀喇沁土绵和兀良罕朵颜卫，16世纪中叶以后融合一体的喀喇沁部所属乃蛮人，虽说历史印象不大，但是如上所述还是有史籍可查，并有现民成份能够证明。

再看察哈尔土绵之乃蛮部。据写于1739年的蒙文史书《金轮千辐》记载，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北逃时，蒙古“十个土绵有：察哈尔、喀尔喀、兀良罕、鄂尔多斯和土默特、永谢布、克列亦特、额鲁特、巴阿秃惕、忽牙克坦等。察哈尔土绵统辖：敖汉、乃蛮、苏尼特、乌珠穆沁此岭前东

四部；主亦惕、索罗惕、阿喇黑、阿喇黑赤兀惕此岭后西四部。”⑩乃蛮系原察哈尔八部之一。直至明末这一支乃蛮人一直属察哈尔汗廷管辖。属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嫡裔额森伟征属部。据《明史》、《明实录》等记，察哈尔汗廷16世纪中叶东移至辽东塞北黄水（即西喇木伦）以北。《辽夷略》记，乃蛮居敖汉都北，离义州五百里。根据史料，当时属察哈尔的八部有：克什克腾、浩齐特、敖汉、乃蛮、苏尼特、乌珠穆沁、阿喇黑齐特、主亦惕等。⑪乃蛮部仍属察哈尔，驻牧于察哈尔东边，16世纪中叶迁徙到今天的奈曼旗地盘。1627年察哈尔林丹汗率大军西进，敖汉、乃蛮二部脱离察哈尔林丹汗，留居故地。是年额森伟征之子衮楚克率属乃蛮部投后金（清朝前身）。清朝于1636年以满洲旗制将乃蛮部分编五十个佐领（苏木）划为一旗，始称奈曼旗。从此这一支乃蛮人与其居地称为奈曼直到今天。“奈曼”是清代以后的专称写法。

总之乃蛮部族人，从叶尼塞河上游兴起经过阿尔泰、杭爱山，分散于大漠东西，其中一支以原部面目东移至兴安岭延伸山脉南麓东部，来到了今天的奈曼地区，这样时过千余年迁徙万余里，“乃蛮”从部族汗国名演变为指一个旗地之专称地名词——奈曼。

二、奈曼～乃蛮的现实依据

奈曼，即乃蛮，无论人文地理还是语言文字中都有现实依据。

说人，古时的乃蛮部族和现今的奈曼旗蒙古人有着先人和后裔的延续关系。古乃蛮，作为一个部族强国，当时文化比较先进，人口众多，其内当然要包括很多部落氏族成份的。只是所见史书均无详载，尽管不易对证。但现在的奈曼蒙民中有很多蒙语姓氏尚能记得。据笔者多年查访已发现有近五十个蒙语姓氏名称，大多和史籍记载相对应。对此笔者已有另文评论（发表于《奈曼旗文史资料》第三辑），此文拟不做重叙。其中二十多个姓氏人是近百年来从外旗县移入或婚嫁过来的，其人数不很多。总之奈曼旗蒙民大多数是原察哈尔之乃蛮部人后代。但又有哪些才是古乃蛮部族后裔就难以分辨了。史籍不详，只有从民众之中寻找答案。况且应该相信人民大众也是民族文史的宝库。听奈曼旗老人们讲，在传说中“真正的奈曼旗蒙古人只有七个家族，即奕赫乃蛮（白氏）、达勒（梁氏）、达尔沁（陈氏）、塔塔儿（戴、王氏）侯布兀惕（侯氏）、蟒嘎惕（马氏）、欧吉额惕（吴氏），是从北冰洋来此地。”从北冰洋来的传说未免有些夸张。但可以提示这部人是从漠北遥远的北方迁来的，也合乎乃蛮部的历史变迁。这七个姓氏，当是原察哈尔之乃蛮部最早的成员。其中奕赫乃蛮氏家族人遍布全旗各地，人口众多，很可能是本旗蒙民第一大家族。人们都很风趣的说他们，“大老乃蛮的90条莽汉。大大小小120条莽汉”据说他们在过去个个都很粗犷豪放，卓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有性格，而他们才真正是古乃蛮后裔。老人们讲，“奕赫乃蛮”的“奕赫”之义不是“大”的意思，是有“河流源头”的意思（在奈曼蒙古口语中“大”和“源”是同音词），全称当解释为“根源于乃

蛮”。他们把氏族源头代代口述，母语姓氏千年言传，至今没有遗忘。可见这一家族先人来自古乃蛮部族是无疑的。这样又把现实的“奈曼”有机地和历史上的古“乃蛮”连接了起来。奈曼七大原始家族里还有达勒氏和达尔沁氏，亦有史据可证，也是古乃蛮成员。据达勒氏老人讲，他们是木华黎后人，因善于肩胛骨（蒙语叫达勒牙素）占卜，而取姓为达勒氏。成吉思汗大将国王木华黎是扎刺亦儿氏族人，蒙古各部族人多指本族名人为始祖或为本族象征性代表现象是常有的。奈曼的达勒氏不一定是木华黎后代，但可以认为他们是古扎刺亦儿人一支的后人。而有历史信息得知古“乃蛮强盛过程中，有扎刺亦儿、克烈、篾儿乞惕人融入其中。”^⑮奈曼旗有达尔沁氏，巴林右旗有达如沁氏，汉译姓同为“陈”，^⑯而《元史》里见有“答录乃蛮”氏^⑰这“答录”同于“达如”并与“达尔沁”词干相同；“dar—”，在《元史》里冠以乃蛮词头。可以推论“达尔沁”和达如沁，即答录沁是古乃蛮的又一支。奈曼旗蒙语姓氏中也有帖良古斯（腾氏）同于帖良古惕，是扎刺亦儿人一支；^⑱有何月奴惕（何氏），即克烈亦惕是克烈之复数格，可知是克烈部人一支；有哈嘎惕（闾氏），是篾儿乞惕人一支。^⑲如前所述扎刺亦儿、克烈、篾儿乞惕等都是乃蛮部较早的成员。所以奈曼的帖良古斯、何月奴惕、哈嘎惕等也属古乃蛮一支。此外还有阿刺黑赤兀惕（薛、华氏）、克什克腾（何氏）、胡齐惕（胡氏）即滑齐特等均是老察哈尔土绵的部族成份。仅这些也足以断言，奈曼与察哈尔属乃蛮、以及古乃蛮部落有着直接延续关系。

再看地理和语言的依据，现今的奈曼和古代的乃蛮也有一定的关系。谈起奈曼旗地名，都说奈曼旗有“七十二个塔拉，八十三个筒”，别有风趣。单说这“筒”字，是区别于其他邻近旗县的独有地名称呼。而且这种地名都聚集在老哈河和教来河流域过去树林多的地方。蒙古语“筒”词，专指树林多而密集的地方。奈曼旗口语中也组词叫“树筒”，义为大面积树林。古乃蛮部崛起的故地谦河八水之一，名为“撒宾筒”，“撒宾”义为流域，全称表示出这条河叫森林密集。可见古今“筒”词音义如此吻合。八水另一条叫作“哈刺乌苏”、义为黑水，指河称水。奈曼旗有不少河湖也称作水——乌苏。例如：沙日浩来苏木黑泡子村西河叫哈刺乌苏，义为黑水；大沁他拉镇西湖叫塔日甘乌苏，义为肥水。这样古乃蛮八条河名竟有两条河名叫法相互对应，不能说一点没有联系。还有沼泽地或水脉浅的地方，唯独奈曼旗口语与古蒙语相同，称谓“大池”，组词时变格为“大沁”。例如：简便的浅水井或土筒井叫“大池胡都嘎”；大沁他拉，伊和大沁，大沁庙等地名都从大池转音。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延续性是很强，然而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的演变是更为缓慢。上述“筒”和“大池”两个词是其他旗县口头蒙语中见不到的古蒙语词汇，可以说是古乃蛮固有的词汇延续。

奈曼旗与现在的察哈尔口语区相隔甚远，但是奈曼旗蒙古语语音特点也有和察哈尔口语相同的地方。这些特点甚至顺应了蒙古文字某些辅音字母不辨的特点。即：这两地口音都把“h、t、s、sh、ch”前的“b、t、ch”字音分别发成

“g、d、zh”字音。就是说和标准发音比较，h与g、t与d、ch与zh音有时混淆。而蒙古文字在著称回纥蒙文的阶段“ch、zh”二音以同一个字母记录，“t、d”和阴性的“h、g”音至今还是同形异音。这也可以说明回纥蒙文与古乃蛮部有着不解的历史缘分，以及乃蛮部和蒙古汗廷同在察哈尔土绵时期的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历史关系以及现今奈曼演变的历史由来。

古乃蛮的族属问题，史学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乃蛮源于蒙古，有的说来自突厥语族，或者说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尽管如是，但乃蛮属阿尔泰语系部族是无可争辩的，而且更多地继承了古回纥文化，也更多地影响和融入于蒙古民族文化中是可信的。所以应该说，整体的古乃蛮在其历史阶段先属回纥之一部，后与黠戛斯（吉尔吉思）以及阻卜（塔塔儿）、梅里急（篾儿乞惕）等并立于漠北。^⑳蒙元以后已经解体的乃蛮部族分属并融于中亚突厥系各族和蒙古族各部。以笔者拙见对于乃蛮族源可以商确是否出自拓跋鲜卑漠北余部，或并入突厥汗国之柔然残部，未免不可。总之，乃蛮的历史与回纥、吉尔吉思、葛逻禄是分合关系；与扎剌亦儿、克烈、篾儿乞惕等更接近一些，和他们是融合演变过程。元朝以后乃蛮人分别融入中亚各民族和遍迹于蒙古族各部地区直到今天，均能考证。乃蛮人13世纪以后大量融入了哈萨克和乌孜别克、卡拉卡尔帕克、吉尔吉思、巴什基尔等民族。^㉑有关乌孜别克五部史籍均记，乌孜别克92部含有乃蛮部。^㉒而现今的哈萨克民族中乃蛮仍是一大部族成份。根据哈萨克系谱学材料，融入哈族中的乃蛮人分成了九大氏族。在我国哈

族中的乃蛮人主要是喀拉克烈分布在新疆博州；多尔吐古尔分布在新疆塔城。②⑥在蒙古民族当中的乃蛮后裔更是遍布于我国北疆东西部各地。在东部如上所述奈曼旗和宁城县等地均有乃蛮后人，在西部据新疆蒙古族同志讲，他们当中也有乃马惕人，至今都没有被族人忘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有根有据，奈曼也就是历史演变的乃蛮。乃蛮或乃马惕，现今仍为一个部族和姓氏名称。乃蛮古时从地名转称一个部族的名词，而今天的奈曼，是从那个部族名称又回转称地名的字样，是多有现实依据的。

三、奈曼或乃蛮的语法解析

“奈曼”和史籍中的“乃蛮、乃满、奈蛮”等，均为蒙语同一个名词的汉字音译多种转写法。而“乃马”是这一名词的词干，“乃马惕”则为“乃蛮”的复数变格，在史书中常常交替使用，义用不变。还有“乃马歹”、“乃马真”，是“乃蛮”一词的性变格，分别指本部男女某人。中世纪蒙语的后加成份“歹”表男性、“真”表女性。

蒙古语是个连接语，词由词干和后加成份构成。“奈曼”或“乃蛮”等，注音为“naiman”词干是“naima”，即“乃马”，义为“八”，是数词。后加成份是“n”，连接数词后单称多为时位名词，如“naiman”也能指“八日”；又能组偏正词组，如：“乃蛮木连（八条江）”，称指谦河上游八条支流，即八水河。再转义称此八条河域之部落人为乃蛮部，词性也变为名词。蒙语名

词复数变格有个“d(惕)”型后加成份，连接“naiman(乃蛮)”时按蒙语语音规则舍去词根的“n”成份，形成“nalmad”，即“乃马惕”，义为乃蛮之众。蒙语数词不变复数格，所以“乃马”或“乃蛮”等在这里实际词义和词性均属名词。其原义或是说词干虽然是个“八”数，在这里就不能和七八的八等同起来。所以奈曼旗没有“八旗”之义，或乃蛮也就不是察哈尔八旗。再说察哈尔八旗不是指历史上的察哈尔八部，况且清代编旗时乃蛮已经脱离了察哈尔。察哈尔八旗同于满洲八旗，还有巴儿忽八旗等，是各正红、正蓝、正黄、正白和镶红、镶蓝、镶黄、镶白等八色旗号编制的清朝军政组织的总称，各为八个旗编制，而不是指其中某一个旗地。很显然更不能把奈曼旗和“八旗”制混为一谈了。

综上所述，奈曼即乃蛮，是一个有明确历史根源和多方现实依据的，分别指一个地区和一个部族姓氏的一种专称名词的两种写法。陈述部族和姓氏时应该用其历史的写法——乃蛮；称指本旗均以奈曼字样定型。又延伸义称奈曼旗各族人民为奈曼人等等。还是以人命地，以地称人。语言不分民族，无论古今通常如此。

注：①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一卷29页。

②道·苏达那木编《中国历代部族简明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版63页。

③《元史》63页。

④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136—137页。

⑤《元史》第124卷，“塔塔统阿传”。

⑥鲍·包力高：《蒙古文字简史》蒙文版23页。

⑦⑧⑬⑲⑳㉑巴哈提：“乃蛮述略”，《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一期。

⑨拉施特：《史集》第一卷二册，241页。

⑩鲍·包力高：《蒙古文字简史》蒙文版，19—20页。

⑪拉施特：《史集》第二分册，第一编70—71页。

⑫奥登：“兀良罕部变迁史”，《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年第五期48页。

⑬同上44页。

⑭⑮布呼努代·关处嘎：“蒙古姓氏汇编”，《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6年第四期，分别133页和144页。

⑯留金锁：“论永谢布土绵”，《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9年第三期18—21页。

⑰答里麻：《金轮千辐》蒙文版，342页。

⑱奥登：“蒙古东三土绵东移及其牧地”，《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9年第六期27—28页。

⑳〔日本〕植村清二：“乃蛮小考”。

㉑奇格：《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版46页。

②同上，52页。

③潘志平、纳比坚·穆哈穆德罕：“关于乌孜别克九十二部”，《民族研究》1988年，第六期71—77页。

兄弟争位案

希儒博

19世纪60年代，确切说于1866年，在奈曼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起嗣子袭爵纠纷案，一时轰动了朝野。关于此案之始末笔者在《奈曼旗文史资料、第三辑》上撰文刊载，已与读者见面，在此无须重述。

事物的发展是有其客观的规律性。尽管发生一些偶然的巧合，也毕竟包含着其必然性。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事情显然是他们之间不可回避的矛盾性所决定，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从1866年算起，历史车轮刚好前进了一个甲子，到本世纪20年代第七个年头，即1926年冬季，农历11月12日（1926、12、16）曾任昭乌达盟盟长、奈曼旗第十四任扎萨克和硕亲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病故。因他无嗣子承袭王位而在其继任者的确定上又演出了一场“袭爵闹剧”而两次闹剧尽管角色更迭，但其形式与内容如出一辙，可谓历史的重演。君若有兴请读下文，便可知其确否。

（一）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旧历正月二十四日，时任昭乌达盟盟长，巴林右旗扎萨克亲王扎嘎尔收到所属奈曼旗署印协理（亦称印务协理）达里扎布关于旗扎萨克继承者人选

的呈请报告，报告说：“民国十五年（1926）旧历十一月十二日，本旗扎萨克亲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病故、无嗣。案查已故扎萨克郡王玛希巴图尔生有六子：长子色楞旺宝在本旗清格勒阿木尔图庙（即波日和硕庙）出家充锡勒格图呼毕勒罕喇嘛（即活佛，亦称格根），前清光绪十八年（1892）领有度牒；次子扎萨克和硕亲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第三子辅国公銜二等台吉特固斯阿拉坦呼雅克（下简称阿拉坦呼雅克或三爷）；第四子自幼病故；第五子曾保协理之索特那木多尔济（即苏达那木达尔济，为五爷，下同）；第六子出家充托音^①喇嘛，叫古鲁巴萨尔。查曾保协理之苏达那木达尔济系玛希巴图尔正室禹吉所生。熟知蒙汉文字，为人忠厚，能理政务。兹经伊三胞兄阿拉坦呼雅克出具甘结^②情愿令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爵职。本旗除予备案外，理合据情恳祈盟长转呈上院（即民国政府蒙藏院），准以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爵职，俾资旗务施行。并附呈该员五代家谱。”此报告显然是保举苏达那木达尔济为扎萨克继承人，而且说阿拉坦呼雅克“情愿出具甘结”。

盟长阅此“报告”有两点不符合要求。其一，阿拉坦呼雅克“曾具甘结，然竟未具手模”就是说没有出具盖押指印的咨呈；其二，呈报请示向来要向盟长、副盟长和帮办盟务联并呈报，此已成定章。而今所收到的“报告”却“遗去副盟长，帮办盟务名衔，破坏旧章，殊属未符”。

为此，扎嘎尔盟长向呈送公文的差员根敦函送例行旅差费银33两折洋44元的同时责成根敦向旗扎萨克公署转达盟长“另行补文，迅即呈复，以便转呈上宪”的飭令^③，分明

是要求奈曼旗扎萨克公署按规定程序和必要手续重新拟文一并上报。

前后不差月许，也就是民国十六年的二月，奈曼旗梅林塔萨（汉名白子珍）到北京，前往扎嘎尔驻京公馆向盟长面呈一份“承袭爵职报告”。这个报告之前半部同首次报告雷同，在此不必重复。唯后半部有所不同。说：“公阿拉坦呼雅克系由侧室所生，身有疾病，不能当差。协理二等台吉苏达那木达尔济非但熟知蒙汉文字，为人聪敏，且有正室所生之别。若要令其承袭爵职，殊堪胜任。现年29岁。兹将其五代家谱一并呈上，恳祈盟长转呈，准予承袭，以资旗务”。

扎嘎尔盟长所见两份呈文不仅有别，况且责成根敦转达之“另行补文”饰令历时两个月有余仍不见旗署复文。这使盟长颇为疑惑。遂另行备文行查原委。直到同年五月十三日，奈曼旗署才以平函（即平信式，非正式公文）呈报“五爷及梅林塔萨在京已将承袭之事呈报蒙藏院”的复文。看来不需“恳祈盟长转呈上院”了。盟长见此“复文”只好说：似此要案以平函呈报殊属未符”外对属下“越级上报”也无可奈何。

（二）

时令已到同年的金秋时节。八月初三日，蒙藏院将奈曼旗阿拉坦呼雅克电控该旗“盗用空白（指空白行文用纸），捏造伪节④，私刊图章，朦混请袭”以及苏达那木达尔济“私借数万元外债大肆挥霍”等因之指控呈文上报国务院。

八月十日，民国国务院照会⑤内开，批示“交飭查该旗两造真伪情形”，责成蒙藏院查处并转飭昭乌达盟盟长衙门执行，要查清奈曼旗袭爵问题上截然不同的两次呈文的真伪情况。

昭乌达盟长扎嘎尔接到此项重要公文不敢怠慢，立即于八月十三日备文派员前去奈曼。盟长行文说：“对于苏达那木达尔济袭爵一案是否旗众曾具保结⑥？究竟保举何人？并将借数万外债之实情详细查明。要转集阿拉坦呼雅克、苏达那木达尔济、印务梅林塔萨等，以协理或管旗章京监押于旧历九月二十日送到本盟，以便详询呈院。不得托词作延有违上飭”。为此，将盟长印文交给委员（即委派官员）梅林章京布胡套克套胡、堂官扎兰希孟嘎送往奈曼旗遵照执行。

（三）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盟长特派员布胡套克套胡向盟长报呈称，“本职遵令至奈曼旗飭知一切情形。候至月余，该旗协理官员及在事重要关系人阿拉坦呼雅克、苏达那木达尔济等互相推诿，不令事情见绪，故意迁延时日之故，出于无法，始行旋回。”看来，他还是没有弄清袭爵真象。奈曼旗也没有执行盟长“于九月二十日将当事人送到本盟以便详询呈院”的飭令。不过旗扎萨克公署毕竟作了一些调查。其复呈中称，“本年九月十七日，准贵盟飭查本旗袭爵要案，遵飭复请袭情形。案查：

去年（1926）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鄙旗官员等集

于布里克都勒沁仓地方开会商议承袭事宜时其众均曾以由故王兄弟承袭为宜。又以五爷有益于旗，遂即决定保举五爷承袭。除在旗署备案外又具印文呈报盟长在案，未曾料及三爷反复行此电控之事。当特派委员当面向先在场的扎兰、佐领十二员、科员七员等详细问询，则均称情愿以五爷承袭爵职，各又坚恳不已。此外除有本协理官员等所递情愿保呈外别无其它异议。历此之久、三爷忽起争执，用电呈控之处本旗一概未知。兹将本旗原案尽呈来委查阅。

再者，去冬五爷赴京时由宝鲁浩舜庙（即波日和硕庙）格根喇嘛胞兄借款是实。至于什么“由外国人借款”一节本旗既不知情，亦无凭证”。

又称，“伏思关系人（指当事人）等本应遵飭急尽到盟候审。然因时局不清，道路艰难，合予请假，准其迟至，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盟”。活活将“九月二十日赴盟候审”的飭令推迟了两个月有余。

呈复中还称，“兹虽收取三爷、五爷、印务梅林塔萨、管旗章京赛色春、扎兰章京、科员等人之列名呈文，然因非系本旗应审之事，除呈来委查阅外附文呈上以备查核。”最后称，“谨此具情，呈恳盟长鉴核，迅予查判，以便承袭。

以上便是代表旗扎萨克署之协理官员的正式呈文。再将当事人的呈文表于如下：

“辅国公街三爷字，寄协理官员等。为详报实情事：去冬扎萨克王兄病故后准热河汤都统（即汤玉麟）来电内开，王爺病故无嗣，拟令台端⑦承袭爵职等因前来。

伏思王兄身在染病之时，因念旗众及同胞之前途，躬身前往北平、热河等处办处取销本旗报效荒地⑧事宜致病沉重而死。此恩此德虽痛哀亦能何报，必由其近支继给子嗣，俾得续其宗祀，恰为合理。作弟者何得谋袭以作篡位？而五弟带领塔萨前往奉天（今沈阳）汤都统母寿，由日本人大桑苏借款数万大洋，指物作抵有案可凭。由彼赴京擅用空白办处承袭。因呈院之文无兄弟、旗众保结，复又取去空白十张，由双福恃之仓上（即五爷住处），令台吉毛雅图送到北京交与塔萨。塔萨竟敢伪造保结，自充梅林章京伪刊名戳，签盖伪结，呈递上宪，希图侵夺。又为顺利其事起见，画出台吉、人民业地宽百里，长百里，使用空白作情进送。虽经协理官员去文劝阻、因不觉悟始行电控。虽蒙行飭盟长派委来查，然守候多日，协理官员等竟未报明实情。去冬（指正月二十四日呈文）协理官员等才递呈盟长，请以五爷承袭爵职被批驳在案。呈递蒙藏院及热河之原文被五爷与塔萨匿下，另以空白呈报本爵身有疾病无嗣云云。实堪痛恨！

现在五爷向委员声称，新旧职员以至扎兰佐领等均曾保举彼身，甚有以之为凭之概。其实查其原案并无一人出具保结，全系空言强辩。且其行为、知识及欺压存歿不知廉耻之处实在言之不尽！又携枪逼逐职员诸端人皆共知。若有一言虚伪，情愿即领诬告之罪。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本爵为顾弟兄义气起见与故王兄拟行继给应继子嗣，俾袭爵职，协理官员等京必亦愿同意。决不作新人宗祀之事，必给继子以袭其爵方为合理。胞弟五爷即系喇嘛又未受职，何得起意夺爵？使故王兄有所绝祀，尔协理官员等须悉此中深意！据事

之真伪无偏无袒一秉大公，将其用余空白及伪文单子、私刻图章等情，迅即呈明委员办理。倘要为之隐匿，难免日后干连。合并声明。为此，借盖仓戳而发”

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之呈文是：

“为知照署事：去冬王兄病故后，喇嘛大胞兄、公爷三胞兄、六爷胞弟，协理、官员长史、哈番、管家、十二扎兰、七名巡总等开会，推举五爷我承袭爵职。并呈哈达作贺时我以无才，提倡抽签掣定。众人不允，非令我承袭不可。众人既经议定，当面派定印务梅林塔萨、长史全宝（马老排）前往北平办理。全宝因置办都统母寿礼物不能前往，塔萨带领公文前往时我与塔萨同行。为给汤都统母亲拜寿到奉（天）、应遵先兄遗嘱清理北平债务起见到京是实。并无因袭爵职私自运动之事。但为本旗台吉人民曾有呈请热河都统准予开放旗产碱沙下地长百里、宽六十里一案未蒙照准竟择上地而放。

长史全宝往京带去款项若干，如何支使之处，我处并无账目可查，惟塔萨由我自宝鲁浩舜格根借来款中支使者有账。

取用空白及公文单子、旗署均有详案。

至由外国人借取数万大洋一节系属无影诬告，由该处电询即知。如有立契押借款事，请愿领罪！

胞兄三爷于父王在时即过继给已故协理林沁色伯克为嗣，拨给属下，划给参佐，均于蒙藏院比此可查。虽然如此，因我弟兄系由一父所生，故同居二十余年，于兹此次袭案并非我作侵夺。三爷愿让，我方应允，人所共知。倘三兄如

有冤情为何当时不报上宪而为坐观？且如有疑 竇 岂有不由旗署直行转呈？今日久之中，奸人从中煽惑，三爷如同梦醒，任意指控。致令受累之处恳祈转呈施行。为此谨呈”。

所附呈文还有两份。其一即“奈曼旗管旗章京赛色春为在盟长委员前据实详陈事：

去岁旧历十一月间，扎萨克王爷病故后，宝鲁浩舜格根喇嘛、公爵三爷、托音六爷、协理官员等共同商议承袭爵职事宜。格根与三爷、六爷等以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熟知公事，拟保袭爵职，当众即决定派印务梅林塔萨前往办理。嗣于十二月初六日职谒五爷，六爷提及由三爷领取让袭手模甘结。六爷称，以我弟兄情谊决无争执，甘结一节似不必取。惟尔等于呈文内拟入‘情愿相让’字样发行可也等语外，公爵三爷亦允许发后始行呈报盟长及蒙藏院前去。嗣于初八日塔萨起程时五爷往贺汤都统母寿，由彼到京，呈请盟长转呈蒙藏院。因奉飭令，具旗中官员签押保结，五爷旋回谕知。此情敝职始拟甘结盖章发去是实。

正此之间公爵三爷为何受人蛊惑，忽然生变，发电上控之处敝职实是不知，本应敝职亲赴上宪详陈，因敝职染受半身不遂，不能动转。故此备文恳祈转呈，为此谨呈”。

其二，“奈曼旗印务梅林塔萨为请转呈事：

去岁旧历十一月间，本旗扎萨克王爷病故后承袭一事经王爷胞兄宝鲁浩舜格根喇嘛及公爵三爷、托音六爷、协理官员，十二参领七名巡总共众措商，以五爷苏达那木尔济熟知公事，议决保其承袭。当众派定敝职及管旗章京全宝前往办

理。因全宝意欲后走，敝职于十二月初八日领到承袭公文与赴汤都统母寿之五爷同行到奉。与汤都统贺喜完竣由彼到京，呈请盟长转呈蒙藏院。因未具该旗官员保结未蒙照准。五爷回旗来时带领笔帖式多尔济前来取结。虽令台吉毛雅图将宝鲁浩舜格根及公爵三爷、协理官员保结送交敝职，惟管旗章京独自盖章除盖给外有余者均因无章而格根喇嘛及公爵三爷、六爷、协理官员等来函囑职‘就近代刊代盖章’。此正已办文呈报热河都统、蒙藏院之际，奸徒等蛊惑三爷生变，电控五爷及敝职。敝职始行施回。

指控“盗空白”一节，查给盖印之协理官员及空白之数目均于旗署有明确之记载。因何时用之处亦有报单在案。职系奉上官命令而行，并非任意擅为。且更无‘由外人借款’之事。

言‘为袭爵职押台吉人民产业’一节，尤属诬告。查该荒地系于先王在时被开（鲁）阜（新）镇守使张将军（张连同）率领数百军队前来住府近十日，强令绘具土地之图。而进送者谅于该管上宪地方必有当时具情呈报之案。三爷及协理官员等情愿进送之联名甘结亦必在热河公署有案可稽。以此一段即可知其诬告。

大概又谓，‘先王充当东四盟总司令系由敝职蛊惑’一节；查先王系自己遵吴帅（吴佩孚）之令而行。并自己辞退职任，过有二年，身始病故，人所共知。彼时职以当差资格跟随是实。为此谨呈”。

最后将一份联名呈文也录于如下：

“扎兰章京哈布图、哈斯宝鲁特、云端、伊达木扎布、根敦、布和、满塔嘎尔、都嘎尔、鞍勒济尔、额沁泰、棍布、科员满都胡、布林满都胡、额勒伯克桑、苏勒齐木多尔济、沙木巴、恩和、德比浩尔劳等谨呈扎萨克公署，为具情陈述事。

查于去年旧历十一月间，本旗扎萨克王爷病故后为承袭爵职事，宝鲁浩舜之格根喇嘛及公爵三爷、托音六爷、协理官员、职等措商以五爷熟知公事决定保其承袭爵职在案。今因盟长派委前来行查理合恳祈按照前次保举，准以五爷承袭。并将前次保举并未循私之处亦予转呈，为此谨呈”。

从上述六份呈文看，显然是5：1的状态，公爵三爷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四)

盟长特派员布胡套克套胡于十月二十七日回盟交差，禀明诸情之事如上所述。对所属奈曼旗屡违上级命令，盟长甚为不满。正欲再行飭令时蒙藏院于十一月初照会催办此案的公文已到。照会内开“飭将奈曼袭爵案详为究查”。

为此，昭乌达盟盟长亲自拟定再次行飭奈曼旗文。文曰，“于旧历十一月初九日准上院照会内开，飭将奈曼袭爵案详为究查。等语，查该旗轻视袭爵重案，屡误上宪飭令，殊属于例未符，理合再飭催查。照前后文情，毕传阿拉坦呼雅克、苏达那木达尔济、在事人等。并该旗职员及台吉人民之究竟情愿保举何人之甘保各结于十一月二十日派协理或管旗章京职之官员送往前来，以免有误。本盟长当面询明，转

呈上院之要公，勿再有违上飭。

为此，将此本盟长印文交由委员——梅林玛希朝克图，笔帖式、四等台吉扎勒丰嘎送往前去”

此文发出后，直到旧历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突破十一月二十日这一限期二十余日之后，盟长才收到奈曼旗复呈及单枪匹马前来候审之在事人阿拉坦呼雅克。

奈曼旗复呈称，“为呈复事：于本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准贵盟飭同前因奉此。案查于三爷阿拉坦呼雅克、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印务梅林塔萨等遵照前飭，预备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往贵盟之际，经本处先行呈报内称，正拟抄附旗众保结及三爷、五爷、塔萨与管旗章京赛色春等之呈文（指上面所列六份呈文）恳祈签核判断之际五爷为已故王爷周年诵经之事带领塔萨于十一月十一日前往宝鲁浩舜庙。来函令将彼与塔萨拟由彼处赴京，转报盟长处。此正在办理呈报之际因又来飭（指十一月十日飭令）。故令三爷阿拉坦呼雅克前往，恳祈免传赴京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及印务梅林塔萨。并转上院，俾资有裨案。

此文交由族长，四等台吉达木林扎布前往呈递”等语。

身赴盟长处之公爵三爷阿拉坦呼雅克又书咨呈递与盟长。呈文称：“为具陈争袭情形事，本爵因系奉传而来，惟有候审，焉敢多言？但其情形系，于去冬胞兄、扎萨克王苏无嗣病故后本爵之第五弟苏达那木达尔济与已革印务梅林白子珍、管旗章京赛色春勾串要袭爵职。本爵弟兄及协理官员等未允出保声言应按定例继给应继之子承袭爵职时苏达那木达尔济、白子珍二人盗空白四、五份声言赴奉汤都统母生日，

由驻奉日人达桑苏借取数万元即由彼上京办理承袭事宜而去。在此之际，管旗章京赛色春行文盟长请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爵职。又将呈热河都统及蒙藏院之文暗寄苏达那木达尔济、白子珍而去。嗣因情况不符被盟长批驳，并飭取具本爵甘结及书副盟长、帮办盟务名衔等因前来，未予照准在案。

因此，苏达那木达尔济、白子珍二人始知情理未符急将呈热河及蒙藏院之原文匿下另于盗去空白捏称，本爵有病不能行动，朦混上报，盟长处亦同样呈报。又令毛雅图、双福取去十一份空白，刻格根喇嘛胞兄色楞旺宝及本爵与第六弟古鲁巴萨尔并协理达理扎布、古诺玛迪，管旗章京赛色春，梅林忠奈、印务梅林海木齐克，印务扎兰苏达那木忠奈、布林特古斯，白子珍假充梅林章京之木质名戳，伪造甘结呈递上宪。本爵闻知情形，将彼私自勾串、朦混作弊之处电陈上院，飭令盟长于本年九月派员前来抽传重要关系人员时除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于未派齐旗员之际与白子珍、赛色春私自伪造旗众保结外，于盟长委员前并无其他一人具保画押。以本旗印文呈报两造。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盟去后，而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恐泄自己伪弊即逃往奉天而去。十一月十七日盟长遵照院飭复又派委前来相传时白子珍在家闻知亦向北平而逃，旗署内明有若干协理官员人在而管旗章京赛色春独自一人竟敢设计呈控，实在可谓能弊之至。该文如非伪造焉有协理官员等晤盟长委员而不提及呢？

现在，本爵弟兄及台吉人民旗众等均拟将本爵长子里默特拉巴哈继给故王胞兄为嗣承袭扎萨克亲王爵职，并愿作

保，是以依据正理，顺着人心而具此呈。

伏思，承袭爵职权在国家。彼等伪造保结，实为咎为应得。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既系行五、又未待授台吉之职，焉可断绝已故王兄之祀而袭其爵呢？因其品行不端，不守本份，近年以来种种累害，旗众人皆作为仇敌恨之，有案可稽。倘令苏达那木达尔济要袭爵职，一旗人民必无得安之一日矣！

兹为人民生存及祖上香烟起见出于无法具情上诉，恳祈盟长王爷鉴核，准以停止本弟兄之争执，眷怜本旗为念。将本爵拟将长子继给已故王兄为嗣，承袭扎萨克亲王爵职之意转呈上宪，以和人心，而重定例，存歿均感。为此备文详具”。

六爷托音古鲁巴萨尔转来有押呈文，报到盟长处，称，“去冬，次兄扎萨克亲王无嗣病故后，我弟兄等与协理官员等晤，议承袭扎萨克亲王爵职事宜。均曾决定以第三胞兄公爵阿拉坦呼雅克长子里默特拉巴哈继给已故胞兄为嗣承袭爵职。嗣后，因何生变，拟以五兄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伪刻我等名戳，捏造甘结呈递各宪之处未得面知。其实真正甘结迄今并无一人呈递”。

又据大胞兄、本旗庆格勒阿木尔图庙希勒格图喇嘛格根色楞旺宝派人前来盟长处递呈。呈称，“本兄并无画押保袭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情事。请将此情代转承审上宪。本兄因赴孟和昭地方不能亲身前往等因前来。本员亦因送格根兄不能亲身前往。理合具情恳祈盟长王爷鉴核施行。为此，具递手模呈文”。

显然，弟兄三人的呈文内情口径一致，都否定了老五苏达那木达尔济为代表的对立派的主张。此情是真是假确实难以断定。

(五)

盟长扎嘎尔审理此案感到不易判断，关系复杂，问题棘手。尽管没有断决是非，但总是有了眉目。他最后向蒙藏院所递交之咨呈中称：

“伏思，重要关系人五爷及塔萨等既未前来，既难对质。究询所来前后文供亦均互相不符。前次在职处所递呈内虽称其三兄阿拉坦呼雅克递甘结，请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扎萨克亲王爵职。然竟未见真正手模甘结到来，足见委系伪造。一面在职北京公馆递呈内称，公爵阿拉坦呼雅克系由侧室所生，身有疾病，不能当差等语前来。由同一扎萨克所呈印文竟有如此不同。阿拉坦呼雅克如真有病，为何于此严冬能来本职之处呢？查该员既无疾病，为人又正，章事又明白。

并查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梅林塔萨等于传案委员之前系允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到。不知因何要故，竟无一言即赴奉天。又，又奉院飭，派委前去时梅林塔萨在家闻知即行潜逃。以此观之，不知彼等有何弊端恐被泄漏而作躲匿耳？

按该旗署印协理达里扎布行文，各方词语欠符，儿戏上飭。被逃要员实在咎有应得！

至现在，阿拉坦呼雅克又行呈，诉冤情之处理应传集各

方当面质审。惟因不知重要关系人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因何托词诵经，率领塔萨躲匿？并怀何意，故作抗违？

特先具情呈报，恳祈钧院鉴核或俟苏达那木达尔济及塔萨旋旗再行传审呈报，抑在何处办理，请即示知施行。

为此咨呈蒙藏院。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扎嘎尔盟长之呈文，意向是显而易见的。蒙藏院是否根据盟长意向随时“鉴核”或者在某时某处“再行传审”苏达那木达尔济、塔萨等之后才行定夺，这些暂且不论，反正于民国十七年（1928）热河特区政府下达了任命阿拉坦呼雅克为“暂行代理奈曼旗扎萨克亲王”的委任令。此令的下达，说明蒙藏院既没有采纳奈曼旗协理官员们，包括苏达那木达尔济在内的“官方”的保举，又没有听取阿拉坦呼雅克将其长子里默特拉布哈过继给已故亲王苏珠克图巴图尔为嗣，以承袭旗扎萨克亲王爵职的“私方”建议。出乎意料地任命了三爷阿拉坦呼雅克。然而这是“暂行代理”的，非“终身正式”的。它仅仅是当局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充其量也只能起到点儿缓冲作用而已，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位的激烈竞争。

事实上，阿拉坦呼雅克虽为旗扎萨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职无权”徒有其名罢了，他的势力，至少在旗内是远没有苏达那木达尔济的势力雄厚。因为彼时旗署内掌握实权的协理官员以及所辖各区之官员等绝大部分是赞成苏达木达尔济充任旗扎萨克的。

直到伪满大同二年（1933）二月、奈曼旗沦陷以后，仍然是一如既往。后来伪热河省政府为慎重处理奈曼问

题而委派省府旗务科长吉川（日本人）来旗进行调查。并将苏达那木达尔济任旗扎萨克为宜的调查报告，通过省民政科上报到伪满政府民政部待批。于此同时、阿拉坦呼雅克方面也没有等闲视之。他们宣布，阿拉坦呼雅克已经被帝国政府民政部任命为旗扎萨克的所谓“正式委令”混淆了视听，此事被热河省特务机关长发觉后，立即向伪满政府报告，建议尽快下达苏达那木达尔济为奈曼旗扎萨克的委任状，以正视听，安抚民心。直到伪满康德二年（1935）三月，政府才决定撤销原绥东县治和奈曼旗扎萨克公署，合并建立兴安西省奈曼旗公署，并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为旗公署旗长。从此，历经八年的争位闹剧总算收场，落下帷幕。

注释：①托音：蒙古语、指旧时之贵族喇嘛

②甘结：旧时交给官署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为某事负责，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③飭令：旧时公文中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④⑥结、保结：旧时保证负责的字据。如保结，具结等。

⑤照会：这里指对有关事件的意见通知给对方的文件，非指外交文件。

⑦台端：旧时敬称对方的敬辞，多用于机关团体等给个人的函件。

⑧报效荒地：军阀强令蒙旗开垦荒地为其效劳。美其名曰报答恩情的报效荒地。

*括号内文是笔者所加。

我的僧侣生涯

嘎力僧扎木苏 口述

宝力高 整理

我叫嘎力僧扎木苏，大沁他拉莫河沟村人（现属桥河乡）。民国五年（1916年）生，现年七十六岁。

我记得四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叫道尔吉，当时在王爷府卫队当兵（旧时称小队子），所以父亲也顾不了家，我只好和奶奶一起过日子。我七岁那年孟根庙（法名功成寺）的大喇嘛那达那巴塔尔收我为徒弟，从此我就开始了僧侣生涯。孟根庙是我旗先后修建的二十四所庙宇之一。早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奈曼旗第十任郡王阿旺都瓦底扎布的陵墓就葬于此处，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了。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月，在这里建了奈曼王爷的陵寝庙——孟根庙，该庙的法名叫功成寺。当时庙址在王府村塔日干泡子（现居先锋乡）。那时寺庙上有四十多名喇嘛，我年龄最小。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的烙印最深的是寺庙里的清规戒律和喇嘛们合诵佛经跳“查玛”，使我非常羡慕。当时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喇嘛是唯一的“至尊”，喇嘛的权威甚至超越王公贵族。所以，喇嘛教传入蒙古的数百年间，大量的蒙古族青年当了喇嘛，人口逐渐减

少，人民趋向愚昧，生活更加贫困。

庙规和喇嘛戒律是相当严格的。一般庙上起居，诵经，就餐均有信号，统一行动。平时喇嘛们不得乱串，嬉闹，普通喇嘛遇到高级上层喇嘛时要立于一旁，低头让过才可走开；庙上的喇嘛要严禁淫欲饮酒和结婚，更不准妇女留宿庙内。特别是庙内有喇嘛组织，要求加入者必须忠实虔诚，经文水平较高，自觉遵守庙规和戒律的年满二十岁的青年喇嘛。该组织的戒律更严。如加入该组织的喇嘛不准吸烟，不能喝酒，更不能打人，骂人，不准搞欺骗、偷盗、赌博，淫欲，要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等等清规戒律。

庙上除喇嘛组织外，还有很多专职喇嘛。我旗前后所建的24座庙中，很有名望的和硕庙，达沁庙这类大庙上才有葛根喇嘛。葛根亦叫活佛。是喇嘛中学识较深并拥有最高职权的统治者。

葛根以下的高级喇嘛，有管理行政事务的“大喇嘛”和管理奉经事务的“奈丹喇嘛”。大喇嘛的助手有“德木齐”和“格斯贵”。奈丹喇嘛的助手有“翁斯达”和“嘎日巴”。葛根的主要辅佐者称“尚斯达”，他可以独揽葛根仓的一切事务。

下级喇嘛中有管理佛殿事务的“盖尼尔”，庙上的仓库保管员叫“尼日巴”，用面塑制各种神鬼像的喇嘛叫“朝伊格”，做文书工作的叫“笔切齐”以及吹鼓手“希热齐”等等很多专职喇嘛。再就是普通喇嘛了，他们一般是各负其责，逐级管理。

庙上还有所属庙荒地。普通喇嘛在庙上学经诵经外，庙

上分给一天地，即4亩左右地耕种，解决喇嘛们部分衣食问题。高级喇嘛分的地块一般都招耨青来耕种。

我到孟根庙上当喇嘛时年龄虽然小，但庙里的每月一次的例行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如正月初四至十二为优热力会^①；二月的美岱尔会；三月的东哈拉会；四月米格森会；五月的桑济德会；六月的亚日奈会；七月的祭水会；八月的美岱尔会；九月的优热力会；十月的米格森会；十一月为尼日德格会；十二月为年关会等等。每年还有几次跳“查玛”会。一般正月十五和六月十五跳弥勒佛查玛，五月二十五跳朝德华拉姆查玛；八月十五跳十大赫灵图查玛。“查玛”就是喇嘛们戴着各种神，龙，鸟，兽的假面具扮成各种神龙角色跳舞，诵经，意在驱魔逐鬼，保佑百姓。我在孟根庙学徒时，这些庙会例行活动都积极参加。1947年秋到乌兰浩特入学之前，我20多年的僧侣生活和功夫使我评职晋级为“嘎日巴”喇嘛。嘎日巴喇嘛的职责是管理奉经事物和组织好喇嘛们诵经并组织参加诵经会和庙会活动等等。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兰浩特成立之后，当时在乌兰浩特市办起了一所内蒙古医学院。各旗县市的寺庙都派出青壮年喇嘛入学学医。当时我们旗各大寺庙派出12名青壮年喇嘛入学的。我记得大沁庙（现属太山木头苏木）入学的有敖斯尔扎布；和硕庙（现属章古台苏木）有格力根扎木苏；包日胡硕庙（现属治安镇）有旺迪；哈他海庙（现属衙门营子苏木）有扎木萨，乌力吉；砮石庙，亦叫乌力吉庙（现属衙门营子苏木）有希日布扎木苏；图萨拉嘎齐庙（现属白音塔拉苏木）有占布拉；塔子庙，亦叫

“索布日根苏莫”（现属新镇乡）有宝音贺什格；绰尔吉庙，亦叫“喇嘛庙”（现属太山木头苏木）有希日布；新庙，亦叫“赛罕庙”（现属巴嘎波日合苏木）有扎木萨；瘸喇嘛庙，亦叫“敖来哈日盖拉庙”（现属朝古台苏木）有占布拉宁布；曼楚庙（现属平安地乡）有一个名额，但后来没有去人。孟根庙，亦叫功成寺，是我去入学的，当时包日胡硕庙和绰尔吉庙各去一位上层佛爷喇嘛，其它旗县市也有一部分上层喇嘛到乌兰浩特学习。我们学习三年都回各旗县行医，上层喇嘛一部分留在了乌兰浩特工作了。我们旗去的两位上层喇嘛，一个留在医学院任教，另一位到自治区佛教协会工作。

1950年8月份我们学业期满毕业回来，当时全旗各寺庙基本都被毁，长期饱尝了封建迷信之蒙骗和王公贵族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了。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人民群众并不了解这一座座古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在处理庙宇问题上采取了“驱僧毁庙，平分庙产”的全部砸碎的过头行动。当时和我一起入学的喇嘛们回来后，大都还俗成家，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现在还活着的有和硕庙的格力根扎木苏和塔子庙的宝音贺什格等。

从1951年开始，我参加了当时旗人民政府卫生科组织的医疗会。该医疗会共三十余人，是属合作医疗性质的，主要以治疗疾病和防疫工作为主。在医疗会行医期间我经常下乡到蒙古族聚居地区工作。如到西部淳尔图浩来，双合村等嘎查村行医，为广大农牧民服务。

1963年秋，我被调到巴嘎波日和公社医院工作。

1980年退休的。1988年冬，旗委统战部 and 旗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领导同志们邀请，我从巴嘎波日和苏木寺到旗王府修建的寺庙上主持和负责寺庙事宜。在今年召开的（1991年3月）政协奈曼旗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宗教界委员。我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带领信教群众在旗委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按着独立自主方针管好，办好寺庙，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为社会稳定，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中注释：

①优热力会——优热力蒙古语亦祝福的意思，是过去喇嘛们庙上的每月一次例行活动。各寺庙初四至十二都有类似诵经会。

清代末期的道日钦扎兰

王占山

据有关史书记载：清朝为对诸蒙古部落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推行了盟旗制，所谓“内四十九旗”之说亦从清代开始。当时旗的最高爵职称为“固山额真”汉语译为旗主。固山额真综理旗务，系世袭制，监督所属官吏，管辖一旗的户口、生产、教养、训练等事。固山额真下辖地方官吏甲喇额真。清太宗天聪八年（1636年）下诏把甲喇额真改名为甲喇章京，汉译参领，即“扎兰”。参领下设佐领，即“箭”。佐领管辖所属的人口、田宅、兵籍等。奈曼旗共设12个扎兰、50个箭。

位于大沁他拉镇东北三十多华里的昂乃乡东道日钦村正北二华里，西道日钦村正东一华里左右，现存有清代扎兰遗址一处。此处有大约两顷左右的黑土平地，这块平地现在是东道日钦村耕地，在1975年前是东道日钦村庄，因村子距离大沁他拉至通辽市的111线公路较远，交通不便，村屯住户逐渐南迁至靠公路北的叫来河老河道处。

东道日钦扎兰，三面环沙，南面隔几道黄土丘是叫来河老河道。据当地年长者说，当年扎兰北面、东面生长着茂密的黄柳。丛生的灌木，沙波嘎和野草深处，是狐兔野鸟出没的地方。西面和南面，在建扎兰时营造了大面积杨树，至夏季远望一片绿海。靠这片平地的西缘，原建有占地总面积一亩

左右的大院，当地村民称之为土围子。土围子院墙高一丈多，底宽五尺，夯土板筑，四角筑有高台，非常坚固。院内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形成四合小院。

此处扎兰建于奈曼旗第四任扎萨克鄂其尔执政时期（1686年），一直延续到满洲时期。道日钦扎兰管辖的地区即有缓缓沼坨，又有涓涓细流，沼坨间还有坦坦草地。这一地域是现在的昂乃乡、白音塔拉苏木、巴嘎波日和苏木、苇莲苏乡。

在绥东县的前前后后，伊登扎布任道日钦扎兰章京，他汉姓陈。奉管旗章京和梅林之命直接办理地方事务。其弟弟布和其格当地百姓称为三先生，供事于奈曼王府。伊登扎布娶妻三房（乌林其其格、哈斯其其格、斯其玛）。共生育二男二女。长子占布拉出家入庙。次子金巴（结发之妻所生）通晓汉文和日文，娶妻两房（龙眼、斯琴）。伊登扎布的大女儿荣堂，小女儿留喜（出嫁黄花塔拉）。布和其格早逝，有一子芨賚年幼时与伊登扎布同居，长至成年与其母搬到现在的西道日钦村东，建砖房七间，正房三间、厢房四间。娶妻万丽，生二子。至1947年前，伊登扎布同族共16口。

十七至十八世纪，是蒙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增加，独树一帜的蒙古医学，在奈曼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伊登扎布自幼攻读了大量的著名蒙古医学家专著。他善于融汇贯通，取其精华，不断丰富自己的医药学知识和诊疗临床经验。他经常去赤峰办药，也时常在当地采集一些草药。他四十左右岁时，蒙医造诣精深。行医中急公

好义。有一次串村屯，走艾里时，路过一户牧民门口，这户牧民家中几个月的婴儿昏厥过去，主人在急切之中，出门望见了伊登扎布，立即把他请进屋内，伊登扎布急速察看妇女怀中婴儿铁青的脸色。迅速从诊包中取出四根银针，接过婴儿用手关节从凶门量至下鄂，从太阳穴量至脑门子，针刺多处穴位，婴儿满面流出紫血，慢慢地醒过来。他又从药袋中取出药丸，加白开水研开，用药勺压住婴儿口中舌头，慢慢灌服于腹内，婴儿哭声大作，经过半个时辰后安静下来，经过一段服药，使这个婴儿不仅从濒临死亡时活下来，而且身体一天天强健。伊登扎布不仅善于把医药理论与医疗临床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还善于治疗多种妇女病，为消除“边陲贫者之疾患”做出了努力。

时过境迁，伊登扎布年老去世，东道日钦扎兰五六十年代尚存残垣断壁，随着村庄的迁移，扎兰房屋才彻底被毁，这些都已是历史陈迹。现在东道日钦扎兰遗址虽无村庄，至盛夏季节，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生长着碧绿的庄稼，周围的自然风光依然秀美，不失昔日风姿。

奈曼旗白音昌乡 酒局子村辽墓清理简况

张 宇

酒局子村座落于奈曼旗南部的白音昌乡。距大沁他拉镇约六十公里。此墓在酒局子村东北约200米。1991年秋，农田基本建设中，村民挖鱼鳞坑时，挖出此墓。披露出墓门楼镇脊兽。村长得知后，亲至现场视察，并指令停止挖掘，立即派人到文化站报告，并将挖到的镇脊兽及时地收藏，妥善保管。8月23日，旗王府博物馆派人专程到现场勘察。据初步断定为早期被盗墓。为了不误农田基本建设，防止古墓再受损失，经旗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于8月27日进行了清理发掘。现将清理情况简述如下：

一、墓室结构

（一）墓道

墓道由五花土回填踩实。清理后呈斜坡式，斜长7米，倾斜度30°，至天井处，深3.5米。

（二）天井

天井紧邻墓门，前接墓道，直接通墓门。深3.5米，长4米，宽1米，地面土墙。

（三） 门楼

门楼前接天井。门楼正脊两侧对称分立一镇脊兽兽头。龙首前视，眼似铜铃舌延口外，嘴似血盆傲升腾状。

脊瓦已破损，门楼正面下压磨砖假椽，檐下由十三组磨砖椽子与飞椽托起，椽下有三组斗拱。正中斗拱下乃拱型墓门。

（四） 甬道

斗拱墓门宽1.55米，高1.67米，进深1.5米，当为甬道。两侧壁与顶均由长32厘米，宽16厘米，厚5—6厘米的青灰砖砌筑。白灰压条，砖铺地面。清理时甬道内全部由平卧和竖卧砖塞满。

（五） 墓室

经甬道进入墓室。此室由于早期被盗，主室已积满淤土。经清理后，墓室呈圆形，穹窿顶。直径3米，高3.27米，回壁镶嵌柏木方，用长1.45米，宽、厚各0.15米的柏木方，两端阴阳榫榫吻接，上下层用木销固定，计二面九层，可做圆顶六角墓。

（六） 石棺

墓室的后部，有倒塌石棺内殓夫妇二人。女人的上肢被盗墓贼拖出棺外。石棺的长2.15米，宽1.65米，高1.15米，石板厚0.15米。两侧石棺帮长2.15米，高0.85米，雕饰云龙图案；头上脚下的二石板（即材头、底）宽1.35米，高0.85米，厚0.15米，脚踏莲

花，头顶碑雕左右雕二侍仆棺底长2.5米，宽1.65米，边缘雕石槽宽0.15米，以便竖立四壁石板。棺盖长1.75米，宽1.35米，上似古建屋脊，近似石室。其雕工细腻、文饰独特、造型美观，可想象出辽代北方这一少数民族雕刻工艺的发展水平。

二、随葬品

此墓由于早时被盗，盖顶石移开。为防墓室坍塌，危及生命，我们采用破墓顶清墓道的办法进行发掘，在原墓盖顶石的四周发现零散的铜质镏金的马具饰件若干，嚼环一付，马蹬二支，靴底（铜）一支，马兜铃一件。以下介绍的出土器物，也包括墓顶的出土器物。

1. 马具

出土随葬的马具饰件，因被盗已零乱无章，没办法配套和确定其摆放位置，只能按造型归类，分别介绍：

（1）、铜质马兜铃，I式4件。比较完整。由两个直径为6厘米的半球体拼接成一球体。球体上部的顶端，铸一铜钮高2.5厘米，宽1.2厘米，中凿直径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于穿带之用。下半部球体接近拼接处的两侧各凿直径为1厘米的小孔，用宽0.2厘米的窄槽连起两端小孔，球体的内部中空，内放直径0.8厘米的小铁球，走起路来铃声悦耳。

（2）铜质镏金三花饰件，I式7件，较完整。“凸”

字造型。长8.5厘米，高5.5厘米，宽2.5厘米，铜片厚0.2厘米，表面压印菊花纹饰。

(3)、铜质镏金条带饰，I式59件，残损30件，其余比较完整。体近长方体，边缘压印颗粒状矩形纹，内部压印菊花纹。长5厘米，宽2.2厘米，铜片厚0.1厘米，折叠体厚度0.8厘米。II式1件，亦做长方体状，但有一端呈弧形。折叠后的厚度0.8厘米，铜片厚度0.1厘米，矩形长5.2厘米，宽2.7厘米，边缘压印矩形粒点纹，内里压印菊花纹。III式1件，残。近似梯形，如能复原，可想象为两端狭窄，中部较宽近似菱形体。现残长5.7厘米，下宽3厘米，端宽2厘米，体厚0.6厘米，边缘压印粒点纹。内里压印菊花纹。

(4)、铜质镏金带勾一件，由两个中空的椭圆长方形组合而成的。中间的横柱长4厘米，将二长方椭圆形连成一体。横柱中部接一个长3厘米，宽0.4厘米，厚0.4厘米的卡条做大肚或小肚的卡扣。两个长方椭圆状的大椭圆状大外径6.2厘米，内大外径5.2厘米；小椭圆大外径5.5厘米，内大外径4.5厘米，相当于现代的肚卡。II式3件，残其一。状似烧瓶。有椭圆形孔，大内径2.8厘米，大外径3.7厘米。穿卡孔呈小矩形，长0.8厘米，宽0.3厘米，中有一0.3厘米的横柱与卡条吻接，可做笼头卡用。III式1件，较完整。由长3.7厘米，宽3.4厘米的镏金铜片制作。上下各有矩形孔，长2.5厘米，宽0.5厘米的铜片隔墙分割2孔，很近似现代带卡。

(5)、飘带卡箍，I式3件，完整。由“十”字形的

铜质镏金片构成，十字的横长4.2厘米，宽1.8厘米，铜片厚0.1厘米，两端呈半圆弧，上面压印菊花纹。十字的一竖长7.5厘米，宽1.6厘米，边缘压印凸起的粒点纹，将它弯成上下两个半圆，做为飘带的卡箍饰。

(6)、铜质镏金带箍，I式3件，完整。由宽0.8厘米，厚0.2厘米的铜片，折弯成大内径4.1厘米，大外径4.5厘米的椭圆形带箍。II式1件，由宽0.6厘米，厚0.2厘米的铜质镏金铜片折弯成大内径2.4厘米，大外径2.8厘米的椭圆形带箍。

(7)、铜质镏金桃形饰，I式4件，残2件。高3厘米，宽3.2厘米，用0.1厘米的铜片折压成桃形饰。上面压印菊花纹饰。

(8)铜铸马蹬一付，重1200克，高17.5厘米，宽12厘米，蹬板宽4厘米。

(9)、银嚼环一付，完整。长28厘米，重400克。

三、锁 件

双鱼铜饰，I式2件。头并头，尾衔尾。头至尾长5.3厘米，合两鱼身宽4.6厘米，中凿二矩形孔，从上至下，上矩形竖长0.8厘米，宽0.4厘米；中矩形横长1.6厘米，竖宽0.5厘米；下有椭圆形孔，竖内径长1.1厘米，横内径长0.8厘米。II式2件，单鱼铜饰，头至尾长5厘米，宽2.3厘米，鱼身中部凿矩形孔，长1厘

米，寬0.5厘米。

四、佩件飾

(一)、銅質鍍金帶配飾1件，殘。長5.2厘米，寬4.4厘米，由0.1厘米厚的銅質鍍金片構成。四周用0.2厘米厚，0.7厘米寬的銅板，折彎成矩形，內里銅片壓印菊花紋。中間爛掉一近似圓形，直徑為1.5厘米的孔。Ⅱ式1件，殘。四周边緣用0.7厘米寬，0.2厘米厚的銅質鍍金板，折彎成長9.2厘米，寬4.5厘米的矩形。其中一端呈弧形，內用0.1厘米的銅質鍍金片與四框銜接，壓印菊花紋飾。Ⅲ式1件，殘。銅質鍍金帶飾，長5厘米，寬4.5厘米的矩形邊緣用寬0.7厘米，0.2厘米厚的銅板，折彎成矩形。內用0.1厘米厚的鍍金銅片壓印菊花紋與四框銜接。

(二)、鍍金網絡球飾1件，完整。用0.2厘米的鍍金銅絲，編織成直徑為1.5厘米的銅質鍍金網絡球飾。

五、瓷 器

此墓出土的器物，无一幸存。經拼接修復而成的器物，只占出土器物的一部分。在此只能就成形器物，簡述如下：

(一)、鳳首瓶一件，殘。碗口狀嘴，嘴下足

(颈的上部)，啄与冠突出足外，颈为风颈，斜肩鼓腹，下柳敛至足，外刻四道沟旋纹。圈足。整体的四分之三施绿釉。肩上有两道沟旋纹，肩下三道沟旋纹。通体高5.9厘米，当为辽代瓷器工艺的佳品。

(二)、提梁式鸡冠壶，I式2件，均残。圆柱形口径，柱高8.5厘米。提梁柄冠状，指压纹。皮囊式腹。腹的下部至圈足未施釉。圈足口外侈，足高1.8厘米。通高4.7厘米。腹的上部至顶施黄褐釉。

(三)、长颈瓶I式2件，残。喇叭口，细长颈，柳肩，肩上有凸起的旋纹，肩上逐渐收腹至足，圈足。腹下部至足质地粗糙未施釉，其余施黄褐釉，通体高3.5厘米。

(四)、提梁黄釉葫芦瓶一件，残。在葫芦凹间恰好在提梁的中空部位，上下两端与葫芦的两个腹位相吻接，葫芦瓶的注口在顶部。下腹的中上部饰两道沟旋纹，下腹的肩上亦饰两道沟旋纹，壶嘴正好衔接在沟旋纹上。嘴口与颈平。通体高2.9厘米，绝大部分施黄釉。只见下腹的下部至足未施釉。圈足高1厘米，质地粗糙。

(五)、钵一件，残。折肩内敛口，圆唇，口径1.8厘米，腹径2.2厘米，通体高1.3厘米，施黄釉，腹的下部与圈足未施釉，足高1厘米。

(六)单耳碗一件，残。口径1.4.5厘米，腹深4.5厘米，平底。口径下0.6厘米的外侧有一横等腰三角形的花饰，其底与碗的外侧吻接，下接单耳，通体施乳白釉。

(七)、三彩海棠托盘一件，残。侈外折口沿，折平口宽2厘米。饰施绿釉卷云纹，黄褐釉的边。腹的内外壁施黄褐釉。托盘内底为绿釉叶脉纹。

(八)、平底方盘一件，残。好似开放的莲花，由四边翘起的花瓣构成方盘的四壁。方口每边长11厘米。外壁细腻平滑，施白釉。内壁压印菊花纹。盘底内用凸起的直线组成双线内外二正方形，外切于直径为6厘米的环形圈。圈内由同径长的四组环形弧组成四组叶片，分别压印菊花纹饰。中间呈菱形，亦然压印菊花纹饰，方形的四角压印“云字勾”纹。方盘边壁的四角花瓣上配以展翅的蝴蝶，飞翔在花丛之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如一幅自然画面。加之胎质细腻，做工精湛，确属不可多得的定窑瓷工艺。

六、兵 器

本墓剑一把，残。柄与剑身仅剩37厘米，宽5厘米。柄长14厘米，由于数百年埋于地下，被土腐蚀掉漆色，不辨本来面貌。

七、结 束 语

此墓经三天半时间的清理发掘，可以断定为夫妇合葬墓。男居内，女在外，头东北脚西南。头饰和手饰均无所见。只发现靴底二付，和女人的钢质鎏金面具，二人均着装

铜丝网络，别无证明二人身份与身世的实物。但从墓的形制及殉葬的实物，可证实为辽代晚期墓葬。其石雕艺术，定窑瓷堪称辽代一绝，为研究辽代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奈曼旗出土辽代马具饰件

张 宇

1991年5月，奈曼旗苇莲苏乡卧风甸子村牧民在村南五公里左右沙丘的黑土坑内，发现地表有砌筑的青砖。由于该人长年野外放牧，对保护文物认识不足，又处于个人好事猎奇的心理支配，不由自主地往下挖起来，结果挖出一由青灰砖砌筑的长方形坑，从内发现马具饰件。奈曼旗王府博物馆得知后，立即派人去现场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简述如下：

一、砖室墓的结构

卧风甸子村，位于奈曼旗的北部。它北以西喇木伦河为界，和翁牛特旗接壤。此墓座落于卧风甸子村南部沙丘底下的黑土层内。附近地表有散落的青灰色篦纹陶片。被毁的古墓四周，散布大量青灰色沟纹砖的残骸，砖长约31—32厘米；宽15—16厘米；厚5—6厘米。青砖烧制的火候较低，中间夹生蕊，结构疏松。墓呈长方体，长1.6米；宽1.4米；深1.34米。由于墓顶塌陷破坏，已无法确认墓顶结构。墓室内布满五花土，未发现人的骨架，只发现马具饰件，铜镜一件，灯

台一件。

二、出土器物

出土的马具饰件全部是铜质镏金。因为调查人未到达现场前，饰件已全部被牧工取出，现已无法确认摆放的位置。只能将出土器物做以介绍：

1、马具饰件

(1)、马兜铃 I 式 9 件，一件残。其余完好。其形制大小完全一样，是由上下两个空心半球体粘合而成。下半个球体中部有一 5 厘米长，0.5 厘米宽的空心槽；上半个球体的顶部，焊一中空小钮，纽带宽 0.6 厘米，圆心孔的直径 0.5 厘米。以便串联配饰。球体中空，直径为 5.5 厘米，内置一件手指肚大小的铁砂，马踏碎步发出悦耳的铃声，显得人马更加威武英俊，先声夺人。II 式 5 件，2 件残，其余较为完整。II 式与 I 式马兜铃形制相同，大小不一样。高 2.5 厘米，直径 2 厘米。下半个球体的空心槽，宽 0.2 厘米，长 1.5 厘米，两端凿直径为 0.5 厘米的两个圆，内放豆粒大小的铁砂，马走碎步，铃声咕咕。

(2)、桃形饰件 9 件，完整。长 7.5 厘米，宽 6.5 厘米的桃形叶铜片上顶焊卷鼻式纽，纽带宽 0.2 厘米，做配带之用。桃形叶上鑿菊花纹饰，象征吉祥、富贵。

(3)、三叉股三花饰件 I 式 4 件，较为完整。呈“凸”字状。三个端点的顶部为弧形。长 7 厘米，高 5.5 厘米。交叉部位呈突起的半球体，高 2.5 厘米，表面镂空菊花纹，精湛的工艺，栩栩如生。

II 式 4 件，完整。亦做“凸”字形，比 I 式三花饰件小。长 6 厘米，高 4.5 厘米，交叉部位的半球体高 2 厘米。丁字式的三角形顶部饰雕展翅的蝙蝠，中间突起的半球体四周饰鏤回纹，球体上鏤盛开的菊花。

(4)、铜质鎏金条带饰件，I 式件，完整。长条形，两端呈弧形，长 4 厘米，宽 2 厘米，厚 0.3 - 0.4 厘米，两端鏤饰蝙蝠，中饰鏤“寿”字，可取做“富贵荣华”之意。

II 式鎏金铜质条带饰件，形制与 I 式相同，稍大于 I 式。长 4 厘米，宽 2.2 厘米，厚 0.4 厘米，表面饰鏤雕菊花图案。

III 式铜质鎏金条带饰件，长方形体，一端呈弧形。长 4 厘米，宽 2.1 厘米，厚 0.5 厘米，表面饰鏤雕菊花纹图案。

(5)、铜质鎏金条带卡，I 式件，完整。呈蒜头瓶形，高 5 厘米，厚 0.5 厘米，下端呈椭圆形，太径 4 厘米，中部置条带销，长 2.4 厘米；另一部就是蒜头瓶的颈，顶端为弧形，宽 2.2 厘米；正面鏤菊花纹饰，卡圈框鏤菊花纹图案。

(6)、铜质镏金桃花饰件，1式4件。完整。直径1.5厘米，桃形饰上饰髹雕菊花纹。

Ⅱ式3件，大小形制与Ⅰ式桃形饰相同，所不同处即牌饰内又凿一桃形小孔，大直径为0.5厘米，外围髹菊花纹饰。

(7)、铜质镏金虎头饰件，Ⅰ式2件，完整，呈上下窄左右宽的椭圆形球状。上下宽1厘米，左右长1.2厘米，虎头偏下凿穿一个长1厘米、宽0.4厘米的血盆大口。其边缘四周，耳、鼻、眼等五官，显出虎的雄风气势。

2、莲花灯台

莲花灯台一座，残。现通高52厘米。底座圆锥形，现存三盏灯托，每个灯托由上下两片铁片构成，上片圆形直径为10.5厘米呈盘状。下片由十字花瓣形铁片托衬。顶端一盏，左右对称两盏。（其中一盏已烂掉，只存托颈。）盏托下设由十一枚叶径捧衬。灯盏点燃后，看似繁茂盛开的莲花，别有一番境界。

3、素面铜镜

素面铜镜一面，残。直径30厘米，边缘宽1.5厘米。悬纽半球体，直径2厘米。铜质素面镏银镜，银质部分脱落生绿锈，未脱落部分的光华雪亮光彩照人。

据现场勘察确认为辽代器物。马具饰件、灯座、铜质镏银镜，均为随葬品。虽未发现骨架，但从沟纹青砖，土坑砖室墓的造型，附近采集的陶片，均不否定为辽代早期墓葬。此墓出土的马具饰件，均有铜质镏金，其工艺精湛，雕工之

细腻，可为辽代马具的佳品。马具饰件的出土证实了契丹游牧民族，以骑射狩猎为主的特点。从而也给辽代手工业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中庸道”在奈曼的活动

梁凤云

“九、三”光复后，反动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聚集在奈曼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及封建会道门活动猖獗。为了维护其反动利益，阻挠革命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他们纠合一起狼狈为奸，一方面以武力骚扰迫害人民群众；一方面大搞反革命宣传造谣活动。奈曼旗政府成立后，反动会道门组织“中庸道”公然与政府为敌，标榜国民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干扰人民群众的民主斗争，妄图挤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给当时的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中庸道又名“圣贤道”，是国民党特务扶植起来的外围组织。它是利用群众传统的迷信心理，专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运用“铺坛”的方法，发展道徒，制造谣言，迷惑信徒，蛊惑人心。使部分群众不能够充分信任新生的政权，对当时的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民主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

一、来源与活动

封建会道门在奈曼旗的活动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早在民国六年（1917）就有敖汉旗九分地的张泰斗来奈曼办道德学社，发展信徒。后改称为“红十字会”。民国十八年

(1929)，又有一名叫张福珍的人从山东接来了“明佛”，来到本旗青龙山地区的卧龙泉子村，发展道徒，传播“明佛道”。以后，明佛道就改称“中庸道”。中庸道也就由此而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道徒很少，所以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影响。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庸道总法师从山东来到与奈曼接壤的阜新地区，召集各地区中庸道法师会议，讨论发展道徒，扩大组织事宜。在这次会议的鼓动下，中庸道组织在我旗境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也有了较大的变化。

伪满康德五年(1938)，中庸道法师李凤芝从老家北票来到奈曼地区，他一边做木工活，一边考察了解中庸道的发展情况。康德八年(1941)，李凤芝向阜新法师分会首领详细汇报情况后，分会首领立即委派他回到奈曼，巩固原有组织，做好这一地区的信徒发展工作。自此，李凤芝树号“李老人”，当起了“中庸道”信徒的首领。

中庸道组织内有法师、总传师、引进师、铺坛师、批礼先生等信徒首领。法师亦称云主，吸收信徒、传授道规及传播谣言等均由法师在“铺坛”中进行。总传师负责协助法师召集会议、传递信息、处理道内的各种活动；引进师则是从事引进群众入道的中间人；铺坛师为升香铺坛仪式的操办者。法师每次“升香铺坛”都是在引进师、铺坛师、批礼先生的协助下进行。由于中庸道活动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铺坛都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地点也多是在道首家或者道徒家，并称此家为“大清国承德府奈曼旗×家香堂”。铺坛中

门外设有道徒放哨，在仪式开始前，铺坛师围好窗帘，放上八仙桌，用三个白碗，放好供品，再用一个白碗做香碗升上三柱香后，铺坛师退出堂外。然后坛主身着道袍，头戴道冠，洗手、净面后盘坐桌前；道首及待入道的人净面后分次序跪在其后，铺坛开始。在入道仪式中，坛主首先劝道“为人一生，生死簿都在阎王爷手里掌握着，人已下生，八字造就”；“为人要和睦相处，不要杀生害命，不要偷人家的东西，行孝父母，尊叔掌上”等。新道徒称师签名后，坛主传授八字真言“弟子给老天爷磕头”和道规“父母不传妻子不言，如说一字，天打五雷轰。”然后讲道：入道者能躲三灾八难，死后不变六畜，来世转人。世界一周转28000年，每转一周就有一次劫难，这是天盘规定的黑罗大劫。28000年的黑罗大劫就要到了，那时刮七七四十九天钢风，人草不剩，鸡犬不留。平地三尺，房倒屋塌，不入道者死，世界上只剩下入道者。铺坛时写上名字就是天堂挂号、地狱抽名”。铺坛完毕后，新道徒向法师交上贡品、道费以示诚心。以求得道书中所说的“今世赠一文，来世得万文”的报应。

1941年，管道法师李凤芝来到八仙筒附近的麻吉干筒屯，他肩挑货担，走家串巷，一边卖些香、纸等物品，一边宣传道教，并散布一些“一万两千年一大混沌，不入教的都死净，入教的扎六万年人根，死后还托生人并免各种灾难……”等威胁言论。纯朴善良的百姓由于长期受封建迷信的愚弄，自然信以为真，很快地就有许多群众加入了组织。这些信徒为了让自己的亲友也得到道教的“恩惠”，他

们也拉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及亲朋好友加入组织。1942年，经小道首张某的介绍，李凤芝还深入到四林筒、接都及其附近地区，升坛传教，接受众多道徒和钱物。为了增加活动经费及信徒之间的联系，本组织还规定“四季六节”，道徒们于每年春、夏、秋、冬季节都要上交节钱，作为培育来世生人的“大根钱”。每逢三月初三，七月二十五为道内大型活动日，信徒聚会，举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道首们在此期间传播一些挑拨离间蒙汉民族关系的谣言谬论。

二、发展与影响

中庸道组织是一个封建迷信的社会组织，法师也是一个身披宗教外衣的吸血鬼。所以，为反动势力服务便是他们的本性。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中庸道总法师与国民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其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撤离奈曼，伪旗长带领部分队伍去开鲁拟求苏联红军不入旗境，被苏联红军缴了械。在这时局难定的时候，以李凤芝为首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为了求得国民党的赏赐，积极铺坛游说。一方面挑拨蒙汉民族关系，扬言北蒙古人要反啦，要杀汉人。连妇女儿童都找套马杆子套汉人呢，那时就得九女守一男十女守一夫了等等，扰乱民心；一方面传播反革命谣言，什么“八路军是恶鬼，鬼门关开了，该收了”。“八牛（指朱德总司令）枉费千斤力，将来木子（指李宗仁）走江山”，甚是器

张。他们制造先入为主的舆论，企图从思想上阻止人民群众对革命武装的向往，引诱民众信奉国民党的统治，并同反动武装势力相呼应。企盼着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到来。

1946年3月，八路军开辟工作队来到奈曼，击溃了反动武装，建立了奈曼旗政府。5月，旗政府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工作。中庸道法师看准这个机会，劝说道徒不要参加斗争。说什么“大清大算来到了，不要杀生害命，别打人，别贪人家的东西，要和睦相邻”。用“天命”解释贫富不均的生活，以削弱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7月，旗政府在王府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试点，中庸道法师来到王府区秘密发展道徒，并升坛造谣：“庚子年（1960）土地归本主，再婚女子回归原来的丈夫”。冬季以后，全旗划分阶级工作开始，土地改革在全旗展开，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而中庸道首们则在道徒中传播：“八路军讲民主是星地，天下混乱，明星斗皆无”，“百个金翅鸟往西行，九十九个飞在空，剩下一个留在东土惹祸星（剩下这一个指毛泽东）”；“不要信八路军那一套，八路军的失败和日本鬼子在时一样，不知不觉地就败了。蒋介石有美国的帮助，能返回来”的反革命谣言。并用“五行”神秘地解释阶级的划分：地主是金，富农是土，国民党特务是水，手工业是木，贫雇农是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道首们在群众中间煞有介事地传播着：“推倒大佛殿，胡人一扬乱，北方壬癸水，属黑北蒙；北蒙反，杀汉人，九女守一男，十女守一夫”的顺口溜。贫苦的信徒虽然盼望翻身后的幸福生

活，却因为受到这些反动言论的影响，停滞了迈向幸福生活的脚步。

1947年，旗政府为了支援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组织兵源，先后三次在人民群众中征兵数百名，并且组织担架队随军开赴前线。以李凤芝为首的大小道首暗地里在道徒及百姓中间传播：“天下十三省各有灾难，青年男女不要拉枪栓，动枪栓必死无疑”，“现在是人灾地薄、债债抽条，红尘无福，抬担架就是过大眼筛子，多数都得死”的破坏言论。曲解参军的“参加”两字，人字下面三撇就是撇家庭、撇父母、撇妻子，“加、参”则证明八路军“另”心强（别有用心），人上圈套圈，是让人套（骗的意思）去了”。

中庸道组织在破坏人民民主运动的同时，秘密地发展了大量的道徒，为了增加其反动言论的传播面，这个组织除在注重嘛吉杆筒、接都、大树龙沟几个重点地域的道徒组织发展外，还在全旗大部分汉族聚住区发展了许多信徒，设立了组织。据有关资料记载，1947年1至5月间，反动法师李凤芝一人就在青龙山、树龙沟、大柳树、东西道日钦、接都、八仙筒、他拉土、浩特等地铺坛81次，收徒300余人。到1948年，中庸道组织在我旗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社会组织。拥有道徒2000余人，中小道首30余名。分布在当时浩沁苏木、八仙筒、白音塔拉、昂乃、土城子、衙门营子（今青龙山）等汉族居住地区。为了便于领导，管道法师李凤芝将组织按地域划分成两个分会，设请法师、道首分别管理。分会的各地区、各村屯也设立中小道首，管理信徒，联

系上级组织，传达旨意。

中庸道组织在奈曼形成了一个网络，深得反动上司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加强活动，中庸道上级组织又从阜新派来了法师李树森协同李凤芝活动。李树森从阜新来到奈曼七城子区大树龙沟屯，在小道首们的指引下，很快地熟悉了情况，并积极游说讲道。为了扩大声势，提高中庸道的知名度，1948年7月24日晚，在小道首王某和李某的协助下，李树森在白音塔拉区的接都屯升坛“坐场”，召开了前所未有的“龙花大会”（也叫王母娘娘蟠桃会）。公开选举道首。接都及其附近地区的信徒百余人参加了大会，道首们集贡品六十大碗，法师亲任正考官，王某、李某为副考官，出题开考，道徒们抢答比智力。经过“统考”选出了道首和“来世”能率兵出征的头名状元、榜眼、探花及前18名以内的随征大将。声称“今世入此坐场，来世能进考场”。以种种莫须有的“好处”诱惑信徒，迷信道教。因此中庸道在信徒中威信颇高，道徒们无心去认识当时的形势，听信了“将来天下是中庸道的，国号中华，中农有便宜，中庸道、中华、中农三中地位高；那时共产党败势，中庸道有殿座、天下是中正，谁也没有中正（蒋介石）大”的反革命言论。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些“不入道可不行了，天盘规定的黑罗大劫就要到了……”的破坏言论。

1949年，法师李树森在两名小道首协助下，树起了“无极境”，继续收徒传道，在正月初九至十九的十

天中，他先后在好土甸子、四林筒、接都、包米沙拉、代林筒、麻吉杆筒、庙荒、奈林浩来、刘家堡、于盛泉、鄂布根包冷、北老贵、自家炉、兴隆福等地升坛24次。收徒300余人，骗取道费、节钱1200万内蒙币。

到1949年5月，反动法师李凤芝发展信徒1700余名，李树森发展信徒1200余名。中庸道在我旗已有数以千计的道徒队伍，大、中、小道首七八十名。信徒中，全家入道信教的事已不足为奇，个别村屯已达到了全屯入教。据调查，土城子区已达到屯屯都有中庸道组织。法师收授道费、节钱3000余万内蒙币，大小道首骗取群众财物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在它的嚣张气焰影响下，“一贯道”“三宝道”、“圣天道”、“普济教会”、“务农道”等十九个会道门组织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七个较大的组织已发展信徒500余人。这些反动教门除了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外，也不同程度地散布了一些反革命的言论。

三、取缔登记

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反动的中庸道法师犹如螳螂，妄想阻碍奈曼旗人民的生产和革命斗争，只能是螳臂挡车。针对这个现实，旗政府根据上级指示，于1949年4月对封建会道门组织进行了侦察，同时进行了追查谣言工作。经过认真细致地调查，找到了谣言的源头，揭开了中庸道法师披宗教外衣，从事精神压迫和反革命造谣活动的本来面目。

5月，旗公安局以八面筒、白音塔拉、土城子区为重点地区开展了摸底，7月在全旗统一进行了取缔登记工作。按照上级指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对反动封建会道门头子施行了逮捕，对一般道徒进行登记。令其坦白、悔过自新。在登记过程中，首先召开大会交待政策，并利用标语、大字报、广播筒进行了充分的宣传。消除了道徒们的恐惧心理，使入教的群众真正地认识到中庸道的封建性、反动性和顽固性。被蒙骗的道首靠近了政府，真心悔过并做了坦白登记，声明退道。大部分信教道徒也参加了公开登记。揭发其组织内幕，表示不再参与其反动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依法逮捕了封建会道门头子李树森等三名首恶分子（李凤芝等反动法师畏罪潜逃），有1600余名中庸道道徒做了公开登记。部分信徒虽未登记但也自动地脱离了中庸道组织。1952年，哲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反动法师李树森有期徒刑15年。初步摧毁了“中庸道”和其它的封建会道门组织。

四、所谓“回头道”

中庸道组织被取缔，使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经过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一些较顽固的道首进行了依法管制处理。但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除，中庸道仍有一定的活动土壤。一些未登记、尚未受到打击的道首们仍念念不忘其“宗旨”，伺机流窜到某些偏僻地区和政府工作薄弱的地方活动，企图死灰复燃。1950年，

北票县官营子地区道首赵某以收购鸡蛋为名，窜到本旗上城子区树龙沟屯进行联络，在被管制分子、原中庸道首刘某家，几个小道首聚到一起，与赵某阴谋策划回收原有道徒，组织“回头道”。当晚，赵某即升香铺坛，刘某及原道徒六七十人重新加入了中庸道组织。此后分别在哈达屯、岗岗屯铺坛，收回原有信徒20余人，并秘密印制了佛像，分发给部分道首、信徒。告诫他们要严守秘密，设法扩大组织。

1952年5月，土城子区被管制的道首钱某回到杏树园子屯，中庸道道首们急切地把他吸收进来，并让钱某现身说法：入道者有灾有难都能化险为夷等谬论。并利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制造传播了“狼虎劫到了，八路军与美国打仗，美国是真虎，八路军说人家是纸老虎是错误的。八路军只防备东南，却不知西北要出问题。北水河开，蒙古人杀汉人”的破坏言论。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拉拢部分原有信徒，参与传播反革命谣言活动。

在1952年到1953年间，白音塔拉的索布嘎、东明区的好土甸子、土城子区的杏树园子等地区相继发生道首铺坛、集众烧香活动。在全旗开展学习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回头的中庸道信徒制造谣言，破坏群众对《婚姻法》的学习。什么“现在是猪八戒坐帝，猪八戒好看女人，所以主张男女平等……”。

潜逃在阜新马达营子老家的法师李凤芝听到中庸道组织在奈曼复生，非常兴奋，随即请他的上司夏某代替他来到奈曼旗树龙沟屯向索某了解情况。并指使刘某做好“结三元”工作，拉拢干部、群众，吸收道徒，企图公开活动。刘某等人果真按其上司旨意在1954年的普选中，为争取道徒当

迷人民代表煞费了一番苦心。

1955年8月，潜逃在外的中庸道法师李凤芝被奈曼旗公安局抓获，奈曼地区回头道的道首们失去了当家的首領。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再度转入地下，必要时利用不引人注意的妇女儿童捎言传信，进行秘密活动。

1958年奈曼旗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再次抽出专人组成专案组，调查中庸道回头组织的情况。掌握了以“中庸道”为首的反动会道门大小头目278名，道徒2963名。经核实发现：未经登记而又有活动的中庸道徒193名，道首23名。1959年5月15日，结合镇反运动再次进行处置，依法管制了中小道首，取缔了回头的中庸道组织。

在奈曼活动了三十余年的反动中庸道组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终于土崩瓦解，彻底毁灭。

注：本资料主要来源于奈曼旗公安局档案室，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文中部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隐去，特告读者。

李风芝戏班的由来

于佐廷

早在少年时代，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奈曼旗曾有过一个戏班，当时在辽宁西部和敖汉旗一带颇有名气。其中一些名伶，如福魁、麻子红等可谓享誉四方，家喻户晓。

参加工作后步入梨园，带着对同行的追忆和奈曼戏剧事业始末原委的探求，我到当时戏班影响较大的义隆永一带寻踪觅迹，现收集点滴。

李风芝戏班活动于清光绪年间，现奈曼旗义隆永乡南梁村是戏班的大本营。每年春夏秋三季，戏班到外地巡回演出，到冬季封箱，在南梁进行练功和休整。

李风芝家境中微，从小喜文爱唱，据当地人讲，李风芝小时候每逢唱戏时，他总是跟着戏班四处捧着看，一出戏往往连看数次，许多戏文唱段他都能背诵会唱。

当时的戏班，均无固定人员，多是由一人当班主，再招聘演员临时搭班而成，演员大都不固定，来去较自由，尤其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演员又经常易班。由于演员的聚合散离，于是在当时南梁和现敖汉旗下洼附近又出现了多个小戏班。诸如，山西人王显创办的王家班，南梁崔凯领头的崔家班，而其中小有名气的当属李风芝班。

李风芝挑旗立班时，他先聘用了一些散落在乡村的民间艺人，同时，又请了一些演员搭班而成。没有箱底，他就东

借西讨，又求助于父亲，买下了一些旧行头。就这样，在人马鞍鞮都不体统的情况下，小戏班毅然而生。由于戏班家底破旧，演员阵容不齐，所以人们管他叫“铺衬班”。李凤芝从艺志坚，决意以小班振声威。于是，他聘请了科班出身的演员担任教师，严格训练招进的小班学员。李凤芝责令教师苛教于字，刻苦练功。在冬练三九时，学员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在室外练三四个小时，有时还让光着脊背练功。稍有懈怠，遂棍棒相加，称之为“打戏”。严师出高徒，几经努力，坚持不懈，小班演员均已成材，在艺术上都能独挡一面，再加上李凤芝经常从外地戏班邀集和“挖”来一些好演员，使戏班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文武场配合默契，所以戏班越办越红火。每逢春天一写台就一直写到秋天，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有一次在下洼河西大佛寺跟关里的一个戏班唱对台戏，只一天，关里戏班就回戏走了。因而，人们当时有一句歇后语称赞他们精湛的艺术。说：“李凤芝的戏班——衣裳破，戏好。”

李凤芝班先以唱老派梆子出名，后又唱河北梆子，继而，为了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京戏、评戏、二人转、莲花落等众腔并举，杂阵齐出，观众喜欢啥就唱啥。当时的主要演员多是从关内请来的艺人。如“茶壶嘴”、“十八红”专攻须生，“一声雷”唱花脸，徐德新操琴。他们的拿手戏是《走雪山》、《审六》、《探阴山》等。后来，当地的小班演员几经舞台实践，艺术上日臻成熟，其中宝魁、小鬍子、玻璃脆等已小有名气。宝魁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他擅于反串须生，在《四郎探母》中饰杨四郎，上场一唱，声传十几

里，在下洼唱夜戏，南梁都能听见。

李凤芝班经常演出的剧目有《辕门斩子》、《四郎探母》、《一捧雪》、《南北合》、《翠屏山》、《盗御马》、《金沙滩》、《茶瓶计》、《玉堂春》、《白蛇传》、《黄草坡》等。

李凤芝于一九二八年病故后，戏班群龙无首，自行解散。而后，李凤芝的岳父沈庆云和南梁的崔凯各又领起一班人马，分别搭班报导，李凤芝班解散的人员，又各投其主，组成戏班。到日伪时期，由于兵荒马乱，戏班难以维持生计，名噪一时的李凤芝戏班终于破败解体。演员亦流向四方。其中部分演员在解放后仍从事演艺工作，成为新文化事业的骨干。

老哈河简介

哲盟水利处 刘葆林

老哈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为西辽河之南源。秦汉至魏晋称乌候秦水，隋代称托纥臣水，唐朝称吐护真水（亦名：白狼水），唐末契丹始强，契丹人语称陶畏思没里。《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载：“其地有二水，一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畏思没里，源出中京（今宁城）马盂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太宗耶律德光于大同元年（公元947年）正式建国，国号大辽，老哈河仍称土河。金、元、明三朝沿称土河，长达五六百年。现名得于清代，“老哈”为契丹语，原意为“铁”。据传，辽建国前天降陨石于河岸，形似铁牦牛，故名。十九世纪蒙古文名著《古喜传》中亦称老哈河为铁牛河。《奉天通志》中载：“辽河……上游分两大流派，一为老哈河，蒙古语曰老哈穆_穆或老哈木伦”。群众俗称老河。

老哈河源于河北省承德地区平泉县光头山麓，其上游称英金河，流至赤峰北先后纳入招苏河、阴河、西路嘎河、半支箭河、锡伯河等五条河流，水势大增，继而东北流，并于敖汉旗小河沿村上下与崩河、羊肠子河相汇，始称老哈河。老哈河流域面积共计2.8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13.4亿立方米。1962年7月26日受7号台风的影响，流域内普降暴雨，小河沿站河水猛涨，实测洪峰流量达12200立方米/秒，为历史上所罕见，幸有红山水库拦截削峰，下游地区才避免一次灭顶之灾。从源头到汇入西辽河处全长425公里，我旗境内西起苇莲苏乡西奈曼背子村至平安地乡西孟家段为老哈河右岸，长为62.5公里，岸边平地仅宽1公里左右，六十年代已开辟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4.9万亩，并建有堤防、险工等防洪工程。与河平行方向奈北兴隆沼大沙带，盛产黄柳、麻黄等，科尔沁著名驼乡苇莲苏乡13个村1.4万口质朴勤劳的蒙汉人民就定居在这里。

老哈河流域沃野千里，景象万千，老哈河水甘甜醇美，自古就是渔猎盛地。《辽史·本纪》中记有：“天显九年（公元934年）正月癸酉，太宗渔于土河”。《热河省建平县志》载道：“鲤，老哈河有之，味佳肥美，蒙古语谓札嘎萨”。“鲫，今老哈河有之，玉瀑（即响水）之下水深鱼肥”。老哈河还盛产甲鱼。全盟著名沙漠水库孟家段、莫力庙、吐尔基山、小塔子等水库所产甲鱼，同源于老哈河。

1958年哲盟两盟在老哈河上游乌敦套海处筑坝，兴修红山水库，中共奈曼旗委、旗人委派出副旗长阿尔斯郎率领上千名民工参战，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兴建红山水库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了全旗各族人民的称赞。红山水库历经七年的连续建设，终于竣工投运，成为老哈河上的一座具有防洪、灌

溉，养鱼、发电综合性的大型水库。老哈河从此得到了控制。这条古老的河流重新焕发了英姿，在战胜水旱灾害和发展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奈曼旗1962年特大洪水灾害记实

马云和

1962年，自春季以来气候一直反常，进入夏季阴雨连绵，冰雹频繁，洪水较多，汛期比往年提前半个月之多。6月9日各河流就开始来水。6月13日9时教来河下洼水文站，发生了4170立方米/秒的洪峰，7月7日至12日6天内，又连续来水，较大洪峰为680立方米/秒。7月22至24日因受第7号台风影响，辽河流域上游连降暴雨，三日降水量达458毫米，以至老哈河、教来河、孟可河都发生了大洪水。教来河下洼水文站，发生了4017立方米/秒的洪峰，到达桥户村水文站时，洪峰流量为3750立方米/秒；孟可河新立屯水文站发生了1850立方米/秒的洪峰，洪水进入奈曼旗境内冲毁了常胜、西湖两个大队的耕地，倒塌部分房屋；老哈河下树林子水文站，发生了12200立方米/秒的洪峰。由于1962年汛前建成了红山水库（老哈河拦河水库）拦蓄了这次大洪水，确保了老哈河、西辽河（老哈河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次大洪水遭灾最严重的是教来河下游的村屯。从下洼水文站到白音塔拉的接力都村，属教来河中上游，河岸高，河槽深，大水来到时已安全通过。接力都以下属中下游，河床浅，河岸低，两岸虽有堤防，只能防御桥户村水文站发生

1900立方米/秒的洪峰。这次大洪水超过防御标准的两倍，根本无法防御。这次大洪水来势猛，峰量大，持续时间长，从7月25日13时起峰到28日落峰，历时两天半的时间。7月27日早晨大洪水到达爱吉伯拦河坝前，拦河坝的东、西、中3处漫坝（堤），水分4路一涌而下。

一、北路水是从爱吉伯拦河坝西，艾林好来堤段，有2000米防洪堤和3000米较低河岸普遍漫水。洪水漫过堤岸冲向西荒查干巴升进入东荒水库。水库蓄满漫坝，冲向麻奇干筒、他拉土、文都哈拉、套海营子、乌且乌苏、门达力嘎，到沙日浩来东入教来河。这路水冲毁了9个村屯，一个供销分社。除西荒、套海营子、门达力嘎、沙日好来剩下部分人家外，其余5个村屯的房屋全部倒塌。

二、中路水是从爱吉伯闸门西漫过拦河坝，拉成300米宽的河槽，在爱吉伯水管所西北进入教来河。

三、东路水是从爱吉伯拦河坝东端垞空堵截堤漫堤，水回教来河与中路水汇流。

四、南路水是从爱吉伯引水口进入滞洪区，水到爱吉伯甸子又分两流。北流水直奔该甸子北边靠近防洪堤，漫过防堤进入义和套力海甸子，甸子蓄满，北部堤防冲开5个口子，水回教来河。甸子东边冲开4个口子，洪水冲向代营、东嘎土好来、老宅甸子、达吉、好土、台吉、双合兴、哈鲁、上奈林、东奈林、敖力台，到查干好来南入杜贵河下游旧道。南流水由爱吉伯甸子往东流，洪水到达巨力干巴升时，又分成两股，一股水进入太吉伯水库，一股水漫过该屯北的防洪堤，洪水冲向西嘎土好来、道兰塔拉，到老宅甸子与代营下

来的水（北流）汇流。这两流（南路）水共冲毁13个村屯、3个供销分社。除敖力台、哈鲁、东奈林剩下部分户外，其余10个村屯的房屋全部倒塌。

旗领导对防御这次大洪水，准备得早，行动得快。当7月22日接到昭盟地区普降暴雨的天气预报时，旗防汛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讨论准备防大洪的具体措施。会后旗领导和指挥部成员，率领100多名干部及时赶赴防汛抢险第一线。旗委书记王和同志，到北片负责孟家段水库和老哈河、西辽河的防汛抢险工作。副书记、旗长刘琮和水利科长李继光先及民政科吕德元、人事科刘若宇，一行4人当天坐马车赶赴八仙筒，因雨大马车走不了，他们又步行30多华里，贪黑到爱吉伯水管所。其他领导也分别到各自分管的险工险段。留在机关的旗领导立即通知有关公社，要求在大水到来之前，公社领导要亲自到有危险村屯，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爱吉伯拦河坝，滞洪区北部堤防，太吉伯水库大坝，教来河下游两岸堤防，都是教来河的防汛重点。旗长刘琮到达爱吉伯水管所后，立即给正在加固这些工程的公社、连队下达任务，要求他们在大水来到之前突击上土，洪水到来时要加强防守，力争不漫堤、不决口，确保沿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又催促有危险村屯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方。

7月25日下午，爱吉伯大坝前开始涨水，刘琮旗长一行4人和水管所全体职工，立即投入紧张地防汛抢险战斗。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仍不停地下，民工们摸黑加高大坝，

抢修险段，全体指战员整整两天两夜几乎未合眼。7月26日洪水继续上涨，他们感到水管所驻地也不安全，决定转移到大坝东端高沙坨口，搭起一个临时帐棚防雨避暑。刘琮旗长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吃住帐棚里。7月27日爱吉伯闸门西洪水漫堤坝后，水管所办公室、仓库、家属房全部被冲毁，通讯线路被冲断，对外失去联系，领导和同志们十分焦急。待第二天水小点，李继先科长和水利干部谭文起同志趟着河水，踏着陷泥到十里之外的塔甸子打电话，向盟委、盟行署、旗委、旗人委报告爱吉伯大坝东西中三处漫堤（坝）、水管所被冲及下游遭灾情况。盟委副书记韦荫秀同志得知后，立即召开紧急救灾会议，研究落实救灾的具体措施。下午，韦书记和盟水利局贾振亚局长乘飞机带着救灾物品，到灾区视察和给被困困的灾民空投食物、救生圈、药品、慰问信。第二天、第三天除继续空投救援物品外，又空投菜籽，灾民们无不为之感动。当飞机来到灾区上空时，灾民跪在地上磕头，流着眼泪，口里说共产党好，党派飞机给我们送食品、药品、慰问信，党非常关心灾民，要是国民党时期遇上这样大水，灾民们就得活活被饿死。

洪水过后，各级领导立即赶赴灾区，与群众同吃同住，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与此同时，国家给灾区批拨了大批檩木、粮食、布匹、胶鞋等救灾物资，大大地激发了群众渡过灾荒，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1962年，不仅洪水泛滥成灾，内涝也十分严重。自6月1日进入汛期以来，一直是阴雨连绵，中到大雨以至暴雨频繁，给全旗造成严重的内涝灾害。是年，遭受洪涝灾害

范围广、面积大，灾情严重。全旗18个公社有17个遭受洪涝灾害，受灾大队300个，占全旗大队总数的77.3%；受灾户数23532户，占全旗总户数的78.6%；受灾人口130765人，占全旗总人口的61.7%；冲毁耕地297362亩，内涝面积368707亩，合计受灾面积666069亩。这次教来河大洪水所造成的损失，冲毁桥闸11座，堤防4400米，公路5000米，倒塌房屋24832间；损失粮食229400斤，损失物资：棵子18966棵，柁1178棵，小胶车3台，木车64台，水车8台，锅驼机7台，衣服533件，被褥112件，大小农具7333件，其他物品3113件；死亡人数24人（均是捕鲤、洗澡、捞木材而死），伤9人，患病2323人；死亡牲畜：牛46头，马2匹，驴16头，羊460只，猪471口，家禽3599只。洪水损失按当时价格估算达1200万元。

在抗御这次洪涝灾害中，解放以来兴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嘎土好来滞洪区对教来河洪水，经过滞蓄分流，7月27日洪水到达畅通桥水文站（爱吉伯下游20公里处）实测流量130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68.2%，7月29日洪水到达通辽境内瓦房水文站实测流量为34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90%，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洪水对下游兄弟旗县的危害。

在与这次特大洪水搏斗期间，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哲盟盟委、盟行署的多方面关怀

和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我旗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抗洪斗争的意志。旗委、人委领导对这次抗洪斗争组织得力，指挥有方，措施果断。各级领导身先士卒，始终坚持在抗洪斗争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工作十分出色，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争先恐后地为抢险救灾做贡献，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事迹。如治安公社沙巴放大队蒙古族社员老来，曾两天两夜没眨眼，行走320多华里，沟通太吉伯水库和治安公社的联系。被誉为“黑水神”的旗水利科技术干部杨志刚同志，横渡教来河独探洪水，出色地完成了通讯联络和指挥抢险任务。

总之，在这次抗洪、排涝斗争中，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和全旗各族人民积极努力，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取得了抗洪、排涝斗争的胜利。

奈 曼 旗

旱 涝 史 记

刘葆林

历史记载资料说明奈曼旗自古以来就是水旱灾害多发性地区。辽金至清初六七百年间奈曼尚处于游牧渔猎阶段，当时人口稀少，水旱灾害轻重影响不甚明显，清中叶之后，东蒙古地方逐渐开禁，垦荒渐盛；民初之后，昭哲两盟进行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土壤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重，水旱灾害更加频繁，对农牧业生产、群众生活危害很大。

回顾历史，在全旗水旱灾害中，常常是春旱、夏涝、秋吊交替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旱灾危害最重。俗语说旱灾一大片。受旱区域不仅在本旗发生，而且扩大到邻近几个旗县或全盟，有时甚至连接几个地区、几个省，如1941—1944、1951、1972、1980、1982等年就是大范围的旱灾。有一些古书上常以“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来描述大范围旱年的情景。从记载上可以看到，凡是旱欠收之年，都是春、夏、秋三季连旱，或是夏秋两季连旱，其次是春旱秋吊隔季旱。在单季旱灾中影响最重的是秋吊，其次是夏

旱，或称为伏旱。春旱在本旗发生的年数最多，常有“十年九春旱”之说。春苗是粮食产量的基础，因此年年做好抗春旱保全苗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观点看，坚持常期抗旱，积极发展灌溉事业，不仅是一项生产性措施问题，而是巩固和加强国民经济的战略大事。

二、洪涝灾害对农牧业生产影响很大。在全旗范围内洪涝灾害发生的次数，虽不及旱灾多，但对粮食总产、牲畜头数增长影响十分敏感。在西辽河（含老哈河）、教来河、孟克河、杜贵河、牯牛河等几条主要河流中，教来河横贯全旗，洪水危害最大。历史上的1939、1949、1954、1957、1962年都是教来河等两条以上河流发生大水年。解放以来，兴修水利，利用沙沼甸子的自然优势，建设沙漠水库、滞洪区工程对抗御洪水保卫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牧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除了水旱灾害，还有风沙、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以及虫灾等，但这些灾害与水的因子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具有相互制约作用。因此，在改造大自然、防御水旱灾害，必须同农业、林业、水文、气象等有关部门紧密协作，才能更好地发挥水利工程建设作用。

解放前，全旗水利工程基本上是空白状态，无防御水旱灾害能力，春旱、夏涝、秋吊，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处于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的境遇。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兴修一大批水利工程，增强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但遇到一些特殊年份，水旱灾害仍有发生。下面根据有关史料和地方志

不完全的记载，分为建旗前、建国前、建国后三个历史时期，将全旗各年发生的水旱灾害分别列后，以供参考。

一、建旗前的水旱灾害

辽统和三年（公元985年）7月丙寅，老哈河发生洪水。《辽史·本纪》记：辽圣宗“驻骅土河（今老哈河），以水暴涨，命造船桥”。

辽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7月甲寅因连日大雨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等泛滥成灾。《辽史·本纪》载：“霖雨，潢（即今之西拉木伦河）、土、斡刺、阴凉（今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河）四河皆溢，淹没民舍”。

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5月，老哈河发大水。《辽史·本纪》记：“大雨水诸河横流”。又：“契丹境内诸河横流，失其故道”。

金大定三年（1163年）土河泛滥，进入中京城（中京即今宁城）。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北京、大定诸州旱（今宁城元时称北京，其辖区包括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

元大德五年（1301年）6月乙巳，辽阳省大宁路水，以粮千石赈之。（大宁路、以现宁城为中心，其辖区包括敖汉、奈曼等地）。

元大德七年（1303年）6月，辽阳、大宁、平滦、昌

图、沈阳、开元六郡，雨水坏田庐，男女死者十有九人。

元皇庆元年（1312年）6月大宁水。

元泰定三年（1326年）大宁路大水，坏田漂民。

元至治二年（1332年）大宁路、硕达勒达等降水伤田。

元元统二年（1334年）6月大宁……水旱、蝗大饥。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兀良哈旱，岁凶乏食。（明时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以及洮儿河等流域设福余、朵颜、泰宁三卫，统称兀良哈三卫，奈曼属其辖区）。

明嘉靖六年（1527年）6月河西蝗飞蔽天，害禾稼（河西指辽河以西地区包括哲盟大部）。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4至6月，河西大雨不止，河水泛滥，平地深丈余。

明崇祯二年（1629年）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及建州（今朝阳）大饥。

二、建国前的水旱灾害

清雍正元年（1723年）科尔沁、奈曼、敖汉等十六处扎萨克收获未丰，宜加特恩科尔沁五旗赏银五千两。

清雍正五年（1727年）科尔沁、奈曼、敖汉等处大旱，秋收欠薄，清廷赐帑赈济。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教来河大水，冲出高力板（属敖汉旗）一带好地。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教来河水泛滥将原建在森塔子村（今东明镇境内）白沙坨的查干特门扎拉庙冲毁。

清咸丰七年（1857年）义隆永一带一年未下雨。

清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六月十三至十九连雨。英金河、老哈河大水，洪水冲入赤峰城。据后人调查老哈河乌敦套海站洪峰流量每秒达7840立方米之多。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老哈河、教来河大水。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辽河大水。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老哈河大水。大水入赤峰城，后人调查乌敦套海站洪峰流量每秒达6160立方米。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季干旱，教来河、西辽河干涸，草木皆枯。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本年各属所种粟米，夏秋之交大旱减产。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阴历六月初六水冲桥户村张三大院，来水时起旋风，方圆十二里都是水，水退后平地落了七八尺淤泥。

清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六月十五义隆永乡车圈子教来河发大水，历时一天之久河水差二尺上岸。

民国五年（1916年）全旗秋吊严重，高粮、谷子秕粒多，群众靠吃野菜度日。

民国六年（1917年）老哈河、西辽河大水。群众称为红蛇年（丁巳）大水。桥河、太山木头、白音塔拉等处雨涝减产。

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六月二十九衙门营子教来河发大水。七月二十九又遭鸡蛋大小的雹子打，庄稼损失不少。

民国十一年（1922年）西辽河大水，教来河亦发大水，冲了浩沁束木区（今东明镇）。

民国十三年（1924年）西辽河大水，8月4日水势达到高峰。清河（教来河）水出槽。

民国十四年（1925年）西辽河大水，近似民国六年那场大水。

民国十七年（1928年）浩沁束木一带春旱严重，种不了地，拖拖拉拉一直到老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库伦发大水，绥东县署迁入八仙筒。教来河改道，德贝至双龙山段上移到达吉营子至他布郎。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初，太山木头教来河发大水。全旗因涝欠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西辽河大水。《库伦旗志》上记：“奈曼（绥东县）发了两次大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旗从7月7日至19日，7月21日至8月7日没有降过大于10毫米的雨，伏旱严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太山木头一带大旱，谷子一直未露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全旗春旱、伏旱较重。8月中旬西辽河大水，同年教来河发水，大水冲了桥户

村。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全旗伏旱嚴重，整個7月未下雨。

民國三十年（1941年）7月、衙門營子大雨，平地積水1—2尺，教來河大水泛濫，河道由達吉營子改道下移。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大旱，全旗4—5月僅降雨16毫米，第一場接壤到6月25日才下；8月份降雨不足15毫米，構成了“春旱秋吊”的典型年。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少遇的大旱年。工程廟泡子（今西湖）旱得只剩一尺來深；沙日浩來，太山木頭大田作物無收成，青龍山收成減半。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全旗從春到秋未下透雨，井水干枯，寸草不出，顆粒無收。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夏，全旗大水，6—7月陰雨連綿40余日。西遼河、教來河、孟克河、杜貴河相繼發生洪水。西遼河從農曆6月25日到8月6日，52天內出現洪峰8次，十一區的公益村、三合屯、清河、四方地、興隆村等五處決口。教來河下洼站洪峰流量每秒達1850立方米，東明、得勝一帶被沖。青龍山下七天七夜大雨，山洪暴發，沖毀一個村屯。杜貴河發水淹地8781畝，減產24萬市斤。全旗受洪澇災害較重的有42個行政村共

3632户，人口3.5万人，农田受灾33.75万亩，死亡16人，倒塌房屋2396间。

三、建国后的水旱灾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旗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水旱灾害虽大为减轻，但仍不断发生。

1951年 全旗春旱、夏旱、秋旱连旱，有8个区（努图克）117个村（嘎查）受灾，不完全统计因旱受灾严重减产的耕地有48.89万亩。

1952年 全旗夏秋连旱。白音塔拉、衙门营子等地一年未下透雨。

1954年 入夏至出秋全旗阴雨连绵。大沁他拉在作物生长期（4—9月）降水大于10毫米的共33次，总计559.4毫米，比常年超71%，属涝年。全旗土地受洪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共26.4万亩，其中洪涝灾16.5万亩，占60%多。

1955年 全旗夏秋连旱，尤其秋旱严重。7—8月降水比常年少四到六成，全旗因旱减产13.76万亩，坨沼地占大多数。

1957年 西辽河、教来河、孟克河、杜贵河四河相继发生大水，8月17日教来河下洼站出现每秒1310立方米洪峰流量。嘎土好来滞洪区分洪流量为每秒400立方米。博苏甸子决口，淹地5000亩，减产粮食32万

斤，受灾人口达800人。全旗洪涝总面积19.83万亩，其中内涝16.76万亩，倒塌房屋93间。

1959年 春旱，夏秋偏涝。6—7月杜贵河发生两次洪水，新镇公社好钦束木水库未完工即遭到洪水袭击。东明、苇莲苏公社约有5千亩耕地因涝减产。本年另有旱灾6.9万亩，成灾2.2万亩。

1960年全旗春旱较重，夏秋偏旱，虫灾严重，粮豆总产1.6亿斤，较近五年平均总产减少10%。

1961年 沿老哈河、西辽河一带的苇莲苏、平安地、明仁、清河等公社春旱严重，紧连夏旱，7月6日才见接墒雨。全旗因旱减产16.78万亩，其中作物枯死13.5万亩。

1962年 全旗春季低温多雨，降雨相当常年两倍。入汛后经常降雨，6—8月大沁他拉降雨336毫米。比常年多96毫米，7月25日受7号台风影响，昭哲两盟普降大雨和暴雨。老哈河、教来河、孟克河、杜贵河同时发大水，7月26日教来河下洼站出现洪峰流量每秒4170立方米。当洪峰到达嘎土好来滞洪区进水口时，由于拦河坝的阻滞削减了一部分洪水延缓了洪峰向下游传播的时间，但滞洪区上游被冲毁，淤积了约3米厚的泥沙。固日班花以东被水淹，农田减产一半以上，全旗受灾耕地66.6万亩，淹没草牧场178.1万亩，倒塌房屋24842间，淹死24人，死亡牲畜995头(只)，受灾人口13万多人。此后又发生秋吊，全旗粮豆总产仅1.17亿斤，比近10年平均产量减少4700万斤。

1963年 全旗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旱、涝、雹、虫、交替发生，总受灾面积39万亩。入汛以来，教来河、杜贵河、牯牛河相继出现洪水。南部山区青龙山等六个公社以及朝古台公社灾情较重；中部固日班花、八仙筒等五个公社（农场）遭到洪水袭击。

1964年 春夏偏旱，全旗受到轻重不同程度的旱灾面积9.59万亩。

1965年 去冬今春无雨少雪，春旱严重。3—5月旗内出现8级大风25—29次。夏汛，教来河发水，大布改筒堤防被冲毁，淹地1.4万多亩。

1967年 夏秋连旱，秋吊严重，全旗粮豆总产1.64亿斤，比丰收的1966年减产4千万斤。

1968年 全旗大部地区夏秋连旱。

1969年 8月21日教来河下洼站发生洪峰流量每秒1870立方米，经道力歹拦河枢纽工程控制，分入舍力虎水库流量每秒500立方米，其余洪水进入莫合甸子滞洪区。舍力虎水库蓄水达9150万立方米，淹没了敖汉旗万发永，达莫屯库区内耕地7500亩，避免了一场相当于1949年洪水灾害损失。

1970年 7月教来河下洼站出现每秒1240立方米的洪峰流量，道力歹拦河枢纽第二次发挥滞洪分洪作用，仅仅淹了莫合甸子一部分险地。

1971年 全旗春季偏旱，入夏雨水调合，但秋吊严重，受灾面积57.67万亩，因旱减产面积达45万亩，比上年全旗总产减少3千万斤。

1972年 全旗除南部山区雨水适中外，大部地区伏旱秋旱连续发生，作物生长期降雨比常年少二到三成。受旱农田近40万亩，成灾减产面积21.7万亩。

1973年 春旱严重，全旗大部地区6月末才见接墒雨。夏季雨水正常，秋旱较重，受旱面积达84.67万亩。7月教来河下洼站出现洪峰流量每秒1140立方米，水冲滞洪区险地3.6万亩，内涝1.66万亩。

1975年 全年雨量较常年少了三四成，夏旱连秋旱。教来河出现两次每秒超千立方米洪峰流量。全旗有旱有涝。受旱总面积32万亩，洪涝面积8.5万亩，收成属平年。

1976年 本年年景较好，受旱面积37万亩，成灾13.2万亩。

1977年 夏旱秋旱相连发生，全旗受旱面积66.8万亩，成灾面积近30万亩，收成次于上年。

1978年 全年雨水较为适中，但受旱面积仍达24.3万亩。

1979年 入汛较早，6月14日青龙山地区午后4点突降暴雨，山洪暴发，将打坝淤地工程1.32万亩农田冲垮。夏汛期教来河中小洪水不断出现。孟克河洪水直入舍力虎水库，10月6日库水位达到380.25米，相应库容9580万立方米。本年属丰水年。

1980年 春夏秋三季连旱，春播后至7月下旬才落一次较大的雨，而且高温干旱持续不下，旱象类似

1951年。全旗粮食总产2.02亿斤，比正常年减产5千万斤以上。

1982年 春夏秋三季连旱再度发生，作物生长期降雨比常年少三分之二，全旗粮食总产1.75亿斤，比大旱的1980年还少2700万斤。

1984年 春旱严重，夏季雨涝，全旗倒塌房屋1400多间。8月10日教来河下洼站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洪峰流量每秒达3090立方米，莫合滞洪区内一些村屯，遭受洪涝灾害。

1986年 春旱较重，旗内中南部有83万亩耕地干土层达20—30厘米。草牧场有一半干旱，牧草的发力很弱。7月25日前后全旗连续遭受大雨、暴雨袭击，舍力虎水库下游地区洪涝灾害严重。

1987年 7月中旬到8月上旬高温无雨，旗内北部、东部及南部山区干旱严重，庄家打蔫，黄了两三片叶子，受旱农田达85万多亩。

1988年 全旗春旱后接连出现严重伏旱，7月份降雨比常年少70%左右，8月上旬中伏期间持续十几天高温天气，近二十天无雨，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日后，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等专程到旗里视察旱情。

1989年 春不旱伏旱，7月下旬以来全旗持续高温天气，降雨偏少，而雨量大都不足10毫米。7月19日沙日浩来苏木突降暴雨，两小时下了100多毫米，山洪相继暴发，4座塘坝被冲毁，7个村屯受灾严重，2万多亩农田

绝收，倒塌房屋50多间，淹死大小牲畜26头（只），冲走柴油机、水泵等7台。

1991年：汛期来得早，6—7月多雨，8月雨水少，9月初雨水正常，本年基本雨水调和为丰收年。

蒙古新文化的杰出旗手

——布和克什克

额尔德木图 宝音陶克陶

布和克什克于本世纪20年代求学于北平，参加了先进党派，承当第三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并组织“蒙文学会”，创刊《丙寅》杂志（1—3期），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第一线。毕业后，几经波折，最后来到刚刚沦陷的开鲁—伪满兴安西省任文教科长。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刻没有忘记祖国和民族。利用职务之便，开设多种学校，教育和培养了众多的热血青年；创办印刷厂，出版了诸多蒙古文化近代精萃著作；重新创立“蒙文学会”，开展文化活动；继刊《丙寅》杂志（4—10期）。举办这么多的事业，他依靠的并不是日伪政府提供的经费，而是用向广大蒙古农牧民和开明人士募捐得来的钱。他在伪兴安西省辛辛苦苦奋斗整十年，为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开化，呕心沥血，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家世

布和克什克的祖先是蒙古达鲁氏，习惯称呼为“达拉特氏”。“达鲁”本指脊梁，因此，汉姓为“梁”。布和克什克的汉名叫梁玉岚，字萃轩。据奈曼的传说，达拉特氏是成

吉思汗著名四杰之一木华黎的后裔。但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的“乃蛮”条：“乃蛮灭亡以后，人民被分给蒙古诸王和那颜为奴，部分人逃往中原，参加了完颜陈和尚的忠孝军，与攻金的蒙古军作战，“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十分勇敢。屈出律的后人成为答鲁乃蛮氏，其中一支后人在元朝作官”。

当蒙古人占居奈曼地方时，主要由孛儿只斤（亦称博尔济吉特）、奈曼、席布西兀惕、达拉特、塔塔儿、达鲁沁、乌剂业惕等七个氏族的人过来居住此地。可见，布和克什克的祖先乃是奈曼地区的土著人。

布和克什克出生于清朝光绪28年（1902），祖籍为奈曼旗太山木头苏木布和乌苏艾里。太山木头，本叫塔里绅毛都，意谓种出来的树。太山木头苏木位居奈曼旗所在地大沁他拉镇南偏东四十华里处。布和乌苏艾里北面，哲盟著名的三条河之一的纳里特郭勒环绕而过。这条河现名“叫来河”。艾里东面，有名叫古雷塔拉的甸子。布和乌苏艾里是布和克什克父亲乌陵嘎加克拉齐起住的，原先无村落。

关于布和乌苏艾里的得名有两种传说。一种是说村北的哈喇套布格上有一条巨蟒，在此处不知活了多长时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牧羊人赶着羊群来到此处放牧。忽觉得自己有了腾空的感觉，悠悠忽忽，有立地成仙的意境。他回到村中，向同辈好友们叙述此事，夸自己命好，有福气，遇上天仙，不久就要成仙得道等等。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孛克达阿卜（奈曼旗第13代扎萨克玛什巴图尔的绰号）的耳里。孛克达阿卜

为看其究竟，全身披挂，带上神弓，骑上快马，来到哈喇套布格岗上。举目观察，看到一条巨蟒正欲侵吞那年轻的牧羊人。李克达阿卜急忙拈弓搭箭，看准巨蟒的心窝，“嗖”的一箭射去，正中巨蟒的心脏。那蛇使劲甩了几下尾巴，挣扎了一阵，就摔倒在村东的大甸子上死了。巨蟒死时，口中流出如墨汁般的黑水，积成一湖。因其水如墨，而人称为李克乌苏（意谓墨汁水）。而那大甸子得名“古雷塔拉”，意谓如蛇般阴森平滑的甸子。

另一传说是说村南的石头井。很早以前，布和乌苏艾里的南面曾有过一口石头井。有一天，从这口井里冒出了如墨般的黑水，黑水溢井口而往外流个不停。为此，附近的人们搬来一块巨石板，盖住了井口，堵住黑水的溢流。从此，这口井失去了作用。后来被流沙吞没。布和乌苏艾里从此得名。

布和克什克的童年，就是在这块地方上长大，在纳里特河畔，在哈喇套布格岗子上，在古雷塔拉的胸怀里，留下了布和克什克童年的足迹。

因布和克什克的列祖是达拉特氏，所以，在孛儿只斤氏统治的蒙古封建社会里，其祖先不是贵族，而是普通的哈喇楚，意即平民家族。从布和克什克祖父时起，他们家逐步强盛。其父乃是在奈曼旗历史上颇有名望的管旗加克拉齐，号称“顶天立地的‘扎萨克’之乌陵嘎加克拉齐”。

乌陵嘎加克拉齐生于清朝咸丰十年（1860），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先后婚娶两房福晋，大福晋有布和席日莫、布和敖斯尔、布和克什克、布和温都苏

等四个儿子和金玉石、金贵石、布和特古斯、乌云特古斯四个女儿。二福晋有克什克巴图、克什克温达尔胡、克什克陶克陶胡、克什克宝音等四个儿子和乌仁哈斯、乌仁陶迪、金莲、金萍四个女儿。

乌陵嘎加克拉齐在职期间，不仅掌管旗务而且专心旗里文化教育事业，为发展文化教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因此，在奈曼旗民歌中有：“清晰真假的乌陵嘎加克拉齐”的唱词。据知情者说，乌陵嘎加克拉齐虽然生于蒙古封建时代的末期，但他很少有封建思想，这在教育与财产关系上尤为突出。他常说：“与其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不如教育出几个有识之士”。正由于这种思想，他的子孙后代一个个都成了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

布和克什克有一位叔父，婚后数年无子。按传统习惯，他接布和克什克为嗣子。从此，其姉娘竟然生下好几个孩子。他叔父认为，布和克什克是带着子孙之洪福到他家来的，因而对布和克什克倍加宠爱。这位叔父名叫团道，是末支人，所以成为他们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故其家为“也和格日”，意思是“本家”或“大家”。而称乌陵嘎家为“巴嘎格日”意思是“支家”或“小家”。然而，团道的“也和格日”日趋穷困，而乌陵嘎的“巴嘎格日”却日愈富裕。所以，布和克什克的学费及生活之需全由“巴嘎格日”所承担。

布和克什克曾娶两房妻子，他在朝阳中学读书时娶了原配妻子。她是今本旗沙日浩来苏木台吉艾里的那仁呼出图的女儿，是布和克什克的表妹。婚后夫妻恩爱，生活愉快。但是，

好景不长，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因患重病，弃世而去。此事对布和克什克的精神打击极重，他茶饭不思，苦苦思念她。为这不到一年的夫妻感情，布和克什克曾写过一篇爱情小说。这篇著作完好地保存于他女儿娜森格日乐手中直到“文化革命”前。后来胞兄那森巴雅尔在吉林省热电厂工作时，从妹手中拿去保存。遗憾的是在“文革”中被抄没。

布和克什克填房妻子，名叫宝琴，是本旗黄花塔拉苏木敖汉沙拉艾里满都呼台吉的女儿。他们有三男二女，即那森巴雅尔、那森乌尔图、那森德力格尔三男和娜森格日乐、娜森其木格二女。现在除长女娜森格日乐于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外，其余四个儿女均辞世。

(二) 童 年

布和克什克诞生之际，正是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的“闭关”政策被摧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和轮船的压力下，不得不开放门户，施行一些微略的改良。此事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因朝政的腐败而倍受异国的欺压，这是中国各民族的极大耻辱；另一方面，它打破了数千年的封闭，送来了民主、自由、科学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一代革命先驱，传播到了中国大地。从此，中国各族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民族解放和奔向国家光明前程的革命道路。

当布和克什克10岁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朝封建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一举世瞩目的政治大变革，给贫穷落后的奈曼旗也送来了新风。

布和克什克虽出生于封建家庭，但成长于破落的团道家中。团道一家，只能维持温饱，并不富有。因此，布和克什克从小就与本艾里穷苦孩子们接交，思想方面比较解放，没有受到封建大家族的礼仪约束，自由自在地跑遍了哈喇套布格岗顶和古雷塔拉。大自然的熏陶和穷苦孩子们的影响，使之萌发了同情、可怜穷人的感情。

布和克什克的童年，对于他的未来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之所以成长为一名民主思想家，追求新文化和新思想，与他童年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三) 求 学

纵观中国近代教育概况，基本上处于旧教育的灭亡和新教育的萌芽状态。且情况复杂，呈现出三种教育制度并存的局面。首先，腐败守旧的封建教育仍然存在，它的目的在于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其次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奴化教育，它的目的为侵略者培养驯服工具。其三，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新型教育，其目的是推翻旧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培养势力。这三种形式的教育并存的结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1905年，清王朝在外部势力的强压下，不得不颁布

“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命令，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此事对于新型学校的建立和新教育的发展开辟一条可行之路。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正当旧的教育制度走向灭亡，新的教育制度逐渐改善和发展的时候，布和克什克踏入了学校之门，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化生涯。1915年，布和克什克14岁，入本旗大营子李殿清所开办的小学，老师叫张进，当时该学校有30多名学生。布和克什克是甲班生，其班有10名同学，主要课程是国文和算术。布和克什克在这里学习四年之后，转入直隶省朝阳县立中学学习。当时，朝阳中学共有学生120名，校长张维繁。布和克什克是该校第10班学生，班长是汉族学生叫常钟魁。布和克什克在校成绩优秀，始终排在前几名。在中学学习期间，布和克什克还就读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考试结果，在3000余名函授生中名列第一。

从奈曼旗布和乌苏艾里到朝阳，有三四百里路。每次上学，布和克什克都要坐下洼运粮车，途宿三四天。有时遇到强盗，连衣裤都被抢光。在这样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灰心丧气，艰难的学习生活从未中断。

1922年布和克什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朝阳中学。次年，考入北平私立俊文大学法律专业学习。1924年，该校原校长被撤职，由徐谦先生（1871—1940）担任校长。徐谦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积极拥护“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靠近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民主思想的国民党左派。他担任该校校长以后，与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等联合，对反动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多次的斗争。1926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界人士集会，请愿，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者炮轰大沽口的暴行。在这次集会上，徐谦先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段祺瑞下令镇压了这次集会，并公布通缉令，指控李大钊、徐谦等五人为这次“动乱”的头子。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3.18事件。”

因校长成了被政府通缉的“要犯”，该校也涉嫌为革命党的据点而被封闭。事后，经多方努力，才把私立俄文大学的学生转移到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就学。布和克什克也和同学们一道转学，就读于国立北平法政大学。

当时北平各大学都没有统一的学生宿舍，因此，布和克什克和自己挚友王家骥一起，租住北平宣武门内国徽街大众公寓10号房间。1928年6月，布和克什克毕业于国立北平法政大学。

布和克什克在大学读书期间，一方面刻苦钻研，努力提高文化知识，另一面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四) 业 绩

思想指导人生的一切过程，也影响人的全部事业。布和克什克在其民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追求新意识、新思想、新文化。另一方面，着手新事业。同情和可怜穷苦百姓，为他们办有益的事情。他组

织社会团体，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出版有益的书籍，建立学校，培养新人。他一生的事业，因受其进步思想的引导，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民族，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布和克什克在北平学习期间，被当时的革命风暴所吸引，主动接近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徐谦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及以色音巴雅尔（汉名包悦卿）为代表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色音巴雅尔是哲里木盟科左后旗人，他曾在奉天（沈阳）蒙旗师范读书。他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为蒙古民族的解放奔走呐喊，是一位民族政治活动家。后来，到北平任蒙藏院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他在北平期间，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系，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建立了联系，积极参加创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

1925年10月，出席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首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党中央常务委员。

据布和克什克的同窗好友王家录先生的回忆：“布和克什克和我同住一室，他经常数日不归，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也不告诉我实情。他早就结识科左后旗的蒙古人包悦卿。此人当时是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据说，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后来听说，由包悦卿联系、经蒙藏专门学校教师汪子瑞介绍，布和克什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卜海涛”。王先生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因历史的原因，没法搞清楚了。因为，他所说的包悦卿本人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王先生认为：“俄文大学校长徐谦是共产党人”，这也是不确切

的。因为，王先生当时可能是政治风云的局外人，所以，把所有参加民主革命的有志之士都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此事说明，他所说的“布和克什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说法是不确切的。

据布和克什克生前好友并同事达瓦敖斯尔先生所提供的证据：

“梁萃轩，蒙名布和克什克，1925年经包悦卿介绍参加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的老内人党。他又是第三国际情报员，是由包悦卿发展的，时间大概是1929年。

梁萃轩不是中共党员。

达瓦敖斯尔证明

1990. 3. 15”

达瓦敖斯尔先生于本世纪30年代初，在北平读书之时，经包悦卿介绍，认识了布和克什克。他们当时的关系很密切，连个自的私信都互相公开。

综合王家骥先生和达瓦敖斯尔先生二位老前辈的提供，布和克什克参加民主革命的党是事实。但，究竟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到如今，我们还没有查到确凿证据，所以，布和克什克的党籍问题是个谜。

布和克什克身为一名进步党人，他还努力办过一些革命的事业。1927年4月28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在北平遇害，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在这白色恐怖中，布和克什克勇敢机智地保护已暴露身份的党友脱险；并为共产党第三国际传递情报。

1926年的暑假是他回奈曼老家度过的。此时正好他的父亲乌陵嘎加克拉齐外出办事。他就趁此机会，解散了家里的佣人及家丁等，又分粮食和财产给艾里中穷苦邻居们。可是，当时在奈曼旗举行平分田地财物，解放佣人家丁的革命是不容易胜利的。这并不是对乌陵嘎加克拉齐一个人的斗争，而是针对没落封建王公贵族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封建官僚们群起而反对，当然他的父亲也不例外。布和克什克的这次革命行动，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没有成功。父亲把他抓起来，送到旗警防营扣押，将佣人和家丁全部都找了回来。布和克什克被关押一个星期后，他大哥布和希日莫出面求情并担保，才得以放还。

这次的失败，对布和克什克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启发。别说其当官的父亲不理解，连得到他亲手解放的佣人和家丁们也不理解他的这次行动。为此，他认识到，在黑暗落后的蒙古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应该唤醒民众自我解放意识。欲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普及文化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教养的人做骨干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为了民族的觉醒和祖国的振兴，布和克什克立志走文化复兴的道路。他在家乡革命失败的那年冬天，准备成立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学会。经过一番努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决定成立“蒙文学会”。这里，布和克什克个人的主观愿望起到了决定作用。他这个主观愿望的实现，是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首先，在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蒙古地区逐渐建立了新型学校。此时的蒙古地区，客观上急需一大批

新型知识分子，这是蒙古文化振兴的需要。所以，布和克什克的主观愿望顺应了客观存在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新文化团体。如特木格吐、克兴额、茹力嘎尔扎布、哈达、赛冲阿、宝音得力格尔、仁沁豁尔老……等杰出人物都是这个新文化影响的受益者。他们每个人，对蒙古文化的振兴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其次，在全国成立的文化团体和创刊的报刊杂志如：在北平特木格吐的《蒙文书社》，由那木海扎布、仁秉郡、景天禄、莫日根巴特尔等人创立的《蒙古留平学生会》、众人合立的《蒙古文化改进会》、布仁巴雅尔、朝克巴特尔、陶立彬等人合立的《蒙古青年励志会》。在奉天由克兴额、茹力嘎尔扎布、拉布僧格等人创立的《东蒙书社》、王化兴、舍楞尼玛、萨嘎拉扎布诸人创立的《蒙古文化研究会》。在张家口又成立了《蒙古文化会》。还有《蒙古前途》、《文化专刊》、《励志月刊》、《蒙古》、《蒙文周报》、《蒙旗旬刊》、《蒙古向导》、《蒙古周刊》、《蒙古学院专刊》、《蒙声半月刊》、《蒙古时报》、《蒙古青年》、《新蒙半月刊》、《内蒙古》、《内蒙古国民旬刊》、《内蒙古周报》、《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刊》、《大青旗》、《绥远蒙文半月刊》、《现代蒙古》、《复兴蒙古之声》、《蒙文报告》、《蒙旗青年》、《祖国》、《新闻报》、《蒙古新闻》、《蒙古报》、《新蒙古》、《民报》、《蒙古人民》、《蒙古新闻》、《青旗》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行。这些报刊杂志的印刷发行和诸多文化学会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国内蒙古文化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反映了《蒙文学会》

成立的时代需要。《蒙文学会》的成立，是蒙古族现代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他的成立，顺应了蒙古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而当时的北平，已成了全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此，不但那里的革命风暴极为激烈，而且新文化、新民主、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气候也非常浓烈。

布和克什克不愧为一名杰出的蒙古新文化旗手。他准确地把握了这有利时机的每一个环节，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有机地结合到大势的趋向，认清了《蒙文学会》可以成立的黄金时刻。

公元1926年1月23日，就是农历丙寅年腊月初二十日。在北平城宣武门内国徽大街“大众”公寓10号房间里，布和克什克、布和温都苏、玛哈什里、恩和宝老、吉格木德、拉希僧格、仁沁鼐尔老等绥东县籍7名大学生集会，召开了《蒙文学会》成立的首届全体会议。王家梁虽然也参加了会议、但因不通蒙文蒙语，没有把他吸收为会员。在会上，讨论通过了《蒙文学会章程》。

布和温都苏、汉名梁玉岗、字凤梧，是布和克什克的四弟，毕业于国立北平医科大学后，转赴日本进修医学。后来回到故乡病逝。玛哈什里、汉名赵文儒，法库县人，毕业于北平蒙藏专门学校。30年代在德穆楚克栋鲁普军政衙门任科长职、后提升为法政处处长，其下落不详。恩和宝老、汉名鲍庆丰，今奈曼旗朝古台苏木杜贵艾里人，是布和克什克的外甥，毕业于北平宏大学院语言文学系，后回到故乡病逝。吉格木德、简写成吉莫，汉名陈树堂，字悠琴，奈曼旗新镇乡大歹艾里人。毕业于北平蒙藏专门学校，后到奈曼旗公署任职。病

逝。拉希僧格、汉名王世济、字成梅，库伦旗人。毕业于北平蒙藏专门学校，后到库伦旗、奉天等地任职、病逝。仁沁第尔老、汉名赵连科，字魁元，库伦旗额尔根希伯艾里人。毕业于北平蒙藏专门学校，留北平任职。解放后病逝。王家驊是汉族人，字智轩、系奈曼旗塔本格尔艾里（今义隆永乡五家子屯）人。毕业于北平国立财经大学，1992年91岁，尚安在。蒙古族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蒙文学会》、正是由此八名大学生创立的。

《蒙文学会》首届全体会议，举行了两天，除讨论通过学会章程外、还履行了以上七名会员的入会议式，并选举布和克什克为理事长，选举玛哈什哩为副理事长。会上还商定，要创办《丙寅》（乌兰巴尔斯）杂志，暂定为不定期刊物。从1927年到1932年期间，在北平刊行《丙寅》杂志共三期。刊物封面上，把《蒙文学会》的名称用蒙古文字写成从悬崖上欲下跳的猛虎图样，把《丙寅》写成初升的太阳。第二封面上，把《蒙文学会》数字用蒙文篆写成大钟、解释谓“唤醒愚昧落后的蒙古族”的警钟。书写作画的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额尔克，汉名鄂公元，当时就学于北平美术学校的蒙古人。

《蒙文学会》成立以来，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资助。在北平的数年里，只有布和克什克的父亲乌陵嘎加克拉齐资助50元、奈曼旗王爷的儿子五爷苏达那木达尔吉资助30元，六爷吉茹巴萨尔资助20元、开明富户乌田阿布日勒资助20元、阿尔毕吉胡大喇嘛资助5元，共125元。仅仅这点钱是根本不够用的，学会要想活动，没有资金来源怎么

行呢？布和克什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只能等待自己学业完成，走上社会。

1928年6月，布和克什克毕业还乡。但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在家里住了些日子。《蒙文学会》的活动，也因创办者已经毕业，各走他乡而濒临瘫痪状态。在这数年间，只有布和克什克的二哥布和敖斯尔资助20元，奈曼旗梅林齐克梅林资助30元，布和克什克自己捐献的20元，共70元资金。对学会的各项活动，是满足不了需要的。这些困难，使布和克什克意识到，光有满腔的热情还不行，必须要具备与事业相符的经济基础，才是创业的根本保证。

1929年10月，当时绥东县举行了财政局长的竞选。布和克什克为了事业，在自己家庭和亲朋好友们的帮助下，争取到了预选名单。最后的竞选要到热河省财政厅进行。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一个叫张荣的汉族人被选中，布和克什克落了榜。他便从热河省府承德直接取道北平，受聘为蒙藏专门学校教员。不久，他把妻子儿女接到北平，靠有数的薪金度日。事业不顺，心中非常郁闷。他一方面任教，一方面继续搞《蒙文学会》的工作，一个人的能力难以应付学会的各种活动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斗。

布和克什克在北平，用一个人的月薪养活一家大小的同时，还要为学会的费用集资。对于教师来说，集资只能靠自己的劳动，这方面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为了多集些资金，他通过北平市教育局的介绍，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研究生拉铁摩尔和德国留学生雷星等人的蒙文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与这些外国学生交往密切，成了好朋友。德国留学生雷星有一天告诉布和克什克说，在德国领事馆藏有《蒙古源流》一书。他听到后三番五次地好言相求，最后通过雷星借到了《蒙古源流》。这本书是在德国印刷的，是个德蒙合辟的铅印书。他就日夜操劳，抄写该书，以备日后印刷发行。

布和克什克与拉铁摩尔的关系也很好，给拉铁摩尔教蒙文的月薪金80现大洋。拉铁摩尔同夫人住在北平东郊民巷美国领事馆内的一幢小楼房里。布和克什克每周用两个半天给他教蒙文。拉铁摩尔懂汉语，过去还学过一点蒙文。所以很快就入了门。拉铁摩尔到北平后不久，经布和克什克的介绍，去包悦卿家拜访，接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也有达瓦敖斯尔。包悦卿、布和克什克和达瓦敖斯尔三人也去过东郊民巷拉铁摩尔家几次。1931年夏天，拉铁摩尔同他夫人一道去锡林郭勒草原从事实态调查，研究蒙古的社会制度。在锡林郭勒考察期间，拉铁摩尔给布和克什克来过一封蒙文信。布和克什克把这封信转给达瓦敖斯尔看过。达瓦敖斯尔先生回忆说：“信写得词能达意，可见他蒙文学得很不错”。

在北平的日子里，布和克什克还参与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建活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包悦卿于1925年秋，趁建立该党的准备工作之便，回到他的故乡科尔沁左翼后旗一次。目的是从自己的家乡培养一批党员或为革命事业组织一批后备力量。这次，他选派彭斯克、赵兴燕、白茹真、肖兴嘎和阿布力达等五名青年到蒙古学习，后又增派包尼雅巴斯尔等去蒙古。

包尼雅巴斯尔是科左后旗人。三年后，也就是1930年从乌兰巴托带任务来北平与包悦卿接头。要在内蒙古开展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包悦卿召集布和克什克、阿木尔吉日嘎拉（汉名包肇蒙）和达瓦敖斯尔等三人到他家去开会。会上，包尼雅巴斯尔讲：“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派我来，要在内蒙古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步在北平建立一个筹备小组，着手建党筹备工作。所以，我建议，由包悦卿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与会几个人都表示同意。包悦卿就担任了北平小组组长，布和克什克、阿木尔吉日嘎拉和达瓦敖斯尔三人为组员。包尼雅巴斯尔也是领导人。后来，这位“特派员”包尼雅巴斯尔因意志消沉，恢复和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目的没有实现。

1932年3月8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伪满洲国成立，定都于新京。也就是如今的吉林省省府所在地长春市。在伪满蒙政部当科长的那木海扎布（汉名陈封）是北平学生，他在北平学习期间认识并接交了布和克什克。他得知布和克什克在北平的处境后，给他写信，邀他到东蒙工作。

布和克什克应那木海扎布的邀请，来到伪满兴安西省担任文教科长，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就着手“蒙文学会”的活动。当时的文教科，下设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两大部。这对布和克什克的“文化救国”思想来说，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好机会。他不失时机地把握这个好机会，有力地利用这一合法地位，第一步就加强了文化教育事业。最初，在“蒙文学会”的名下，建立了“蒙文学会

附属补习蒙文、日文学校，该校是小学，在这个学校里，蒙生受到特殊照顾，尤其是补习蒙文班的学生，在《学校章程》第五条规定：“一切愿意学习蒙文的，不管性别、姓氏、年龄之差别，都可以自愿报名入学”。第十一条规定：“除学蒙文的学生以外，其他学生每月交纳五毛钱的学费”。第十二条规定：“蒙文教科书，由本会给配备；日文教科书，由学生自备”。

接着，又成立了“蒙文学会附设蒙古民众讲习所”。该所面向因家穷而没能入学的超龄青年以及寺庙里的年轻喇嘛。“蒙古民众讲习所”从1936年11月1日开学，每半年为一期。在《附设蒙古民众讲习所章程》中规定：“要教授蒙文、理学、常识和实业等课程。教学时间，每周蒙文6节，理学4节，常识一节，实业一节。每天下午6点到8点为上课时间”。原定授课时间的四分之三以上修业者，发给毕业证书”。学生在校的一切费用，由蒙文学会承担”。

到1938年春，在布和克什克的努力下，在开鲁成立了“开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布和克什克兼第一任校长。该校初建时，有8名教师，40名学生。校址在开鲁城内白塔西侧。这个学校，在当时的东蒙来说是一所高等学校。所以，招生范围为伪满兴安四个分省、锦州市、吉林省和滨江省管辖的蒙古族国民优级学校或同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均可报考，按成绩择优录取。培养目标为：建校初期定为农科专业。于1940年改为畜牧科。为畜牧业培养中等技术人材，学制四年。课程设置：一年级至二年级上学期，主要开设基础

课，即蒙古语文、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农业泛论和牧业泛论及军事课。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至四年级，基础课减少，增设畜牧专业课，如兽医学、药理学、畜牧改良学、畜牧管理学、家畜解剖学、畜产品加工学、家畜法定传染病等课。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授课和实习相结合，每学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实习基地从事种田和实习。到1945年秋本校停办为止，共招生约400名，其中毕业200名。该校还负责供给学生服装、伙食、课本及文具，每季度补助学生20元。

1939年4月，在布和克什克的努力下，在开鲁又成立了开鲁“第二国民高等学校”。该校以汉文授课为主，培养中级农业技术人员为目标。招生范围，主要是兴安西省和兴安南省。到1945年停办。

据有关资料，1939年兴安西省的教育情况：国民高等学校蒙汉各一所；蒙文专业学校一所；培养初级教师的临时学校蒙文师范一所；国民优级学校蒙文7所，汉文13所；国民学校蒙文科27所，汉文科61所；国民学舍蒙文科2所，汉文科163所。这些学校大约招收适龄儿童的25%左右。在这么多各类各级学校的建立中，可以说都有布和克什克的一份功劳。其中，为适应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努力是一目了然，是比较突出的。

布和克什克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实践家、而且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他的教育理论集表现在他的《视察日本教育》日记中。

1935年4月，伪满政府组织一个教育参观团派往日

本和朝鲜。该团由13个人组成，杨实楨为团长，崇野喜子为向导。蒙政会方面指派兴安西省文教科长莫尔根巴特尔，兴安西省文教科长布和克什克等参加。布和克什克在视察团里承担每日启程和宿营之地以及迎接和送行人员名单的记录工作。

1935年4月25日，布和克什克从兴安西省省府开鲁启程，5月28日归来，来回途经朝鲜。在这一个多月的旅程中，他们经朝鲜的釜山，平康、仓萃、清津、京城诸地，在日本去过新潟县、奈良县、东京都、大阪、名古屋、广岛、下关、宫岛、严岛、江之岛等地。

视察团在朝鲜、日本的所到之处，都参观了那里的大、中、小学以及幼儿教育和各种专业学校的办学情况，学生的学习、教学授课等状况；又视察各地的名寺大刹，旅游胜地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观赏了各地的戏剧。从整个《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但仔细参观了日本、朝鲜的教育事业，还参观了与教育有关的宗教和文化事业。这次的视察，对布和克什克后来办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从文化教育极为落后的蒙古地区到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日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深深地打动了布和克什克的心。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从日本归来后，布和克什克一方面加快了办教育的步伐，另一方面，注重抓了出版事业。他在出版《蒙古源流》时写序言道：“首先出版这本《蒙古源流》一书，我觉得是一项重要的时务”。因为“如今，英、法、德国以及俄国等

济国都把此书译成各自的语言出了书。可是这个蒙文书却在我们蒙古人中找不到，这是个极大的可耻”。他在出版《蒙古秘史》时，又写序道：“研究蒙古历史的世界各国，都翻译此书做为重要的依据。可是我们蒙古人中却没有蒙文的此书，对自己祖先的重要历史一无所知而又不注意了解。以此看来，被外异吞没而民族灭亡就在眼前。这又能悔恨谁呢”？

《蒙古秘史》是世界民族文库里的一颗灿烂明珠，是蒙古族古代历史、文化、民俗、文学、语言、军事、思想、宗教诸研究领域里的最早的文字根据。所以，《蒙古秘史》、《格萨尔传》、《江格尔》三部书为“蒙古族古代文学三大高峰”；《蒙古秘史》、《元史》、《史集》三部历史书为蒙古族古代史三大要籍”。又把《蒙古秘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纲》三部历史书作为“蒙古族古代史三部蒙文要籍”。对于布和克什克译注的《蒙古秘史》，世界著名的蒙古学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荣先生评价很高，他写道：“内蒙古的知识界把《秘史》从汉语和汉音译成蒙文数次。如：贺什格巴图、布和克什克、阿拉坦敖其尔等人把《秘史》译成蒙文，于1940年前后分别出版发行。其中最细腻而优异的是布和克什克所译的《秘史》。其余的译文只供欣赏者阅读，尚未成为科研成果”。布和克什克的《秘史》是出版发行于1938年，所以，在时间顺序上也是占领先地位。

布和克什克听说辽宁省北票县有尹湛纳希写的《青史演义》，就派希冷阿先生去求。书主怕丢失，每次只借给一

本。还上次借的，才借给下一本。就用这样的顺序，把数百里的路程往返数十次，出版了《青史演义》69卷。蒙文学会先后印刷的有：《蒙古秘史》、《蒙古源流》、《青史演义》、《蒙古青旗》、《一层楼》、《泣红亭》、《视察日本教育日记》、《视察日本宗教日记》、《猫探》、《成吉思汗赞词》、《水浒传》、《保产大成》、《简明历书》、《蒙古今古故事》、《新词典》和一些佛教蒙文经典。短短的几年，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足够人手的困难情况下，出版并发行如此数目众多而内容浩繁的书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蒙文学会”的出版社，不但出版发行了上述名著，还出版发行了《丙寅》杂志4—10期的七个合订本。布和克什克认为，每一个要使自己民族和国家强盛起来的人，必须首先发展自己的文化。要使自己的文化发展起来，就必须广泛搜集古今中外博学之士的文类书籍，把它们译成各自的语言文字。这样才能搭好通向发展文化的桥梁。因此，他在《丙寅》每期每号上都要发表一定数量的新名词术语规范化翻译。在这项工作中，他充分发动广大的蒙古族知识分子，群策群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作得井井有条。仅在《丙寅》4、5、6三期上，共发表一千多条新名词术语蒙汉日文规范化翻译。这对于蒙古族近现代文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正如内蒙文化界老前辈特古斯同志在其《我们那一代青年一回忆东蒙古青年运动》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知识，使东

蒙古青年摆脱了世代相传的许多神秘观念和精神枷锁，从而，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这首先表现在对喇嘛教的鄙视，进而对整个封建制度产生不满。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是互为条件互相联系的。日本法西斯统治扼杀民主和自由，推行野蛮的法西斯教育制度，不能不引起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而从各个方面唤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直接面对的也正是日本侵略者。”所以，日本人对蒙古族的很多开明王公、上层人物及文人硕士产生了怀疑，甚至采取了暗害的毒手。布和克什克的所作所为，都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怀疑，但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公开引以借口的行踪而干着急。

1935年7月，在布和克什克的家乡奈曼旗发生了周荣九领导的“抗日救国军”起义。23日，占领了本旗伪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镇。在八仙筒镇守的日本人中，除一个人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歼。对此事，日本人怀疑布和克什克为“内线人物”，百般刁难。

1939年5月，在满蒙边界处的喀儿喀河、诺门罕山一带，发生了“诺门罕山事变”。日本关东军、伪满兴安军和苏蒙红军之间，发生了多次大量的军事冲突。这次战争持续了135天。9月16日，日伪军被歼54000多人而告结束。从这个战场上，一部蒙古族军人反戈。此事又增加日本人对布和克什克的怀疑。于1940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传讯布和克什克到新京，询问《丙寅》刊物的定名原由。结果，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把柄。为此，日本人更加怀恨。最后采取了“调虎离山”的诡计，以“提升”的名

义，撤销布和克什克的文教科长之职，改任伪满兴安西省实业厅厅长。这一招，对于提倡“文化救国”的布和克什克来说，真是致命的打击。而他也非常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所以他就采取了对新职的“消极”对待进行反抗。从此，他整天喝酒，迷迷糊糊，假装成不问世政的“酒客”。可是他对“蒙文学会”的工作，一点也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细致，更加认真了。

1943年1月13日晚七点钟，蒙古文化的功臣布和克什克告别了人世。对于他的逝世，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病逝。因他志力的事业受到日本人的横加责难，没法继续下去而郁闷成疾，直至消沉而逝。另一说法是，日本人用毒酒害死的。1月13日，日本人请他赴宴，回家之后，口吐绿水而毙命。

“蒙文学会”的会员额尔德木特古斯先生在《丙寅》杂志上发表了《哀记布和克什克老师的逝世日》的文章，在此文章的末尾，写了一首诗曰：

“众多蒙古中的明星，
智慧精神坚毅志士，
大家虽愿他长命百岁，
如今“老天”却不容……
诀别我们而走远了，
诀别我们而走远了。

不分昼夜地奋斗，
心身过劳累过头，

命不该寿终啊悠，
可恨的“老天”抢夺了，
真是我们的命不好……
真是……”。

布和克什克逝世后，在兴安西省会所在地开鲁镇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丙寅》杂志上发表了“悼词”。

追悼会结束后，用专车送灵柩，到其故乡布和乌苏艾里。64人的大担架抬其灵柩到他家的坟莹地安葬。

今天，他的灵柩虽静静地被埋在既无灵牌，也无碑文的土坟中，但他那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顽强精神鼓舞着千秋万代的人们去热爱祖国、振兴祖国。

（五）思 想

布和克什克虽然是加克拉齐那颜的儿子，但他生长在贫苦牧民团道的家中。他从一个普通牧民的儿子，成长为现代蒙古族著名的文化巨人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意识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变化。他的思想意识形成于他的生活和事业之中，反过来也影响了他的生活和事业。

布和克什克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他的民主性。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从小接交的是穷苦的孩子，所以，他一方面同情和可怜穷苦百姓；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又因受到变革时代特有的熏陶，对于这些穷苦孩子的遭

遇，从可怜和同情转变到究根追底，思考其究竟。另一方面，因过继给团道，他已失去了加克拉齐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在他面前，唯有一条路，那就是追求知识，出人头地。

在布和克什克一生中，最关键的是北平的大学生涯。那时，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国内的国民党、共产党等诸党在该地进行积极的革命活动。尤其在各大学府，这种活动更为集中。这种环境，正是民主思想的摇篮。

布和克什克每次放假回家，都要和其父亲及大哥辩论，传播民主思想。屡次规劝其父兄、要解放家内外的阿拉巴吐和奴仆。1940年探亲，他力劝长兄布和希日莫为本艾里穷苦牧民建立一所小学。校舍由布和希日莫负责，腾自家的五间房子，并请一名叫金豆的教师任教。老师的薪水一半由布和希日莫付，一半由学生家里摊。

有一次，布和克什克又探亲回家，当天夜里有人偷盗他们家粮食，无意中让布和克什克碰上了。他却低声说“拿去吧，拿去吧！白天不拿就行了！”他每次回家，都要召集全艾里的儿童及年轻人组织他们摔跤、跳舞、唱歌。之后，或多或少都要赏给一定的奖品。有时将穷苦孩子们请到自己乘坐的汽车上，兜兜风，以此开开他们的眼界，启迪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激发他们对命运的挑战。有时要是赶上季节，他就主持祭尚师树，祭鄂博活动，并设宴招待，与穷苦乡亲们同乐。

布和克什克在开鲁镇任伪满兴安西省文教科长之时，创办了“蒙古民众讲习所”，专门招收蒙古族孩子念书，从来

不收学费、书费，甚至生活费也予以资助。在他教习下，读书成才的为数不少。如现任奈曼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吉格木德道布敦，原奈曼旗体委主任，现已离休的老干部拉布丹等人，都是住在布和克什克家念书的。当年的贫家子弟，今奈曼旗治安镇察干淖儿艾里叫巴图巴雅尔的学生，因家庭生活困难而欲退学时，克布和克什克主动承担其一切费用，让他继续念书。

布和克什克不但资助穷苦孩子们念书，还从寺庙里劝导年轻喇嘛还俗，让他们也到“蒙古民众讲习所”里接受文化教育。为此，有些寺庙的活佛（格根）对他很不满意，常常发生争执。有一次，奈曼旗大沁庙的格根大兴土木，扩建庙宇。布和克什克闻讯赶到，很生气地对格根说：“不去建培养人的场所，而耗资扩建愚弄人民的地方，你的目的何在？”当时与他共过事的额尔敦陶克陶胡老师曾这样回忆道：“该学会（指的是蒙文学会）附设的蒙古民众讲习所是专门招收那些没能入学念书的超龄的穷苦孩子等，教授他们蒙古语文、数学和常识等诸课程。这里边每期都有男女生三四十名。从这里培养出了很多有用之才”。

布和克什克故乡的老人们回忆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对谁都那么热情，尤其对穷人，一点儿也不摆官老爷架子”，“他非常谦虚，对人和气，乐于帮助穷苦人”，“他对穷人，如同亲兄弟，我们从来没见过象他那样的伪满官吏”。布和克什克逝世后，蒙文学会创办的《丙寅》杂志第九期1—3号上所刊悼词称“尤其是对穷苦人的解囊相助之怜悯精神，开导愚昧的热心之衷，极深切真”。如此种种，

足可以证明他的民主思想之真函。

其次，布和克什克思想的又一特点是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不彻底性对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没能带来丝毫的变革。如同狂风暴雨，一掠而过。对于内蒙古地区，也没给带来任何的革命。反过来又增加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压迫。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军阀和蒙古王公等的数层压迫条条毒绳，勒紧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脖子。人民痛苦不堪，民族受尽糟蹋。用布和克什克的话说：“蒙古民族已遭到了被异族吞没的危险”，“蒙古民族已到了风烛残年的关头”。

成为一名有识之士，布和克什克在种种对比中发现自己民族的愚昧和落后，他为蒙古地区、蒙古民族寻找兴旺发达之路，历尽了千辛万苦，耗干了毕生的心血。他在《蒙古源流》序中写道：“人类在宇宙间生存，首先必须帮助本民族大众，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以此为目的，各自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也为此而终生奋斗，才合世理，初学文化知识者，可遍译各自方之文字，习他国文化。学就成功之后，必须为本民族人民大众造福，为此把自己所学到的文化与知识用到本民族文化之中，用本民族语文来发展自己所学到的一切知识。这样才能发挥其学知识的功用。如果初学时用异国文化而发挥时亦用异国文化，则其学识毫无用途，反而促使自己的民族被异国他族吞没而灭亡。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自己一生所勤奋学到的知识是无用的，只是为你自身一人的高官厚禄而奔波，背叛了父辈师道的精心教诲。更甚者，

成为导致自己民族于灭亡之境的罪人。如此，怎能说他的行为恰合了使之受教育的目的”。这就是布和克什克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但这么说，而且用其一生的实际行动去实践自己的这种诺言。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所学到的全部知识、才能和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无遗地献给了蒙古民族的文化之兴盛，为自己民族的光明出路而奋斗了一生。因此，当他逝世后，《丙寅》杂志上发表的悼词：“高尚的他在生前为祖国和民族奋斗的功劳与荣誉，留芳于人世千秋万代”。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布和克什克的以民族振兴为目的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那种排除异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世界，为自己民族的振兴而奋斗的行为是合理的，是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振兴自己的民族，对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是其主要精神之一，也就是时代的需要。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中逝世的布和克什克的死因，也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个道理。对此，德国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格在其《蒙古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写道：“日本人对对自己的权力和策略怀有反感的人，是毫不客气地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把蒙古民族的民族主义者看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同伙，类此事件发生过多，日本人不但怀疑游击队的积极行动，而且更怀疑利用日本人的影响来达到自己民族目的蒙古民族主义者。蒙古民族出版事业的创始人布和克什克突然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他是‘为保卫蒙古文化和民族，而利用日本人，在东蒙地区创办出版事业多年的人。可

是如今，他受到日方的警告。理由是从民族主义出发，不欢迎日本人的策略等。1943年，《蒙古日报》报道了蒙古文化的卫士布和克什克的突然逝世之噩耗。据美国出版界的战后报道，才清楚日本人把布和克什克判处死刑的消息”。这是布和克什克死因官方报道。这件惨案可以证明，布和克什克的民族主义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所以，侵略者对他下了毒手。据说，“蒙文学会”在开鲁的初期，会务所门两边挂蒙汉两个匾。日本人知道后，威逼布和克什克要用日文写一匾也悬挂上去。对此，布和克什克极为愤慨，他把汉文匾拿掉，反留下蒙文牌子，以示反抗。

哲里木盟运输公司经理，离休老干部张学勤回忆说：

“伪满时期，我从我老家唐山逃兵来到兴安西省，由别人介绍，老布收留了我。他时常对我说：‘在我这里待着吧，没事。如果发生什么事，有我呢！我们总不能当亡国奴的，布老师不摆架子，总喝酒。’”这位张老是1939年来到开鲁的。

仔细观察《丙寅》杂志，布和克什克生前所出版的各期各号上，基本见不到吹捧日本和伪满政权的文章，而清一色是蒙古文化方面的著作或“蒙文学会”的事务。自从布和克什克逝世，《丙寅》杂志的第9、10期上就出现了德、意、日侵略战争，歌颂“大东亚共荣”的文章。从以上诸事看布和克什克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的各种迹象，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有坚强民族意识的文化战士。

布和克什克思想的又一鲜明特征，是他的“文化救国”思想。他出身于贫穷落后的蒙古地区，通过刻苦学习，不断

进取，成长为一名文化巨人。在这艰难的人生旅途上，他的知识与日俱增，他的思想日趋完善。他认识到，蒙古地区的愚昧和落后，主要来自于文化的不发达。自从满清统治以来，对蒙古地区施行了宗教治理的策略。因此，蒙古文化的发展走上了歧途。布和克什克在《丙寅》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悬赏约用蒙文创作的作品稿子的通知》中指出：“我们蒙古民族因不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为期很长，所以目前已到了被外异民族吞没的危险境界。当今一切文类书刊，都是从汉文译过来的，而用蒙文创作的文章如白天的星星。所以，怎能振兴自己民族的文化、摆脱被外异吞没的命运呢？”为了摆脱迫在眉睫的这种命运，他在北平学习时期，着手创立了“蒙文学会”。该会的宗旨为：“本学会要研究蒙古文化，把一切有益的科学知识用蒙文普及，以此开化和提高蒙古民族的智慧，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为宗旨。”在布和克什克生前，本学会遵循这个宗旨，对蒙古民族的觉醒和开化起到了难以磨灭的历史作用。他以“把一切有益的科学知识用蒙文普及”为着重点，奋斗不息。在《蒙古源流》的《序》中，布和克什克写道：“自从忽必烈可汗的时代，创造了蒙古文字。但其后人埋头于译注佛教无用的经卷而空耗时间，而用蒙文撰写自己民族史迹的文章，仅此一书，实属可叹”。“本会致力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它的编写文彩之好坏。首先，世界很多国家为研究蒙古族源流以及其勇猛无比的历史而用各自的语言文字翻译了这本书。如果我们蒙古人不重视该书而遗失的话，岂不是惹人耻笑吗？其次，自从我们蒙古人有文字到如今，已过六七百年的历史，而用自己的文字编著

经卷文章的人非常少。有的精通蒙文者，只翻外邦无用的故事或小说，而不致力去写蒙文的民众智慧的结晶，民俗有益的书籍。如今搜集到这本唯一的蒙文书籍，我所致力要出版的意图就是唤醒我们的子弟，不要崇洋媚外。”我衷心希望各位学者文士，体谅拙学会的苦心，要尊重我们的蒙古文化，放弃崇洋媚外，厚异薄己的思想，借萨那彻辰洪太吉为鉴用蒙文撰写一切文章或书籍，来拯救风烛残年的蒙古民族。为此，特写此序”。

布和克什克在《观察日本教育日记》的5月5日一则中写道：“六点，开了恳谈会，同共参加的70多人。喝酒喧哗的景象可谓幸福。还有弹月琴，唱歌跳舞的十来名美丽的日本姑娘，使与会的日本人兴高彩烈。我们几个，因不大通日语，只能悄悄地听歌看舞而已。依此看，做为一个人，不注意保存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不注意立足于自己的脚根，那么，享用别人的美食和歌舞是不会感觉到甜美的”。他在远离祖国的日本岛国，享受贵宾的优厚待遇之时，依然忧国忧民，没有忘记自己民族振兴之大业。

布和克什克在《丙寅》第五期第2号上发表的《给全体会员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蒙古人自古以来，凡事都持‘我不会’的态度，不进行探讨和研究。结果，文化到了目前这等地步，难道还没有发觉吗？任何国家的文化，起初怎么落后也无妨，只要他们以自己的为基础，吸收别人好的、有益的东西，坚持向上，努力不懈。这样，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看到自己的落后，而不争取向上，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蒙古人有句俗话不是说‘画龙要一笔

一笔地来吗？就说你和我作的文章不好，但是，以这不好的文章能够引出他人的好文章，那么，可以说你和我的义务已经完成。只要这样，以不好的文章引出好的文章，一个国家的文化才能兴旺发达。蒙古文化的发展，也是否要走这条路呢？诸位先生们，请努力奋斗吧！拜托你们了”！他认为、每一蒙古知识分子，应当发挥各自的作用，奋发进取，为后人打好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兴旺发达。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所以，也合乎蒙古文化的发展进程。

布和克什克“文化救国”思想的又一内涵是“以自己的为基础，吸收别人好的和有益的东西，坚持向上，不懈努力”。这是在说，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持封闭政策，而在发展文化的进程中，应该提倡开放，应该进行创造。他在《丙寅》第5期第3号上发表的《有关翻新名词术语的通知》中指出，“纵观世界各国，欲振兴自己民族的有志之士，首先必须振兴文化。如果想要振兴文化，必须广泛搜集古今中外诸多明贤圣家及博学之士的文章书籍，翻译到自己语言上。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领会，不领会则难以研究。不如此，学习之道被封闭，开化之路难寻觅。更甚者，我们蒙古民族落后于新文化。因此，现代学校必用的教科书之类尚没有翻译完备，尤其新设学校所用的各种书籍中什物之名，还没有统一的翻译，没有全社会遵循的统一的工具书”。因此他以“蒙文学会”的名义，组织翻译了新名词上千条，分别发表在《丙寅》杂志上。他主张引

进外异文化，但反对囫圇吞枣的方式去吸收。也就是反对不分精华与糟粕的迷信学风。他在日本期间，观看了日本剧《蒙古人征日本国》之后，写道：“大体上，日本戏剧原来模仿中国戏剧，如今模仿西方戏剧。但是我看到，日本人无论模仿哪个国家，其剧中的生活主要是以本国为主，并不是照搬硬套。这就是日本人学习他人的长处，补充自己所不足，步步走向强盛的原因”。

纵观布和克什克的“文化救国”思想，其内容首先要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即自己的文化。其次，发展文化要“以自己的为基础，吸收别人好的和有益的东西，不断向上，坚持不懈”。布和克什克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里，用很普通的道理，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总规律。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凡是文化，也属于事物的现象。所以，也是遵循这个普遍规律而发展的。布和克什克的这种观点，是合乎这条规律，也就是对此规律的通俗解释。他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科学的观点。到如今，他的这种观点也没有失去其科学的价值。但他的整个“文化救国”思想，因受时代历史的限制，各方面的条件之不成熟，没有得到成功。可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从事的事业，对其后来的今天，则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内蒙古各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担负了各自应担负的重任。他所印刷的蒙古文化结晶，今已成为国内外注目的重点课题，

对蒙古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影响。

内蒙古民族师院蒙文系

额尔德木图、宝音陶克陶。

1992年5月4日第二次修改于通辽

奈曼旗末代扎萨克 ——苏达那木达尔济

希儒博

苏达那木达尔济是奈曼旗第十三任扎萨克郡王玛什巴图尔第五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玛王续弦福晋毓琪（又作禹吉）所生，少年时曾在本旗寿宁寺（即大沁庙）充当喇嘛，学习藏文为主，兼习汉、蒙古文字。

中华民国初年，封二等台吉，还俗后称“五爷”。

民国十四年（1925），奈曼旗协理都特乃那木吉拉年迈辞职后，以苏达那木达尔济补缺，为“曾保协理”（意为候补协理），在旗扎萨克公署协助其二胞兄苏珠克图巴图尔治理旗务。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1926.12）其二胞兄病故，因无嗣子袭爵，苏达那木达尔济以自己是“正妻所生”欲任旗扎萨克，承袭亲王爵职。他上下活动，四处维人，颇受旗署官员的拥护。从扎萨克协理到旗下扎兰章京、巡总（区官）等地方官员曾推举他任扎萨克亲王。为此，苏达那木达尔济及其追随者和苏之三兄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之间发生争执，引起诉讼，笔者已在《兄弟争位案》中予以详叙在此不再赘述。

民国十七年七月（1928.7），昭乌达盟盟长扎嘎尔亲王鉴于所属奈曼旗多年无首状况，采取果断措施，请示热河特区长官，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批准，由热河下达了“任命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为暂行代理奈曼旗扎萨克亲王”的委任令，此举仅仅是当局为缓和裘爵矛盾，暂安民心的权宜之计罢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裘爵争议的。但是争位纠纷总算是告一段落。此时此地“五爷”见自己的百般努力均未奏效，他万没想到会鹿死他手，尽管是“暂行代理”也罢，奈曼旗的“头号人物”还得说是“三爷”。对此他耿耿于怀，当然不会为其对手协助治理旗务。况且，曾推举“五爷”的那些老班底儿也不会为新任首长卖命，致使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举步维艰，无可奈何。

至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准以记名协理哈斯宝（于民国十四年，为递补原协理古纳麻迪遗缺而批准为记名协理的）为奈曼旗扎萨克协理。时过半年于1932年6月，蒙藏委员会批准，任命哈斯宝为协理。按民国政府所颁《盟、部、旗组织法》第23条之规定，协理一职已改称旗务委员，但尚未普遍实行，所以仍以旗协理任职。

当年10月，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又亲自签署《奈曼旗公署请转呈任命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为正式扎萨克由》之公文，谨呈蒙藏委员会，“请钧会鉴核，转呈行政院准以明令任命现任代理扎萨克、辅国公图古斯阿拉坦呼雅克承袭先扎萨克爵职，为正式扎萨克实为公便。且值兹时局紊乱不定，日祸迫于眉睫之际，诚蒙速定大计训示只遵，则本旗尤

不胜庆幸”。并附图格斯阿拉坦呼雅克履历一份，此文签发日期为10月12日。而于10月16日，昭盟盟长扎嘎尔呈文蒙藏委员会称：“本年十月间，据该旗呈称‘经协理官员等召集本旗旗员、十二参领、七区区官开会讨论，拟以先王三胞弟图格斯阿拉坦呼雅克承袭扎萨克，然伊溺于烟酒，懒惰性成，不能处理旗务，人民只能蒙其害未受其利，查先王五弟、二等台吉苏达那木达尔济老成持重，熟谙蒙汉文字，堪以主持旗务，民国十六年（1927）间，旗官民曾保荐承袭扎萨克爵职，有案可稽。现仍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该缺方为合法’据此相应抄录原呈及名单，函请贵会查照，转呈国民政府以苏达那木达尔济承袭奈曼旗扎萨克颁发任命状以顺与情，而视旗务”。图格斯阿拉坦呼雅克的呈文尽管先于盟长呈文4天呈院，但后者的意向是明显的，这次昭盟盟长可以说是明确表态了——根本未提及任命代理扎萨克图格斯阿拉坦呼雅克为正式扎萨克的意见，而同意了奈曼旗署官员，地方官员们的意见，对此图是不知道的，可见在“三爷”任职的四年多时间里，“五爷”并非闲居，终究“做通”了盟长的工作。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1933.3）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某将昭盟长呈文转呈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并在呈文上签署了：“准予荐任苏达那木达尔济为昭乌达盟奈曼旗扎萨克，以顺与情，而利旗务”的批文。此件在行政院第92次会议上通过，以国民政府第530号指令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一员为昭乌达盟奈曼旗扎萨克。于4月7日将“指令”以行政院515号训令通知蒙藏委员会“知照此令”的批复文

件。从此苏达那木达尔济便成为本旗历史上第十六任，也是末任扎萨克。不过，国民政府的委任状送达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后，“准昭乌达盟现陷于暴日势力范围，邮路不通无法寄达”。所以蒙藏委员会石委员长于4月11日以蒙字第478号训令“令本会驻平办事处查收（委任状一件）覓便转寄”，苏达那木达尔济梦寐以求的扎萨克“委任状”就这样在北平压下了。其实，即使收到“委任状”，在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奈曼旗也发挥不出它的效力。因为日本人不听从国民政府的任何指令的。

日本人侵占奈曼后，为建立伪奈曼旗政权而从伪热河省政府委派旗务科长吉川（日人）等来旗调查，将“苏达那木达尔济任旗扎萨克为宜”的调查报告呈省民政科，请转伪满政府民政部批准。直到伪康德二年（1935）三月，据伪满政府决定撤销了原绥东县公署和奈曼旗扎萨克公署，合并建立了伪兴安西省奈曼旗公署，并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为旗公署旗长，日本人山守荣治任代理参事官。下设总务、内务、警务、财务4科9股，旗公署仍设于八仙筒。当时苏达那木达尔济虽为旗长，但很少在八仙筒居住，大多在大沁他拉（那时叫王府）。一是管理全旗政务、军务的“色恩格日”（意为档子房，色恩：满语，格日：蒙语）设在王府，二是家眷亦在此处。所以很少为日本人“效忠”、而天天围着他们转。

当伪奈曼旗公署建立的四个月，即7月23日，以周荣久为首的“奈曼抗日救国军”攻陷八仙筒，交战中击毙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公事后处决了被俘的署官佐

佐木正太郎、警长田金座和盐务局长木村等，日本人仅一人逃窜，其余全部被消灭。8月初，周部撤离，日伪重占八仙筒。日本人一方面派兵讨伐周荣久部，镇压奈曼人民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于1935年末，涉嫌扣押了苏达那木达尔济等人。其中姜子全、王宪中、马金宝等人被杀害。苏达那木达尔济和何文章被押送到新京（今长春）审讯，后来日本人“高抬贵手”，于康德三年末（1936）将苏、何二人释放，但削去苏之旗长职务，由原内务科长哈斯宝继任旗长，关日猛任参事官。旗公署也迁址大沁他拉。从此，退为庶民的苏达那木达尔济退出王府迁往北仓平房，深居简出，不问国事，一直闲居到伪满垮台的1945年8月。

1945年8月14日，驻旗内之日本人闻开鲁已被苏联红军占领后，在旗警备队护送下携带家眷和大量公款逃往阜新，伪奈曼旗公署瓦解。但哈斯宝却带领部分人员到达开鲁与苏军取得联系，他报告驻奈日军全数逃跑，苏联军没有必要进入奈曼旗提出改道而行的要求，这一要求被苏军拒绝并缴了他们的枪械。所以哈斯宝归家不出，旗内处于无政府状态。

此时，退避三舍达8年之久的苏达那木达尔济见时机已到，便东山再起，他以“旗内无主，秩序混乱，蒙汉民众公推苏某治理”为由，自称“奈曼旗临时人民自卫委员会会长”着手组织该会。该会简称“维持会”旨在“维持旗内社会治安”。9月，“维持会”组建就绪，苏任会长，哈斯宝力嘎任副会长，下设总务部、指导部、保安部和11个维持分会。还组建了奈曼旗保安司令部，苏达那木达尔济任司

令，洛布等任副司令，辖4个保安队，每队号称500人马。其实全部尚不足600人，司令部设参谋处、副官处和军需处，任命了各处长。保安司令部以保卫旗内安全为名，实际上是为阻止八路军入境，阻挠奈曼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

1946年1月，八路军张学思部之潢水支队计划路经奈曼北上，曾派人与苏达那木达尔济联络协商，然而被苏拒绝入境，并在扎兰湾子，小西梁等地派遣保安队，准备阻击从敖汉进入奈曼的八路军部队。八路军是“先礼后兵”，在协商无望的情况下，奉命强行北上，在西梁发生战斗，打死打伤保安队何文章及其部三十余人，副司令洛布等亦受伤，并俘获白子珍等。八路军战士也伤亡十多人。保安队溃败，八路军部队经奈曼境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五爷”在掌握了奈曼旗政治、军事权力后，又企图控制旗之财政金融这一经济命脉，他任会长后，便下令印制旗内流通券（俗称“五爷票”）为货币。当时本旗流通的货币有“九省流通券”（国统区所发）、边区票（冀热辽边区发）、老头票（伪满洲国币）等数种，苏乘金融混乱之际，印发“五爷票”投放市场，流通几月，到1946年3月，本旗解放后方取缔。

苏达那木达尔济很早就倾向于国民党，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扬言要跟“带卓帽”的（暗指蒋），所以他千方百计反对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奈曼。为投靠国民党铺平道路，便精心炮制了《热河省昭乌达盟奈曼旗报告书》派其代表人程子泉、江树藩于1945年11月1日起程赴平，27日到达，将“报告书”呈送蒙旗宣抚团负责人白云梯、

吴鹤龄等。白、吴将“报告书”抄件留存后，将原件以“决邮代电”于12月4日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罗委员长。

这份“报告书”包括旗内情况、旗外情况、希望事项、行程沿途经过等4项14条，主要记述了日军撤退与苏联红军入旗情况，组织旗维持会情况以及八路军在友邻旗县和沿途所见的有关军事情报。而在“希望事项”中公然提出：

“恳求中央早日派员接收或先派遣飞机散发标语宣传单，以期安定民心；恳求国军实力及命令援助以便连络邻县旗协力抵抗八路，以免蹂躏；恳求指示一切进行方针；来年春耕希望补助”。可见苏达那木达尔济之立场观点是相当明确了。苏见报告书发出近三个月，仍无“国军接收”的消息，急不可待，便亲自出马，于1946年1月末（临近春节）带领江树嘉、布和温都苏二员去北平，打算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但在平等待月余无果，于3月初回返奈曼。

1946年2月下旬，驻开鲁国民党张念祖部侵占奈曼盘踞大沁他拉十余天，把维持会成员全都软禁起来，进而宣布恢复绥东县治，任命侯勋烈为县长，着手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当时，奈曼旗哈斯通力嘎等有识之士和进步力量则主张投靠共产党、八路军。鉴于张念祖部在奈曼的猖獗活动，为尽快解放奈曼，被软禁监视的哈斯通力嘎，通过其妻子与外面取得联系，并火速派遣米吉僧格、宝连和、那德木都、宝迪呼图嘎等，潜出大沁他拉，直奔库伦。他们到达库伦后立即向中共库伦旗委书记赵任远和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司令员阿思根将军汇报奈曼情况。经领导研究，当即派遣新四军三师

独立旅驻库伦部队由蔡团长率领，宾图旗、库伦旗自卫军部队由阿思根指挥，在本旗保安队配合下，于3月10日一举解放了大沁他拉，张部溃不成军，向下洼方向逃窜。16日正式成立奈曼旗政府，哈斯通力嘎、云戒三任正、副旗长，并秘密成立中共奈曼旗委员会，赵任远任书记，奈曼各族人民从此获得解放！随即宣布解散奈曼旗维持会和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队改编为东蒙古自卫军二师九团（后改为十五团），任命马旺哈尔（汉名马占峰）为团长，梁洛布等为副团长，奈曼有了人民的地方武装力量，但洛布等与“五爷”是一个观点，加上军权易入他手，而深感不满便以回家养伤为由，携枪带马返回故里。

自北平回奈曼的“五爷”到北票就闻知大沁他拉已解放，其“会长”、“司令”的头衔已不复存在，便滞留北票。并且从那里于3月12日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电称：“昭乌达盟政府业于奈曼旗三月八日复员办公，谨率全盟民众拥护中央。谨此电闻。”落款是：“代理昭乌达盟长苏达那木达尔济，三月十二日、北票”。苏何以当上昭乌达盟代理盟长呢？并声称3月8日盟政府在奈曼旗复员成立了。其实这都是虚张声势，欺上瞒下而已。苏达那木达尔济在北平面见蒙古宣导团主任吴鹤龄时，吴面授机宜，透露让苏“五爷”出任昭盟代理盟长的意图。并答应立即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批。然而吴鹤龄何时请示、如何办理情况尚不清楚，可有一点是事实：1946年10月28日由中正签发的一份国民政府电文中称：“令蒙藏委员会罗委员长：关于蒙古宣导团吴主任‘请准奈曼旗代理扎萨克苏达那木达尔济

代理昭乌达盟盟长职务并赐嘉勉’一案之办理情形，希速具报为要。”文中所谓“办理情形”是“电请东北行营查明俟复后再行核办具报”，意为责成东北行营调查清楚事实情况后方能审批。见此电令后蒙藏委员会、东北行营、行政院等逐个办理于民国卅五年末（或卅六年初）行政院才正式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为代理盟长。蒙藏委员会罗委员长以及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分别致电“祝贺”。从中可见苏在没有正式委任前近一年时间已经身居其“职”了。

“民国卅六年二月十日(1947.2.10)苏达那木达尔济向蒙藏委员会呈报盟政府印信启用文书：“兹已袭就木质印信汉蒙文合璧，文为‘昭乌达盟盟政府印’已于二月十日在开鲁街盟政府办事处正式启用，附检印模二份，咨请查照备案”。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3月26日兼理院长职务蒋中正批示：“呈件均悉准予备查。此令”。从此，正式执掌昭乌达盟盟政府大印的苏达那木达尔济，已摘掉“代理”二字，从4月份起成了昭乌达盟盟长。然这些都是后话。

1946年3月，滞留于北票身居双“代理”职务的苏达那木达尔济，明知自己在奈曼大势已去，人民政权不会欢迎他这种人的，所以不宜在奈曼公开露面。1946年夏，辽西战场形势发生变化，阜新、库伦、通辽、开鲁等友邻旗县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形势相当严峻。早就关注形势变化，窥测方向的苏达那木达尔济潜回奈曼，并秘密会见了“养伤”在家的洛布等和其它一些老班底人员，串通一气，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以动摇人民群众跟共产党八路

军走的决心，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秘密策划，发动我二师十五团部分连队叛变，并勾结宾图旗叛匪高山的队伍，汇聚千余人，于8月27日攻打奈曼旗大队驻地八仙筒街。“五爷”和洛布等亲自指挥战斗，致使我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等6人牺牲，十余人受伤。八仙筒被叛匪占领后，有些旗大队干部，战士家属被严刑拷打，甚至枪杀。在交战中也有些无辜百姓遭到杀伤。这就是1946年的“八仙筒事件”。在“五爷”和洛布等的策动下，叛匪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挥师向奈曼旗政府所在地大沁他拉进犯。当叛军队伍到达昂乃时，遭到我增援部队25团的迎头痛击。他们溃不成军，四下逃窜。后洛布等率其残部逃往开鲁，苏达那木达尔济随南逃残部潜往阜新，投靠驻军国民党71军。苏闻知其大胞兄、奈曼波日和硕庙活佛舍冷旺宝住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其时称蒙古勒津旗）陶斯营子时就到那里与其兄一度同住于此。

10月10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派人动员全体喇嘛归顺。这时苏达那木达尔济在喇嘛们中间进行游说、煽动，特别是极力拉拢其大胞兄带头归顺国民党，但舍冷旺宝断然拒绝了五弟之“劝告”，毅然决定不跟国民党，从而与其五弟分道扬镳投奔光明。果然，于次年4月赴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光荣地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初，苏达那木达尔济经国民党东北行营准许，在锦州市向阳区文化街十三段二〇二号挂起了“昭乌达盟政府”和“昭乌达盟奈曼旗驻锦办事处”的牌子，正式

“办公”。随之，昭乌达盟所属各旗“复员”以来，也陆续集中锦州“联合办公”，都挂起了各旗驻锦办事处的牌子。在锦期间，昭盟政府先后收到各旗“为请愿速行推进盟政，复员各旗，并设法救济武装难民由”的呈文。其中奈曼旗由徐兴周、席品三、洛布等、崔永昌为代表，所呈报告中声称：“奈曼旗急待救济的难民男16000人，女5800人。武装难民（即叛匪、土匪武装——编者）人员1500人，马匹1500、枪械1200、弹药40000”。代理昭乌达盟长苏达那木达尔济将呈文一一审阅汇总后，将各旗请愿书原件，后附“昭盟各旗武装难民调查表”一并以昭盟秘字第十八号咨于1947年3月20日上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至同年12月，昭乌达盟的确实得“难民救济款”5亿圆（中华民国币）。并组织由苏达那木达尔济为主任委员的“昭乌达盟赈款查放委员会”监发。洛布等不知何以“奈曼旗扎萨克”的身份，在该委员会中充任“查放组长”。在发放表中反映，奈曼旗“流亡义民”人数为2540名，人均得折合券币13万5千圆，分配券币总额为3亿4290万元。事过月余，于1948年2月6日，苏达那木达尔济自锦州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张院长、社会部谷部长、蒙藏委员会许委员长一并致电，为“概拨国币五亿，惠济昭盟难民，谨表谢意”。

1947年4月17日，新任昭乌达盟正式盟长不久的苏达那木达尔济，以“救济并发展本盟畜牧事业”为由，呈文蒙藏委员会，请转呈“四联总处”贷款一亿五千万圆。

“四联总处”乃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是四大家族垄断旧中国金融的机构。1937年7月成立于上海，蒋介石自任理事会主席。1948年10月撤销。此次贷款请示，经理事会决议，“转贷蒙民一亿五千万元，并函飭本行承德支行遵办”。至于该贷款如何用于“发展本盟畜牧事业”，或用于何处，均无下文。

同年9月1日，苏达那木达尔济函请蒙藏委员会转呈中央奖励本盟剿匪有功人员，并附“昭乌达盟所辖各旗应奖人员表”一份，其中奈曼旗洛布等、嘎斯拉、江树藩、金宝昌在列。打算以此来对朝不保夕，行将被歼灭的“武装人员”鼓鼓气，继续为其卖命而已。不仅如此，他还以“恢复本盟保安长官公署，并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执行保安长官任务，俾利指挥而增强作战效能”为由，于同月25日，致函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然而上述请示均无见复。也许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战略反攻打得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的确无暇顾及这些区区琐事了。

1948年3月8日，急于建政的苏达那木达尔济，以昭乌达盟盟长身份，拟定“昭总字第15号”代电，向国民政府呈文“准以敖汉旗、巴林左右二旗、扎鲁特左右二旗、翁牛特左旗及克什克腾旗七旗办事处升格为旗政府。原办事处处长7人代理该旗札萨克”的请示。后经当局批准，于9月1日起，昭乌达盟十一旗启用蒙汉文合璧之新公章，其中奈曼旗公章编号为1196，印文为“奈曼旗政府印”的蒙汉文字样。此外，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是，不知苏达那木达尔济何时何地建立了一个名曰“昭乌达盟奈曼旗有限责任生产

合作社”的机构，竟然于1948年9月7日，呈文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社会部“赐予备案”。呈文声称：“本盟奈曼旗旗民为自食其力，发展畜牧业，开发该旗资源起见，特创立“有限责任昭乌达盟奈曼旗生产合作社”。现该社一切手续均已完备……特请社会部备案”。彼时的奈曼旗早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奈曼旗，可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且流亡在外的“五爷”还奢谈什么“发展、开发”呢？真是莫明其妙！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驻锦州之苏达那木达尔济等昭乌达盟及所属各旗“长官”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解放锦州战役前夕，“酌留盟、旗一部分留守人员外，已事先疏散，于9月22日兼程徒步集中葫芦岛港口，乘船至平”。昭乌达盟盟长兼奈曼旗政府札萨克苏达那木达尔济将“办公”地点设于原奈曼王府，即北平西四太安候街12号。其它各旗驻平办事处则暂时就地办公。就绪之后，于10月18日，苏达那木达尔济向蒙藏委员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和各旗办事处负责人名单。

同年末，北平已经在我重兵包围之中，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亦摇摇欲坠。此时，苏达那木达尔济奉命拟下名单，做为首先撤离北平之人员共9名。即：

盟长：苏达那木达尔济

（驻平办事处）处长：于海峰

阿鲁科尔沁旗札萨克 他拉巴

扎鲁特左旗札萨克 顾 鲁

扎鲁特右旗札萨克 锡金旺苏勒

翁牛特左旗札萨克	郭他拉
翁牛特右旗札萨克	鲍靖远
巴林右旗札萨克	乌尔他
巴林左旗札萨克	李靖宸

于12月27日随即呈报北平当局，准备南逃。

随着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苏达那木达尔济等人根本未及逃跑更谈不上“首先撤离”了，据说，1950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苏达那木达尔济被逮捕监禁，1951年死于北京。

索惠民小传

胡永平

索惠民，字广桥，汉族，1894年生于奈曼旗土城子乡岗岗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索漆，清末曾考中秀才，但未能仕进，遂回故乡教读终生。父索桂林，幼承父训，学业精深，一生教读不辍。他自幼嗣继父、祖之志，在他们的训诲下，学习勤勉，课业颇深。

从1913年起，年及弱冠的索惠民，以一腔热情步入教师之行列。他先后在本村、高和、七家子等村受聘或自办学馆，教私塾，后又在岗岗村国民公立学校、沙日浩来、大沁他拉王府国民优级学校任教，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他曾于1930年被绥东县修志局聘为访查员，1941年任岗岗国民学校校长。1945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敖汉旗何业屯、奈曼旗柳条沟、尧力甸子、大柳树等村当教员。

在长达36年的教师生涯中，他治学严谨，长于文史。《四书》、《五经》及众多的古文、诗词名篇，他不仅能倒背如流，而且在教授时讲解细致，声情并茂，一篇《祭十二郎文》，常常把满堂学生讲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的学生至今回忆起索先生课业之精熟、教书之透彻的情景，无不

啧啧称赞，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得他启蒙、受教于他的学生难以计数，其中学有所成者更是不乏其人。

索先生为人宽厚、随和，无论穷富子弟，他都能一视同仁，很少体罚学生。对学生所交束修的多少，他从不在乎。有的穷苦学生拿不起束修，他也照样收读。所以，他不仅在乡里深受众望，许多学生家长也慕名把子女送到他的门下。

教书之余，索先生喜欢作诗一生诗作颇多，可惜未能结集和传世。仅从其后人保存的部分诗作中看，其作虽多属即兴抒怀酬和劝勉，但遣词立意颇为讲究，格律十分严谨。其中托言遣志《泪情》8首和《悼亡诗》20首，于地藉景、抒情嵌花鸟、药材、古人名于诗中，甚为工巧，独具风格。

伪满洲国期间，索先生迫于生计而从教，但他对当时学校推行的奴化教育却不以为然。当时虽有《满洲国语读本》，但他从不给学生讲授，每到一校，他就大讲中国历史和古文、诗词，并寓理于教，告诫学生“不要忘了中国”。后来，他索性把课余时间全部寄情于吟咏唱和之上。在他的影响下，他所任教的学校书声朗朗，终日不绝。对此，就连大沁他拉王府国民优级学校颇有实权的日本人伊能，也无可奈何。

1949年下半年起，索先生在家务农，同时自修中医。1954年，经全旗中医考试合格后，翌年底，他到奈曼旗白音塔拉卫生院（后转东明卫生院）行医。

弃教从医后，他虽届高龄，但仍十分勤勉。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待患者态度和蔼，有求必应，因而

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称之为“人民忠实的老医人”。

在行医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医术从不保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所陪带的学员。与此同时，同事或青年医生向他请教，他总是反复讲解，精心指点，尤其对有些疑难问题，他更是条分缕析地给以认真解答。

1954年和1956年，他被选为奈曼旗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至1965年，他先后任奈曼旗政协小组成员和哲盟政协委员。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关心政治，忘我工作。他在1962年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我在旧社会做过几十年教育工作，却始终没有社会地位，只有党才是知识分子的靠山。”他认为新社会“无论从事任何一件工作，只要对人民有贡献，就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对我这年近七旬的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底。”他还恳切地希望“坚持要求加入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文革”期间，索惠民先生被诬陷为“国民党党员”、“日本协和会员”，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终年75岁。

从教五十年的拉西旺都特

张 斌

拉西旺都特（1886年—1971年），姓宝，曾用名宝椽朴，蒙古族，辽宁省北票市（原东土默特右旗）黑城子人。

1892年，在黑城子王府跟父亲（舍冷那德木都）读书12年，蒙汉满文兼学。其父家教严格，加之幼年的拉西旺都特聪明伶俐，不到1年就读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本书。从6岁起就开始攻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开始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13岁就能翻译汉、满、蒙文和写文章。由于他的才华闻名遐迩，黑城子王府每月补助小米一斗，以示关照。但性格倔强的拉西旺都特，毅然拒绝其补助，从1904年开始在黑城子王府私塾以教书为主业，靠翻译、缮写呈文为辅，维持全家生活。后来王府邀他到王府“档字房”（相当于今秘书室）承写奏文、公函、翻译古文。官吏欣赏他的学问，以“大心切其”（文书）的文官衙门劝诱他。但历来厌恶官吏的拉西旺都特，怕得罪官府，于1922年扶老携幼投奔奈曼家族，到扣根（奈曼六区）一带落脚，让次子索苏格图上学念书，长子宝石枉跟刘画匠学画，而他自己则靠给富户记账，翻译古典小说来养家糊

日。不到一年时间，热心教书的拉西旺都特在大青庙又办起私塾，低费教学，学生是大青庙的10余名小喇嘛。此后他又在哈力德斯格、业拉玛吐、他能泉等地继续办私塾，教蒙汉两种文字。伪满时期他办的私塾被并入沙日浩来国民统级学校，他继续教古汉语和蒙文。由于他教书有方，才能出众，深受世人称赞。伪满旗公署调其任旗教育课督学官，他不肯受任。因此他由高等部“教育”被降到初等部“教辅”。然而，他并不以为然，仍然继续从教，并以当“教书匠”为荣。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拉西旺都特被聘为公办教员，他拥护党，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工作更加认真负责了。这时，他的妻子不幸病逝，面对人生的不幸，他没有消沉，索性以校为家，与学生同吃同住，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人民教育事业上。

拉西旺都特先生从教50年，特别是在奈曼旗从教的30余年，为奈曼旗蒙文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土改时期，奈曼南部有蒙文文化的干部和蒙文教师，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可谓“弟子三千，名扬四海”。

1954年拉西旺都特因年迈退職休养。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的功绩，推荐他为首届哲盟政协委员。

1971年拉西旺都特先生不幸逝世。但是他的崇高师德，至今为后人所传颂。他的长子宝石柱成长为哲盟著名的民间艺人。

奈曼旗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始末

顏成坤

奈曼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1951年开始，1956年基本结束。

1951年是建国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是在旗工商科的领导下进行的。

年初在大沁他拉街进行私营工商业登记发照工作，当时有工业24户，商业37户，共61户，共有资金10,586.6万元（旧币），有5家是联营的商业。同时对二人以下，三人以上的手工业作坊也分别进行了普查，并制定了爱国公约，1952年6—7月间工商科组织人员分别在大沁他拉，八仙筒检查了爱国公约的落实情况，通过落实爱国公约，提高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政治觉悟，他们在1951年1月—1952年6月先后为抗美援朝和拥军优属捐款2135万元（旧币），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1953年，私营工商业在国家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经过“三反”、“五反”的改造和教育，淘汰了不应有的行业，正当行业受到保护和扶持，私营工商业者坚定了信

心，扩大了资金额，增加了股东和户数，总户数达209户，资金794866000元（旧币），这些户多数是小本生意，兼营的多，专业的少。虽经过几次运动的改造，但进展不大，仅改造合作商店一处，合作饭店两处，代销两处，从业人员28名，占总户数的8.14%，未解决根本问题。

1954年初，旗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决定，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移交给供销社。1955年7月20日至26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全国农村私营商业改造会议，会上提出了进一步对农村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规定了对农村私商改造的四种形式，即经销、经销小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代购；合营。同时还根据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的“对私商既要社会主义改造，又要给饭吃”的精神，进一步指明了对私商安排改造的方针，彻底扭转单纯排挤、代替的方针。

1955年12月内蒙党委提出要加速对农村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以适应农村形势发展的需要。奈曼旗委于12月26日召开了旗委扩大会议，会上就如何加强对我旗农村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做出决议。在同年12月30日成立了由副旗长刘琮为组长、旗社主任刘万才，工商科长崔保林、税务局长李贵、旗直党总支部书记郑少杰，九区委书记张久，一区委书记侯国卿组成的奈曼旗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私改领导小组成立后，制定了《奈曼旗农村私商改造规划草案》。内容包括：

1、基本情况

2、农村私商改造情况

3、56年私营商业改造初步规划

4、步骤和方法

5、商业网的安置

经过一系列的充分准备之后，全旗大规模的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开始了。1956年2月24日旗私改领导小组召开各基层社主任会议，会上传达了盟私改工作会议精神，安排了具体工作方法，研究安排了合营企业的经理，共13人。

2月27日抽调工商科、供销社及有关单位干部46人参加了私改工作学习班。旗人民委员会副旗长刘琮作了政治动员报告，学习班主要学习、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意义、目的、方针政策，研究改造形式和办法，这46人同去盟“合作社干校”学习的18名学员共64人组成私改工作队。分四个大组，每个大组分两个小组。（组织宣传组、清产核资组），分别奔赴马家洼子（今新镇），浩沁东木（今东明）、八仙筒、大沁他拉四个集镇，实行组分行、人分户的办法开展工作。方法步骤：

大体分三步，一是工作组向当地区委传达汇报私改工作有关情况。并采取作报告、讨论、座谈、广播、个别走访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除贯彻私改方针政策，改造形式和组织办法外，尽量结合实际，用过去和现在对比算细账办法，教育小商小贩，解除思想顾虑。二是报名、登记、批准。三是清产核资。

组织领导问题：

在旗委和私改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办公室主任和盟工作组分别深入大沁他拉，八仙筒两个集镇重点抓这项工作，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指导全旗，互相联系，加强请示制度，各工作组每三天向旗私改办汇报一次，由旗私改办再向盟汇报。与此同时各区都成立了私改委员会，并有明确分工，分头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私改工作全面铺开，工作队严格掌握政策，深入调查研究，逐户摸清了私营商业的家庭经济，资本额，营业额，政治历史等情况。直到56年1月15日基本搞清。

改造前全旗共有四个集镇，私营商业190户，从业人员249人。经改造后，合营54户，78人；直接过渡（一步登天）国药业3户，5人；合作商店17户，22人；合作小组13户，23人；代购代销组12户，13人；代购代销户32户，33人；经营小组21户，23人；单干1户，2人；商转农业30户，43人；本旗未组织的7户，7人；被改造和组织起来的私营商业户占总户数的95.8%。

私改前全旗私营手工业67户，112人；直接过渡2户，2人；合营2户，6人；合作化38户，59人；扩进原有铁业社8户，12人，单干4户，4人；工转农业12户，29人。被改造的私营手工业户，占总户数的94%。

1956年3月13日在旗私改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经有关部门验收批准，由10户，11名社员组成的奈曼旗大沁他拉农牧畜力运输合作社宣布正式成立。至此，

全旗对私营商业、手工业、运输等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于1956年3月基本结束。轰轰烈烈的农村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本资料得到旗档案局、工商局部分同志的大力支持，为此，表示衷心感谢。）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奈曼旗文史资料·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77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